

炎黃春秋

第 7 期
2014年

反思“国有经济强国论”

张钦礼一案的前前后后

革新中国传统历史观

谢富治与“枫桥经验”

从普京怒斥“布尔什维克卖国”说起

反思“国有经济强国论”

○ 曹正汉

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未建立起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民间经营活动一直受到政府诸多限制,政府也一直在市场上垄断了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和经营领域。如钱穆所说:“汉武帝以后,对社会上可获大利的工商业,一向都由政府控制,不让私人自由经营。因此,对农业则轻徭薄赋,平均地权;对工商业则限制发展。”(《国史大纲》,第67页)。经济史家把此种经济体制概括为“国家统制下的市场经济”,也就是由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垄断关键行业和重要资源,在此前提下,允许民间自主经营,允许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发展。

从长期后果来看,限制民间自由经营和实行政府垄断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其原因是政府垄断不仅阻止了民间自由进入,而且抑制了企业家创新潜能的充分发挥,从而阻碍了新产业的兴起和经济结构的转型。用熊彼特的话说,经济发展是“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过程,是不断创造新的行业和新的市场、同时也在不断淘汰原有的行业和原有的市场的过程。然而,这一过程的展开高度依赖于企业家敢冒险的创新行动。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我们看到,正是一群敢于冒险的企业家在手工纺织时代尝试建立机器织布厂,在马车时代冒险建立铁路公司,在邮政通信时代异想天开地建立互联网公司,才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所以,熊彼特说:“从木炭炉到我们今天炼钢炉的钢铁工业历史,从水车到现代电厂的电力生产设备的历史,从邮递马车到飞机的运输史,全都是革命的历史。国内外新市场的开辟,从手工作坊到像美国钢铁公司这种企业的组织发展,说明了产业突变的同样过程——它不断地从内部使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的结构,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146-147页)。政府垄断的最大后遗症,恰恰是限制和打

击了这个国家一大批潜在的企业家的创新行动,堵住了产业革命的道路,也让整个国家的经济系统陷入低水平循环而难以自拔。历史上的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有着巨大人口规模和市场潜力的中国,而是发生在“蛮夷小邦”但依靠市场经济起家的英国,即是无数证据中最令人深思的一项证据。

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历代王朝都坚持要垄断或控制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当然,其原因与统治集团的利益有关。统治集团通过建立国有企业以控制关键性资源和垄断最有利可图的行业,能够获得巨额租金和垄断利润。不过,仅仅从统治集团追求自身利益的角度,难以完全回答这一问题。这是因为,若要使政府垄断市场的行为长期维持下去,就不能完全诉诸于自身利益,还需要尽可能说服民众接受政府的垄断,即需要在民众中为政府的垄断行为建立某种合法性。在中国,此种合法性即是政府主张的国家垄断的正当性,其核心观点认为,把国有经济做大做强,能够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国家必须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必须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保持垄断或控制地位。我们把此种关于政府垄断的合法性主张简称为“国有经济强国论”。

首先我将指出,“国有经济强国论”不是当代的新发明,而是秦汉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官方传统,属于官方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然后,我再来讨论,这种“国有经济强国论”是否可靠,是否能经受中国历史和当代国际经验的检验。

一、“国有经济强国论”的起源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市场经济能够促进国家繁荣和民众富裕。司马迁盛赞市场经

济“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其原因是市场机制能够充分激发每个人创造财富的潜能:“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传》)此种市场机制即是后来经济学家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所以,司马迁告诫统治者,政府最好的经济政策是自由放任,放手让市场经济发展,所谓“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如果政府也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此即“最下者与之争”,是最糟糕的经济政策(《史记·货殖列传》)。

然而,自司马迁之后,自由经济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几成千古绝响,统治者治理国家所依据的是另一种经济思想,即法家提出的统制经济思想。法家从巩固统治者的政权、增强国家对民众的统治能力出发,论述如何制定经济政策,如何设计经济制度,其思想形成法家的统制经济思想。此种经济思想与英国18世纪亚当·斯密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形成鲜明对比。亚当·斯密说:“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足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1页)。与“富国裕民”的目标相比,法家着眼于“强国治民”,即如何运用经济政策达到增强统治者的国力、使民众易于统治之目标。其中一项主要的经济政策即是由国家垄断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限制民间自由经营,使得民众更易于接受国家的支配。

“国有经济强国论”起源于法家的统制经济思想。此种经济思想形成于战国至西汉时期,并在汉武帝时期大规模付诸实践,其理论主要是《商君书》的农战理论和《管子》的轻重论。其中,《管子》的轻重论是集大成者,它系统地论述了国家控制和垄断市场的理论基础与政策主张,并为后世统治者基本沿用。

“轻重”的原意是指钱币的轻重,以及对应的市场上货物多寡与价格涨跌。法家看到,商人通过掌握市场上的“轻重之势”,就可以利用市场供求变化和价格涨跌从中牟利,因而把它引申为统治者也可以通过在市场上的垄断行为,掌握对民众(包括商人)

的轻重之势,以达到增强国力和控制民众的目标,所谓“以轻重御天下”。

“以轻重御天下”是《管子》轻重论的核心思想,其含义是统治者要达到增强国力的目的,就必须掌握对民众的轻重之势,在经济上取得对民众的支配地位,从而使得民众易于顺从国家的统治。为此,轻重论者提出的主要政策有两项,一是“掌握予夺贫富之权”,一是“为笼以守民”。

掌握对民众的予夺贫富之权,就是由国家控制民众的经济命脉,使得民众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于国家。“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管子·国蓄》)。所以说:“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管子·揆度》)。这里所谓“夺”,不是指直接剥夺富人的财产,而是要把有大利的行业从富商大贾手中夺过来,由国家独占。至于“贫能予”的“予”,也不是白白送给穷人,而是通过控制金融和生产资料,向农民放贷和赊销。因此,“掌握予夺贫富之权”就需要依靠“为笼以守民”(《管子·国蓄》)。“笼”即垄断,“守”是控制和支配。法家认为,垄断是增强统治者的国力和控制民众的有效手段,并概括为“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管子·国蓄》)。

“为笼以守民”的主要措施是“官山海”(《管子·海王》)与“官天财”(《管子·山国轨》),也就是对重要资源和主要行业实行国家垄断。在汉武帝时期,“官山海”与“官天财”的主要措施是盐铁专卖。由于盐是民众的生活必需品,铁器是农业和手工业的主要工具,所以,国家只要垄断了这两种产品,也就控制了民众的经济命脉。国家通过高价出售盐铁,一方面让民众自愿缴纳钱款,另一方面也使得民间工商业者难以获大利。这后一个用意即是法家所主张的“杀正商贾之利”(《管子·轻重乙》及《管子·轻重丁》),使“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管子·国蓄》)。法家认为,“大贾蓄家”之存在是对国家政权的一种威胁,因为他们以其财富支配和役使一部分民众,消弱了国家的力量。因此,国家需要抑制商人的财富,抑制方式即是由国家垄断重要资源和关键行业,既使得商人难以获大利,也使得商人同样处在国家的控

制之下。

二、“国有经济强国论”的近现代演变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如何建立现代工业体系,以应对西方列强和东邻日本的军事侵略与经济竞争。因此,传统的“国有经济强国论”需要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是,其基本原则没有改变。

晚清洋务运动是中国仿照西方技术建立现代工业的起步阶段。当时,清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除了投资创办军工企业以外,已无力投资民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在这种窘迫的情况下,清政府采用的策略是既要吸引商人投资现代企业,又要由政府控制这些企业。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清政府采用李鸿章的主张,实行“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此即“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是指由政府官员控制企业的决策权和人事权,“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商为承办”是指吸引商人投资,由商人承担经营责任和经营风险,“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试办招商轮船折》)。

张之洞发展了李鸿章的“官为维持,商为承办”的思想,提出“利权分开论”,以论证“官督商办”的合法性。所谓“利权分开论”,是指商人投资办企业可以获利,但不能掌权,企业的控制权须掌握在政府官员之手,此即“官权”。他说:“盖国家所宜与商民公之者利,所不能听商民专之者权”(《劝学篇》)。为什么要在商人投资的企业中设置官权呢?张之洞的理由是,官权是为了“治理安危之事”。张之洞认为,如果没有官权,政府就难以镇压工人罢工闹事,难以控制商人的不法行为,难以维护社会秩序,导致“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所以,在企业中,“应由我等(即官员)执掌人事权和经营权,尔等(即出资的商人)取得应得利润则当满足”(《劝学篇》)。

不难看出,李鸿章的“官督商办论”和张之洞的“利权分开论”,是“国有经济强国论”的变种,是在国家无力投资的困境中,控制新式企业和新兴产业的变通办法。那些由政府授权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和官商合办企业,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却是受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传统的“国有经济强国论”开始转变成现代的国家统制经济学说。统制经济学起源于德国和意大利,于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传入中国,它主张政府对经济活动实行全面控制,由政府直接组织或指导全国的生产与交易活动。统制经济学与法家的经济思想是相通的,都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和增强统治者的国力。所以,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即接受了统制经济学的主张,开始筹划建立国有经济体系。1928年11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建设大纲草案》,规定:“凡关系全国之交通事业,如铁路、国道、电报、电话、无线电等,有独占性质之公共事业,如水、电、商港、城市公共事业等,关系国家前途之基本工业及矿业,如钢铁业、基本化学工业、大煤矿等,悉由国家经营之。”30年代初,国民政府实业部制定《实业四年计划》(1933-1936),计划将全国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和通信业置于国家的统制之下。1937年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由蒋介石等四名委员提出的《中国经济建设方案》,提出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实行计划经济,其宗旨就是扩大国家资本,垄断全国的经济命脉。

三、是否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

通过对“国有经济强国论”的历史考察,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个重大问题:鼓励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强调国有经济必须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必须在国民经济中保持控制力,是否能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探讨这一个问题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表明,由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虽然在短期内统治者获得了可观的利益,但是,并没有真正带来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没有在长期内巩固统治者的政权,反而导致国家积贫积弱,最终引发社会动乱和王朝崩溃。因此,我们认为,这种经济思想是否可靠,值得怀疑。另一个原因是,在当代中国,“国有经济强国论”仍然是国家主流经济思想的组成部分,并用于指导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如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世纪之交,和平和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综合国力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

家前途命运的主导因素。我们要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就必须不断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当然,当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面临的挑战已今非昔比,历史经验虽可资借鉴,但不能为我们回答上述问题提供直接答案。为此,我们还需要进行国际比较,比较当代各国的国有经济在本国经济中所占比重的高低,分析这一项比重与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在国际比较之前,我们先看中国的数据。1998年以后,经过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中国的国有经济已大规模收缩,但是,仍然在国民经济中保持控制地位,垄断或控制了金融、石油、石化、煤炭、有色金属、电力、电信、铁路、民航、海运、食盐、烟草、军工、粮食进出口贸易等关键性行业或这些行业的关键领域。以国有经济在全国GDP中所占比重来衡量,中国的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目前约为25%左右。25%的比重是什么概念呢?世界银行曾经统计了76个国家在1978至1991年间的国有经济比重(不包括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结果如下:发展中国家的国有经济占本国GDP的比重平均为10.7%,发达国家平均为4.9%;在发展中国家中,非洲国家的此项比重最高,平均达到18.4%。我们再按国别来看,在这76个国家中,发达国家的国有经济比重普遍较低,如美国为1.4%、英国为4.6%、德国为7.1%、法国为10.5%。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都是贫穷和政局不稳的国家,如阿尔及利亚(64.6%)、埃及(34.1%)、苏丹(48.2%)、圭亚纳(41.2%)、委内瑞拉(23.1%)、赞比亚(30.9%)、扎伊尔(22.8%)、突尼斯(30.2%)等。

上述比较结果可以说明两点:第一,1998年以后,虽然中国经历了国有经济大规模收缩和重组,但是,国有经济比重仍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明显高于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第二,从国际范围来看,国有经济在本国经济中比重较高,并不能带来该国在国际上也具有较高的竞争优势,也不能带来国内政治的长期稳定,非洲国家就是典型例子。那些国有经济比重很高的非洲国家,也正是政局不稳、贫穷落后的国家。所以,通过做大做强国有经济来增强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并在长期内巩

固国家政权,这种观点在国际上是不成立的。我们还可以用另一个事实来反思这种观点:有一些国家,其国有经济在本国经济中所占比重一直很低(如当今美国和历史上的英国),但是,却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其国内政治也能保持长期稳定。

以美国来说,美国法律对政府从事经济活动有严格限制,国有企业只允许从事私人无法做、做不好或无利可图的公益行业,如邮政、公共交通、自来水供应、污水处理、博物馆、森林公园、水利工程、航天、养老、医疗保险、存款保险等领域。如美国著名的大型国有企业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成立于1933年,其职能主要是从事流域内防洪、灌溉、发电、生态保护、流域规划等公益性事业。再如公共广播公司(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它负责推动和批准公益性广播服务,但本身并不拥有电台或电视台,而是通过扶持全国联网服务,及向私营电台、电视台付费,以鼓励发展公益性的电视和电台广播。诚然,在美国一些关键行业(如金融业)也有国有企业的参与,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成立于1933年),它通过为所有商业银行的储户提供存款保险,以及监督商业银行的运营风险和接管破产银行,来维持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增强公众信心。但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不从事金融业务,更不能追求在金融行业占据主导地位或控制地位。

因此,从总体上说,美国的国有企业主要是从事公益活动,提供公共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更不会在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如金融、电信、能源、交通运输、军工等)占据控制地位。但是,这并不妨碍美国从一个穷乡僻壤的农业国一跃成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不妨碍美国保持国内政治的长期稳定。

所以,无论是从中国的历史教训来看,还是从国际经验来看,“国有经济强国论”都是难以成立的。当前,正值中国朝野推动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时期,我们需要走出传统思想的束缚,反思这种思想的合理性,在强国环伺的当今世界重新思考强国之道。■

(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系主任,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责任编辑 吴思)

革新中国传统历史观

○ 资中筠

改革开放之初,我首次作为访问学者访美,参加了一次中美历史学者的交流会。有一位美国历史教授讲了一段见闻。他说:问美国学生为什么要学历史,绝大多数的回答就是感兴趣。他问过台湾的学生,得到的回答是,为兴趣而学历史对我们太奢侈,我们是为了救国而学历史;后来他接触到中国大陆的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竟如出一辙,尽管两岸处于对立状况,各自所谓“救国”的含义可能相反。把学历史和救国联系在一起,令他这个西方人感到十分新鲜。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学习和研究历史可以有如此不同的角度。

最近想到这个问题是由对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的各种看法引起的。

以史为鉴,鉴什么?

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颇有几个,好像没有像中国那样特别重视历史文本,对史书赋予如此沉重的使命。最常见的说法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里“替”是关键,为什么不是“兴衰”?就是一个皇朝由盛而衰,最后被下一个朝代给“替换”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所谓一个朝代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掌权,然后又被另一个家族夺走了,换了姓。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为了本朝能千秋万代永远继续,避免被别的朝代“替”掉。谁最该吸取这个教训?当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他的谋士、帝师的职责就是教给皇帝如何保住这个皇位,老百姓是无权参与,也无能为力的。所以历史首先是写给皇帝看的。中国的二十四史只有第一部《史记》例外,是异类。尽管司马迁本人的职务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是为了皇朝的延续。他的心胸非常博大,包含整个他目光所及的世界,要找出规律,不是为了

汉朝统治能够永远持续。所以他胆子很大,一直写到当代。他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武帝本纪》他也写出来了,而且对武帝没什么好话,并非歌功颂德。要是看《史记》的《武帝本纪》,对汉武帝得不出很好的印象。而且《史记》还有点像布罗代尔所提倡的写生活史,给各类人都写列传,包括《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货殖列传》,等等。中国人历来是轻商的,但司马迁给商人也写列传。还有酷吏、廉吏、循吏,都分别列传,按照他自己的评判标准。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书里的一个异类。是为记录史实,也是寄托他自己的怀抱,不是给皇帝看的。但从此以后,包括《汉书》,历代所谓“正史”,也是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

没有列入二十四史,却是最权威、最重要的第一部编年通史干脆就叫《资治通鉴》,顾名思义,目的鲜明,是帮助统治者如何巩固统治权的。作者虽然也姓司马,但司马光与司马迁的角度非常不一样,他在《资治通鉴》的最后附有一封给皇帝的信,大意说我所有的精力都已经放到这里边了(按:这部通史写了19年,当然有一些助手,所有助手的名字也在上面,包括校对的、刊印的,但是司马光是主要编撰者),此书是在宋英宗时奉命编写的,完成时已经是宋神宗当政了。他请当朝皇帝好好读一读这部书,并明确提出,每一个朝代的兴衰有什么样的规律,宋朝应如何吸取经验教训,才能持续兴旺下去。说穿了,历史著作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使皇朝能够千秋万代永存下去。为达巩固统治的目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得民心。所以得民心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说民众的需求和他们的福祉,是必须要顾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不顾及,但这是手段,目标是为了维持王朝。就像唐太宗那句脍炙人口的话:民可以载舟,可以覆舟。民是水,舟是皇权。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因为水还是最基础的。但

归根结底,水的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了承载上面的皇权宝座。能够明白这一点,重视民众这个基础,就算明君了。但后来因为在皇宫里呆久了,皇二代、皇三代以后,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明白了,习惯于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以为自己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一意孤行,结果起了风浪,把船给掀翻了。无论如何,最终着眼点是巩固一家皇权的统治。

对当权者的监督作用

从这一功能派生出来,史书还有一个功能是对当朝统治者起一定的监督和约束作用,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古代史书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这是从孔子著《春秋》时定下来的。遣词造句都代表着褒贬,叫做“春秋笔法”,所以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因为孔子维护的是正统的秩序,不容犯上作乱。例如臣杀君,叫“弑”,君杀臣叫“诛”。前者是大逆不道,后者是罪有应得。

大家应该都知道文天祥的诗:“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说春秋时期有两个能坚持原则、坚持说真话的史官,齐国的太史简因为大臣崔杼把齐庄公给杀了,在史书上写:“崔杼弑其君”。崔杼说不能用弑字,他坚持用,就被杀了。那时候职位常是一家继任的。他死后他弟弟接手他的职位,也坚持用弑字,结果也被杀了,另一个弟弟再接替这个工作,照样坚持用“弑”字,也被杀了。三兄弟前赴后继,就为了这一个字。最后崔杼手软了,觉得不能再杀下去,就认了。所以在《春秋》里记载是崔杼弑其君。这件事说明:第一,他们非常在乎用哪个字;第二,当时的人还是有血性的。他们认定的原则,不惜以身殉职。据说另外还有一个别姓的南史氏,听说此事后还准备去接着干,去撞刀口。后来崔杼罢手了,他才没有去。那时候的人确实较真,把坚持他们认定的真理看得比性命还重。我们今天的是非标准和那时不同,看起来很可笑,为了用哪个字而牺牲性命。但他们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这是他们的道统。晋国董狐的事迹也差不多,不过没有被杀,就不细说了。通常有“殉国”、“殉职”、“殉道”之说,而写历史成为一桩惨烈的职业,要牺牲性命,“殉史”应该算是中国特色。无论如何,这两

位史官为后来写历史的人树立了一个标杆,中国古代修史以此为榜样,坚持写真事,不能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而瞎编,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其实齐太史记录的是当时眼前发生的事,应属于新闻,而不是历史。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统治者的言行载入史册是给后世看的,关系到身后的名誉。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一般草民不在乎,中国士大夫却很在乎——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当国者更在乎,他们特别在乎自己死后的历史地位,史书上是把他当成明君还是昏君。要想历史把他写得好,就要做得好。做不好,在历史上就会是昏君,亡国之君。所以对于皇帝或统治者来说,史书起到一定的监督的作用,使他们还有所敬畏。

历史都是史官写的,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史官。所以顾准说中国的文化是“史官文化”。也许就是从齐太史之后立下的规矩(我没有考证),君主本人不能看史官如何记载他的言行,这样,史官就可以无顾虑地如实记载,为后世提供真实的史料。这个传统在皇权专制时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简单。到唐太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怕史官记下来,坚持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褚遂良等人顶不住,就破了这个规矩。后来隐恶扬善,歌功颂德的就逐渐多起来。不过总的说来,史官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心目中有一个榜样,治史者对后世有一份责任心,对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编乱造。另外,除了官史之外,还有许多野史、私家编撰的见闻录。例如宋周密撰《齐东野语》的序言说:“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唯我家历史不可易”,因为官史受当时的政治斗争影响,有私心、有竞争,常是以得势者的是非为是非,只有他们家祖辈传下来的实录是可靠的。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言。在明清以降大兴文字狱之前,这种民间野史的刻写、流传还有一定的自由度。即使是修官史,主要是写前朝历史,不涉及本朝利害,可以客观一些。其所依据的史料也包括广为搜罗的野史,甚至民间传说。而且史官们特别希望当朝皇帝能吸取经验教训,不能自欺欺人,因此也有写真实的动力。赞扬前朝的开国皇帝,揭露过去亡国之君的弊政,都不会冒犯当今的在位者。所以,为我们留下的二十四史,还有相当可信度。

近现代的官史可信度不如古代史

现在写前朝“民国”，一味贬之，不能有褒有贬公正对待，为什么？有几点原因：

1. 过去皇朝更替遵循的是同一道统，是非标准不变，基本制度不变，主要看谁更符合这一标准。而1949年的鼎革，是从理论到制度全盘颠覆。必须把前朝完全否定，才有本朝的合法性；

2. 本朝的开国者与前朝是同一代人，曾经共事，奉同一正朔（孙中山三民主义），也曾互相杀戮，是现世的仇敌。被打倒的既是立国者也是亡国者，而且还未全亡，偏安一隅，还不能完全算作“前朝”。这样，两边的“笔底春秋”完全相反：这边是“革命”，那边是“叛乱”；这边是英雄，那边称“匪首”。更重要是史实的叙述也大相径庭。

3. 古人治史不是为了对民众做宣传。一般改朝换代之前总有一个乱世，人心思定，谁能实现安定，统一天下，就是“奉天承运”，老百姓就拥护。肯定百年前的前朝君主的功绩与现实的民心归附无关，反而能为当前的当政者树立榜样。（但也有例外，就是异族入侵，如元、清，对前朝的说法就诸多忌讳。元朝太短，清朝统治者特别怕汉人不服，怀念前朝，所以清朝文字狱最发达。）而现在的历史与当代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政权的合法性息息相关。加之教育普及，关心国事的民众越来越广，历史的叙述与政治宣传合二为一，不仅对近代史，连古代史都是如此，每一次政治运动就修改一次历史，连对孔子也“是非凡几易”。不仅是笔底褒贬问题，连事实的陈述都须服从当前政治需要，有些真相就必须遮蔽。

事实上，辛亥革命后，民国的官史对晚清的说法以及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各政治派别的褒贬，也有类似的出发点，因而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史实的叙述和对人物、事件的评价都有偏颇。

4. 古代皇朝兴替，成王败寇，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是公认的，合法的，无须掩饰。而辛亥革命以后，君主制被否定，名义上是民主、共和，不能公然承认江山私有。理论与实践脱节，“道统”与“法统”在逻辑上难以理顺，对相关的历史真相就更有必要掩盖。

5. 现代史官的相对独立性弱于古代。

所以近现代史的官史可信度还不如古代史。不过自改革开放以来，史学有很大进步。真相逐渐透露出来。比如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我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学术界非常活跃，成果累累，出现繁荣景象。这两年民国史以及晚清史的著作很多，从档案中挖掘出很多真相，对史实以及历史人物重新评价，推翻了不少以讹传讹的旧说，澄清谎言，振聋发聩。有许多佳作可以说是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优良部分。

世界历史进入视野

自19世纪中叶，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以来，再讲历史，就不限于中国，而是世界各国的历史了。“以史为鉴”也包括以他国的兴衰为鉴。中国人研究外国历史，最开头的着眼点是：为什么他们能打败我们？这也就是我开头讲的中国学生回答美国教授为什么学历史的问题——是为了救国。不管学中国史还是学外国史都是为了救国，这是当时知识精英的共同情结。但是“他们”为什么强大，就不能以皇朝的兴衰为主线了。因为欧洲从中世纪以后的发展途径，就不是一国一家的王朝兴衰。历史发展是以生产力、思想的进步，和制度的改变为主线的。比如你要学英国历史，你得看13世纪的《大宪章》，有了这个之后，就是克伦威尔革命，以后又有光荣革命，又有工业革命，等等。而不是以斯图亚特王朝或都铎王朝怎么样了为线索。因此我们在学欧洲的历史时，总是要学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什么时候有了蒸汽机之类。既跨越王朝，也跨越国界。日本“明治维新”是国人耳熟能详的话题。这样，不知不觉引进了另一种历史观。

作为现代人，放眼世界，是否还能立足于朝代的“兴替”？既然号称“共和国”，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导，那么，历史观就应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众的福祉为标准。评判是非得失有了新的视角。眼睛不是总盯着皇家，而是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包括用什么器皿，什么时候机械化、电器化了，以及风俗的演变等等。而统治方式、政权的兴替，制度的变迁成为手段。这是倒过来了：不是说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是为了巩固当权者的统治，而是说为了国家繁荣、人民

福利、社会进步,什么样的政府和什么样的制度是合适的,不合适就被“替换”。

几年以前,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曾引起热议。一般观众自然而然会想到“中国崛起”,思考从其他国家的兴衰中看出什么规律。比如纪录片中提到荷兰这个蕞尔小国,却曾经一度因其最自由、最开放,最有创新而领先欧洲,称霸一时;比如德国作为欧洲的后来者,特别重视教育,19世纪德国的教育在欧美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德国也以此兴国。实际上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历史,这就脱离了帝王家谱的体系,颠覆了为皇朝服务的历史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国崛起》这部纪录片无形中起了一些突破性的作用。

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

自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其原因和经验教训是中国政界、学界戚戚于怀,挥之不去的心结和话题。其原因当然在于“以俄为师”的历史根源,这点众所周知,不必细说。在总结苏俄历史的经验教训的众说纷纭之中,大体上有两种视角:

1. 人类文明史的视角

从这一视角出发,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原来的统治制度对人类的两大诉求:生产力的发展和公平正义都无法满足,既无效率,也不公平。反而扼杀了文化底蕴深厚、优秀的俄罗斯民族的创造力,给俄罗斯及其周边的民族带来的是祸多于福,因而难以继。不论以何种方式,最终必然要抛弃旧的制度,转到人类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一转轨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通过暴力。俄罗斯得以和平迈过这一次,避免了流血和大规模的破坏,是他们人民的幸运,也说明民众的文明程度。苏联的军队坚持枪口不对内,是文明之师。被谎言屏蔽的历史真相也逐步大白于天下,苏联档案开放成为全世界历史学家的盛宴。方今俄罗斯出版了许多历史书,基本上颠覆了《联共(布)党史》,证明该书大部分是为树立斯大林个人,为其专权辩护的谎言。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各民族获得了一次新生。总而言之,这是历史的进步。

2. 沿袭朝代兴替的视角

这一视角奉苏共的统治为“正朔”,以同一政权千秋万代永远持续为理想,是非褒贬以此为

准。于是得出的“教训”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真相(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动摇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公开化”、“新思维”,“扰乱”了人心;几千万党员不站出来誓死保卫党权,其原因是信仰不坚定,思想自由化;叶利钦是叛徒;手握重兵的武将按兵不动,不作平叛勤王之举,是懦夫。于是当初自称布尔什维克的一群人通过暴力夺取的“江山”给拱手让出来了。从这一角度出发,吸取的教训就是在思想上要加强控制,而且在必要时不惜用军力保卫已经占有的统治权,在这里,亿万广大百姓的意愿似乎是没有存在的,可忽略不计。

其实苏共的政权并没有让给外国,还是原来“苏联”内部的人在统治,叶利钦是俄罗斯人(斯大林还是格鲁吉亚人,而格鲁吉亚独立了,不属于俄罗斯了),何来“亡国”?正如沙皇被革命推翻,不能算俄罗斯“亡国”。所谓“亡党”之说,也不是事实。共产党依然存在,并参政议政,只是由专政党变成在野党,谈不上“亡党”。莫斯科的政体由一党变为多党。当然完全实现民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一党专政是回不去了。

俄国人自己已经抛弃了过去的制度。他们总结这段历史,著作林林总总,对十月革命本身作彻底检讨的著作也已出版。各种著作对原来的苏共的功过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很少有留恋惋惜过去的政权和制度的。连已经在野的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自己总结苏共失败的原因,都说是:“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真理”。那么认识到这一点,打破这种垄断当然是进步。为什么我国一些人如此“看兵书落泪,为他人担忧”呢?过去以俄为师,老师自己都意识到那一套行不通,改弦易辙了,其实作为学生,也早已脱离师门自行其是了,为什么二十多年之后,还要替俄罗斯人捡回人家不合脚而扔掉的鞋子,替他们奉前朝为正朔呢?归根结底,最高准则不是社会进步、人民福祉,而是巩固已经夺得的政权。民众的福利是手段,“保江山”才是最高目标。为达此目标可以适当照顾民生,也可以不顾民生,但必然牺牲民权。如果对别国的历史只是学术讨论之争,还则罢了,如果手握重权者以此“教训”为基础,决定治国方略,那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文武兼用,为保“江山”不择手段,后果不堪设想!

最近有一位将军声称要“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引起网上一片哗然。谁是“国贼”?由谁来定?这原是五四运动学生喊出的口号,“国贼”是指当时的最高执政者。因为学生怀疑这个政府要签署危害中国主权的凡尔赛和约。学生手无寸铁,只是喊喊而已。而军队如果这样做,就是军事政变了。如果说“国贼”是指贪官,那应该是法律的事,如果由军队来决定谁算贪官,而且可以派兵来惩治,那是什么景象?今天说是惩治贪官,明天就可以对准任何有不同意见的民众。

所谓“欲灭其国,先灭其史”

还有一种说法,“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历史本身客观存在,如何“灭”得了?这里指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历史文本对过去重大事件的说法和解释。更重要的是对史料的取舍。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历史的作用之一是讲祖先的功业如何辉煌,引起自豪感,以及要把它延续下去的责任感。近代这句话最适用的时候是日本侵略时期。例如在“九一八”之后,建立“满洲国”,那里的学生学的完全是另一套历史,目的是说明“满洲国”本来就该独立存在的道理,使中国年轻人不了解原来的历史,接受了自己就是满洲国民而不是中华民国国民的说法。那是在侵略者刺刀下的教科书,为的是奴化一国的国民。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灭史”之说可以成立。

苏联的《联共(布)党史》,就是围绕着为斯大林专政的合法性辩护而撰写的。现在已经知道其中谎言甚多,基本上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真正起到了“灭史”的作用。如今揭露了真相,否定了这部著作,就是“灭”了某一个政权所建立起的神话,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蒙蔽历史真相,垄断历史文本,是维持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在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垄断历史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官史”还是定于一尊,但是野史非常发达,许多历史真相都逐步透露出来。前面讲的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民国史大丰收就是例证。这是一大进步!

1951年胡乔木编《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曾经在短时间内为钦定官史。但是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又有所变化,后来为进一步神化领袖,“大

树特树”,党史也就完全以“路线斗争”为纲,以说明领袖一贯正确。真可谓“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1986年胡乔木访美时,自己都认为那本《三十年》不能算学术著作,不同意放入履历中。至今南京二档馆民国史的档案可以开放,而中央档案馆中共的档案是不能开放的。不过近年来出现了许多亲身经历者的回忆录,是野史,很有价值。例如何方老人的《党史笔记》,不能在内地出版,只能在香港出版。于是又有一些以权威自居的“学阀”出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史学界对某一段历史的不同解释可以不断争论下去,是正常的。随着档案的陆续开放,有些本来“公认”的事实也被否定。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言之有据。而今披露历史真相的,改变过去偏颇的结论,拨乱反正的,被称为“历史虚无主义”,那是颠倒是非。

不同的历史观归根结底是不同的国家观

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归根结底是两种不同的国家观,涉及对政府和政党存在的理由的根本认识。百姓是主人,还是在皇恩浩荡下的臣民,各级政府官员是“食君之禄”,还是纳税人养活?这“谁养活谁”是问题的根本。中国由于皇权制度历史悠久,“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保江山”的观念根深蒂固,而对现代民主、共和制的认识历史较短、远未深入普及,却又经历了以人民的名义行高度集权的历史。现在要把观念扭转到以“民”为目的、政权为手段,十分困难,况且涉及如此巨大而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要汇入人类文明滚滚向前的洪流的。历史,不论是本国的还是他国的,已不是只写给君主看,而是面向大众的。

培根说:“历史使人聪明”,其前提是写真实的历史。多一些人,早一点清醒地对待历史,明确人民与朝廷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最终要“保”的是谁,这是百姓祸福、民族兴衰的关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原所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对中国改革历史的思考

○ 黄卧云

中国历史上只有两次重大的政治管理制度的变革，一次是秦始皇变革，他确立了绝对的中央集权体制，另一次是辛亥革命，目标是推翻秦始皇的集权制，代之以分权与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由于辛亥革命按照西方模式的改革没有取得成功，此后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主题便是对秦始皇确立的体制进行修补。

修补和改革是对危机作出的回应，危机从未间断，改革因此也从未停止。

改革只是选择一种死法

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创立中央集权，是对国家管理体制的一次深刻变革。他的改革无疑是开创性的，但既成功又失败，既有益又有害。

秦始皇扫除六国，使天下归一，威震四海。此时他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采用周朝确立起来的分封制，把征服的领土分给家人，包括兄弟、儿子和亲戚等，并让他们世代相袭。但这些以血缘为纽带维系的国家，随着代际推移，亲情关系疏淡，各成独立王国，不但置天子于不顾，而且相互厮杀，天下永无宁日。其二，采用战国时期各国为更能有效地集中资源进行战争而开始建立起来的集权制。秦始皇选择了第二种方案，他把全部领土划分为36郡，郡以下设县，由皇帝委派官员进行治理，官员都对皇帝负责，职位不能世袭。

秦始皇建立的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而统一的国家，普天之下已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力量。只有他的中央政府才有能力集中和调动全国资源，并有能力把一切反对势力都消灭在萌芽状态。对始皇帝来说，最大的政治就是全面加强皇权安全，确保天下万世不替。对外，他南征百越，北却匈奴，修筑长城，消除外敌入侵的威胁；对内，消除造反隐患，收缴和销毁民间所有武器，使百姓再无反抗之力，对六国旧的统治者除

了杀一批，就是强迫他们大量迁徙到首都咸阳，置他们于朝廷的直接监视之下。使用严刑峻法对付犯上作乱、作奸犯科者。帝国政府还大力加强军事设施建设，在修筑长城之外，努力修建以帝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公路，以利于迅速集散军队。他还夷平可能为反叛势力据守的军事要塞、工事、城墙、险阻。最后，通过焚书坑儒，将最有可能形成反叛思想的源头彻底根除。

帝国的一切部署、布置、准备，看起来周密细致，无隙可击：制度优越，国力雄厚，军事强大，强敌就范。皇帝毫不怀疑，千秋万代的基业已经奠定。

但是，再周密的计划，比起变幻莫测的世界来，都不过是挂一漏万。帝国政府在对未来的形势的种种研判中，肯定不会想到大泽乡那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更无人知晓，也没有兴趣知晓陈胜、吴广为何许人也。帝国建国的第12个年头，也就是秦始皇死去的第二年，也就是二世元年，这里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陈胜、吴广两个农民带着900余人去今北京附近地区戍边，不想路上遇到暴雨，耽误了行程，按法律，这些不能在规定时间内赶到的人都要被处死，于是他们抱着反正都是一死的想法起义暴动。这数百农民，敲响了史上最强帝国的丧钟。各种力量乘机而起，六国的旧贵族纷纷起事，如楚国的世家子弟项梁率部参战，这支部队后来在项羽的指挥下成为一支最大的打击力量。地方基层亡命小吏刘邦刘亭长率一帮囚犯起于沛县，杀死县令，开始打天下的事业。反叛武装很快在各条战线上节节取胜。奇怪的是，不久前横扫六国、身经百战、所向披靡的帝国大军，仿佛已人间蒸发！命运沉浮，缘起缘灭，殊难预料。最煊赫的势力可能一朝垮台，而最不起眼的人物也可能横空出世，一切好像既是定数，又不可思议，既有悖常理，又实属必然。

刘亭长登上大位，国号汉，虽然仍然沿用了

秦的郡县制,但他遇到了一个还将令今后的中国统治者始终纠结不已的两难问题:到底是血亲更能维系权力,还是用律法和利益连结起来的皇帝官员更能维系权力?二者各有利弊,又无法协调。秦帝国二世而亡,如此短命的前朝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成为汉初官方讨论的热门话题。文帝时的大才子贾谊在《过秦论》里认为秦乃亡于自己的暴政,但在刘邦看来,秦失其鹿,是由于在面临强大的反叛势力时没有血亲即同姓诸侯做中央的屏障。汉朝建国伊始,皇帝分封了七个异姓功臣为王,那只不过是对战争中既成事实和有约在先的不得已承认。这些王占据王朝半壁江山的事实,使高祖如鲠在喉。随后几年,皇帝使用各种招数基本摆平了异姓诸侯,将收回的大片土地分封同姓诸侯,并下令:“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在刘邦眼中,管理国家还是要依靠血脉相连的自家人。分封制对王朝保持着长久的吸引力,直到唐朝建国时,唐太宗还认真考虑过分封皇子和功臣的问题。

确保刘家人掌控了全部的国土,刘邦心中的石头也就落地,但这块石头很快又会回来,其实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又回来了,即,血亲成为帝国动荡和分裂的源头。刘邦死后,经文帝、景帝两朝,诸侯王和皇帝的亲属关系渐行渐远,地方同中央愈加疏远,中央对诸侯愈加难以驾驭。当中央设法要削弱诸侯实力的时候,各诸侯也在力求加强自身的独立性,景帝的削藩行动终于激起了吴、楚等七国的联合叛乱。叛乱平定后,中央集权才又逐步加强。

朝廷必须依靠代理人即官员对国家进行实际管理,官员掌握着王朝的各种实权,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国家管理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管理和控制官僚,使他们既是皇帝的好管理者,又是安分守己的朝廷忠臣,于是一边要约束他们不能在强烈的利益驱动下为追求个人利益而毁掉皇帝的江山社稷,一边又要给他们经济实惠和甜头,激励他们尽心为皇帝的江山服务。在高级官员监督和制约方面,汉代的制度经过改革比秦更加缜密。丞相在签发和下达命令时必须通过御史大夫,或者朝廷同时任命左、右两位丞相。对地方官的监督办法,是在全国设立监督区,它的长官刺史独立行使职权,负责监察郡守等地方官。



秦始皇(公元前259—公元前210年)

即使是最成功的统治术也仅能收一时之效,现实中的新情况随时会使过去的成功策略失效,汉王朝还是死在体制内的官员手里。西汉政权被大将军王莽所颠覆,东汉死得更加痛苦,王朝权力在传递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内部危机,如宦官、外戚专权,以及黄巾军叛乱给它造成的强烈危机,完全打乱了既有秩序。董卓、吕布、袁术、袁绍、曹操、刘表、孙坚等,或是朝廷掌兵重臣,或是地方要员,他们利用镇压黄巾军起义的机会,或作乱于上,或起兵于下,割据一方,征战讨伐。野心与阴谋,出卖与背叛,一直是最高权力争夺战中的基础内容,而在王权失控和军阀混战时代就更是政治常态。

统治者走进了一个永远也走不出的死局,无论是分封制——把国家直接交给自己的家人治理,还是集权制——把国家交给皇帝的代理人即官员负责具体治理,都不能解决政权万世不替的“始皇难题”。

晋室复辟分封制,速死。鉴于汉朝失败的经验,司马氏建立晋朝后对秦始皇体制进行了改造,重新回到古老的分封制,大封宗室王,再次把王朝长治久安的希望寄托在自家人身上。晋建国仅21年后,轰轰烈烈的“八王之乱”开始,统治集团内部的这场大混战是一次相当彻底的彼此

毁灭,西北少数民族势力趁虚进攻,王朝寿终正寝,宗室王的一支在江左建立起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才使晋朝香火勉强得以延续。

隋朝采用集权制,也速死。晋朝的失败,使隋朝把制度的钟摆再一次调回到中央集权,撤郡并州的改革结束了南北朝以来行政区划混乱的局面,在权力牵制、军民分治、建立监察体系等方面全面学习汉朝的制度,但像秦帝国一样,隋帝国亦二世而亡。

自秦至清,统治集团为谋求万年江山的长治久安,一直在不断总结前人经验,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改革,包括行政改革、军事改革和财政赋税改革。这些改革是否真正延长了其统治时间都是个问题,有的改革与其说有利于统治,还不如说有害于统治。一个王朝可能有一百种死法,但谁也不能事先预计它到底是以哪种方式结束自己。

致命的贪婪

腐败深化和统治权威的衰微是王朝危机的开始,通常也是改革的开始。王朝每次遇到危机时,最高统治者近乎本能地采取的改革措施就是强化自己的权力。在帝国,官员的腐败是普遍的。从坏的方面看,腐败是官场的腐蚀剂,官员的贪赃枉法对帝国行政造成严重破坏,从好的方面看,它又是激励官员的手段。也就是说,腐败对于体制运转是一种必要,因而它不可能消除,但反腐却是皇帝挥向官员的利剑,特别是对于新继承大统的皇帝,反腐是他整肃大臣、扫除异己、为自己树立权威的便捷途径。崇祯一上台清除了魏忠贤一派,嘉庆刚执政就清理了和珅集团,都在短期内显示了新君的新气象。但中国式政治是一场输不起的游戏,反腐过于较真,打击面太大,引起官员普遍反感,怕输;反腐动静太小,腐败日益猖獗,也怕输。正是由于必要的腐败存在,皇帝才一直可以反复运用反腐之剑。

中国围棋最富于智慧的技巧是弃子求胜,懂得放弃对获胜至关重要。极而言之,围棋乃是一门放弃的艺术,高手知道如何放弃,何时放弃,知道放弃和获取之间的交换,知道最大程度利用弃子的价值。高手的对弈,最后的生死对决往往在“打劫”之役。打劫,就是利用弃子攻击对手的薄

弱地带。围棋技艺的极至,就是放弃的极至。相反,围棋新手不懂得放弃,虽然他也知道需要放弃,但一进入实际操作,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去尽力守住每一颗棋子,他怕输。越是怕输,越是要看紧自己的棋子,当然,他的结局只有一种,就是输掉整盘棋。即使是两个新手对弈,赢棋的一方也一定是更善于放弃的一方,双方棋艺的高低就体现在放弃上。

政治上把放弃的智慧发挥到极至的,非华盛顿莫属。英国古老的王室存续至今,也完全得益于它放弃的智慧。绝对占有,绝对危险,寻求安全的唯一之策就是放弃绝对占有。中国的统治者却从未表现出放弃的智慧,他们一直模仿秦始皇,但从未超越秦始皇。一次又一次地全盘输掉,一次又一次地建立新朝,后来者没有从前人失败中学到一点真知。他们依然像前代的帝王一样,尽最大努力把守每一个棋子,把任何一个棋子的丢失都看成是巨大损失。每当统治遇到危机时,他们的唯一应对方式,就是近乎本能地加强权力,追求更大的权力集中。他们从历代王朝失败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决心比以前的统治者更加努力地去死守棋子。结果是再次重蹈覆辙。

政治比围棋当然复杂得多。一盘围棋的对手只有一个人,但在一个政治棋盘上,则有很多对手。民主政府中,政治对手都在明处,双方都按照明确的规则博弈,彼此不会给对方造成不能承受的伤害。而专制政府中,政治却是一场毫无规则的游戏,出其不意,诡计和奇谋,在这里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对手通常都在暗处,即使在身边,他也可能浑然不觉,虽然也许隐约感觉到危险的逼近,但仍然不知道危险具体何在,这时,当然要做足种种准备应付可能的事变,结果很可能只是瞎忙一通,不得要领。在自以为危险会出现的地方大力加强戒备,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实际危险却完全在另一个地方出现,当它出现时,却猝不及防。

统治的安全不取决于严防死守,而取决于对抗力量的发展。释放部分统治权力,是释放社会对抗性压力最有效的措施。世界历史上,凡在懂得放弃权力的地方都不会也没有发生过血腥的暴力革命,而死不放弃权力的,特别在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必定会成为权力的牺牲品。

改革开启了下一个危机

改革的目的就是消除政权面临的危险,可非常要命的事实是,统治者永远也不能准确判断危险来自何方。

政府必须在很多条战线上同时防范和进行作战,既要防民,又要防官;既要防范身边的危险,又要防范远处的危险;既要防止内乱颠覆,又要防止外敌入侵和吞并。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统治者又必须去完成不能完成的事。他们把国家当家业,而家业是绝对不能放弃的。但这份家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从来就没有获得天下人的认可,毋宁说,它是一份无主的家业,所有人都可以去占有它,就看谁有占有它的实力。这样,中国传统政治的实质就是连续不断的武力赌博,每一个政权既是这种赌博的结果,又必须参与下一场赌博。赢只是暂时的,输却是绝对的。再强大的政权,智力、财力、人力总是有限,可挑战、危险、敌人则无穷尽。以有限应对无限,顾于此,必失于彼,严于内,必疏于外,这就是所有独揽天下大权的统治集团永远没有安全、永远不会长久、改革永远不会成功的原因,他们永远守不住本来就不属于他们的家业,在他们自认为找到了可以长治久安的可靠制度保障时,却意想不到地埋下了灾难的种子,改革意在医治痼疾,却往往成为下一个危机的起点。

持续受到边境民族巨大压力的唐王朝,被迫对军事体制进行改革,去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防御体系。在北边和西边边境地区建成的九大藩镇,形成了庞大的军事能力,确实加强了应付外来挑战的力量,但不祥的是,藩镇制度同时也形成了远离中央、难以制约、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的一个个力量中心。自安史之乱开始,藩镇演变为地方割据,决定性地改变了唐代的国内政治,动摇了王朝的权威。到了行伍出身的宋太祖,前有唐朝的教训,后有自身发动兵变的经历,不但深知军队的重要性,更深知军队的危险性,为了严防于内,新政权刚刚安定就对军队管理体制实行改革,强化皇帝对军队的领导权,削弱武官的地位。减少了内患,却增加了外忧。有宋一代对外虚弱不堪,它在同北方辽、夏、金的军事斗争中

屡吃败仗,割地赔款,宋朝的两位皇帝徽宗、钦宗父子连同他们的女人、百官被金人虏获,终其一生都受尽凌辱。

世人都只看到皇帝无比风光的一面,看到他们权力无边,享尽荣华富贵,当代电视剧极力渲染帝王们的丰功伟绩和浪漫生涯,人们便以为每个皇帝都想再活五百年,何曾去想还有多少苦命的皇帝。秦二世屈服于宦官赵高指鹿为马的淫威,蜀汉后主、南唐李后主都成了敌国的俘虏,汉献帝作为军阀们争夺的目标,被反复劫持,以便后者挟天子以令诸侯,崇祯皇帝在李自成的队伍包围京城之际让皇后贵妃自尽,又挥刀砍杀15岁的长公主,埋怨她“何生帝王家”,最后自缢煤山。

不幸的皇帝何胜枚举。不幸的皇帝各有各的不幸,他们中虽然有秦二世胡亥这样残暴愚蠢、不堪造就者,但如果以为都特别无能特别昏庸,则不符合事实。刘禅与诸葛亮君臣融洽,可见既贤且识大体;崇祯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决心结束长期以来的严重党争。总的来说,他们的悲剧是他们自己无法逆转的,是形势所定,即使诸葛亮再世,也不能挽回蜀国的失败。当明王朝受到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和充满锐气的清军两面夹击时,已然无回天之力。王朝自兴盛而没落,所呈现的轨迹是一条平滑向下的曲线,而不是一条起伏有致的曲线。中兴只是虚幻的假象,是短暂的回光返照。一般情况下,他们在出生或继承大位时,时局已经紧张,危机正在到来,不但社会显现乱象,朝廷内部也变得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往往始于最高权力的继承危机。在特殊情况下(实际上屡见不鲜),比如帝位出缺,新皇帝要经过朝廷中主要实力派别的协商、斗争、甚至发动一场政变才能产生,而这可能只是随后更激烈的权力争夺战的序曲。皇帝位于权力体系的核心和中枢,身不由己,大权旁落,王朝危机深重的时刻已经到来。

改革收场 革命兴起

清朝集历代管理体制之大成,从专制管理制度上看,它已是十分完善了。在民生政治的管理方面,它在1712年宣布从此以后滋生人丁永不

加赋,这是那个时代政府所能给予人民最大的福利了。在权力制衡方面,朝廷对官员的监管和防范相当严密,全国十八个省由督抚共管,一般来说,总督管辖两到三个省,巡抚管辖一省,官衙分别为正二品和从二品,但总督和巡抚并不是上下级关系,他们都直接向皇帝负责。监察机构负责对官员进行纠察弹劾。在基层控制方面,全面推开保甲制度,每十户为一牌,每十牌为一甲,每十甲为一保,保甲成员的责任就是监视邻里,一旦发现犯罪或密谋造反等行为必须及时向保长举报,保长则向县衙报告。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中国今年,也就是2014年,其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奇怪的是,这不像是期盼已久的迟来的荣光,而更像是时光倒流:中国经济在清代就达到了世界顶峰。当1793年乾隆皇帝以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为由拒绝英国特使通商要求时,所说并非虚言。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前,传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对劳动力的投入,它使人口众多的中国长期保持世界经济的领先地位,1800年前后,清国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出所占比重达33%,加之人民的消费水平一直处在很低的水平上,大清国民对西方工业品几乎无所需求,以至在18世纪的广州贸易中,中国一直保持着贸易顺差,直到白人终于有一天找到了一种中国人有强大需求的物品——鸦片,才扭转贸易不平衡的局面,并使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

世界第一的经济并没有给清廷带来政治自信,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和外来政权统治着人口庞大的汉人,对汉人和臣民防范严厉到病态的程度,它不能容忍对其权威的丝毫挑战,连男人的发式也成为检验其政治上是否忠诚的标准,违背规定的发式都视同谋逆,某句诗文一旦被认定讥讽满人,便大兴文字狱。然而,即使采取最严密防范的措施,清朝的统治还是从根基上被动摇了:秘密会党反清于南,白莲教造反于北,消耗着王朝的生命。等到洪秀全的太平军兴起,完成了给清政府的致命一击。仅仅是由于湘军将领的善意,没有抢班夺权,它才又继续挣扎了半个世纪。

1840年的鸦片战争并没有让朝廷那些饱学之士看清形势,要在又吃过西方人的几次败仗之后,他们才认识到中国正在面临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

局:这帮赤发蓝眼的西夷把中央之国外强中干的本质展现在世界面前。1861年后,变法图强,实现国家的伟大复兴,成为朝廷和地方改革派一致的理想。一直在注视着中国危机的日本很快进行了按西方模式改造政治的明治维新,并开始变得强壮和渴望对外进行军事冒险,它选择在朝鲜——大清的保护国——向衰老的清国发起挑战,于甲午之战大败之。中国政府20年自强改革的成果被日本毁于一旦,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批士子强力推动西方模式的制度变革,一时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西方人的到来,第一次给中国政治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即民权和宪政的视角,从此,传统政治和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的纠结和角力便成为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主题。戊戌变法只坚持了103天就被镇压,但仅仅在几年之后,西方模式的改革方案再次回到朝廷。1905年日本在中国东北赢得了对俄战争的胜利,清政府决定启动立宪改革。但是,西方政治对于中国政府既无法回避,又始终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它的立宪不过是又一次变法图强,它要做的就是把西方政治体制嵌入自己原有的集权体制中,把议会、宪法这些西方政治元素当作维护皇权、使大清强大的有用手段,从而建立其天朝特色的政治体制。

清政府最大的失算,是忽视了这个社会有多种多样的力量存在,而不是只存在政府一种力量这样的基本事实,它以为所有的事情都只按照政府的意愿发展,以为在社会舞台上只有自己是唯一的演员,并按照自己编排的剧本演出,而其他所有人都不过是看客。独角戏演出时间一长就要栽跟斗,要为自己对事实的漠视付出代价。

民权和立宪政体成为年轻一代的革命者追求的目标,“三民主义”是当时中国提出的最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观,包含了立宪政体的精华。辛亥革命标志着改革的新方向在中国出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总纲第一条是“中华民国由中国人民组织之”,第二条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约法还明确了人民拥有自由权和选举权,确立了国家权力之间的分立、制约和平衡体制。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实现政治改革,但为中国政治改革设定了新的目标。

权力现象和所有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经济

现象一样,由生到死,有自己的周期,西方政治以改革顺应权力周期,中国政治则以改革来抗拒权力周期。改革失败导致康、梁变革,辛亥革命兴起最后终结了朝廷的改革。西方因素的介入对中国的政治和未来注定要产生重大影响,当西方的民主和宪政幽灵在中国游荡时,西方的另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也进入了中国,它们都各自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党派代言人,形成对立的两大党派,也就是两大军事集团,它们之间掀起了一场续写中国传统夺权史的腥风血雨的革命,革命的结果,是把中国社会再次带入了传统的权力结构中。

当代改革能走多远?

在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在官方话语中一度占据着重要位置,邓小平反复提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会丧失,会拖累经济的发展”,时过 30 多年,这句话正在得到验证。

在 20 年前,政治体制改革在官方的话语中消失,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变得敏感,随后“中国特色”论大行其道。“中国模式”宣扬的是,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同资本和市场的结合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奇迹。那个曾经被官方认为需要马上予以改革的政治体制,摇身一变成了一种极其可贵的巨大优势。

改革开放将行政权进行了收缩,这是一种被迫收缩,但权力的绝对性并没有改变,在绝对强势的权力面前,一切仍都是渺小的,学术是渺小的,思想是渺小的,真理是渺小的,民众是渺小的,社会是渺小的。大学,科研单位,专家和学者,只有纳入官僚体系中才能取得应有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外部的光鲜和内部的腐朽,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沦陷,在同时进行。

那么,如果照邓小平的想法一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当前这一切就得以避免?从邓小平那里寻求改革支持的人们撰写的大量文章都力争表明,邓小平绘就的系统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才是中国永久繁荣的保证,现有的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都是因为后来的决策者没有按照他指明的方向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

而,当笔者再次查阅那些并不遥远的、零散的改革论述和回顾当时的实际时,发现情况并不那样乐观,并不存在一幅完整的可操作的改革路线图。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其改革思想最核心的部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则构成核心的两翼。在逻辑上,三个目标之间无法一以贯之,在党的高度集权下,不但实现党政分开是不可想象的,政企分开也十分困难。政治,从领导策略上说,它是一门艺术,你可以表现个性,挥洒自如,但从制度安排上看,它却是一门严谨、精确的科学,在目标和路径选择之间有严格的一致性,彼此限定对方。

中国 80 年代的政治经济改革都是对毛泽东时代作出的反应。改革者们亲身经历了由一个人统揽大权的种种磨难,大吃苦头,他们的命运和沉浮决断于一人。被毛打倒或被批过的党的高级官员,对政治改革最容易达成的共识就是实行集体领导,结束由一人独断朝纲以及由此引起的“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状态。

对改革者来说,他们的第一课就是要破除民众对毛泽东的极度神化和绝对迷信,为此,他们特别强调民主,要民众敢于讲话,敢于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限制。这里的民主,与现代政治文明概念体系中的民主概念不同。这里的集体领导,主要内涵是变一人统治为多人共治。集体领导体制是对权力的现实格局的承认,即毛泽东之后党的最高领导圈内已经没有人能够独享大权。改革者希望,集体领导能给权力集体带来了更宽松氛围和更大的安全,权力集团的成员不会像毛时代那样大面积地遭受运动式清洗。80 年代最成功的政治改革要算是在形式上结束了国家最高权力的终身制,实现了任期制。

改革的边界线与改革者的利益边界线是一条完全重叠的线。以改革者为圆心、以改革者的利益为半径划出的圆,就是改革的最大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改革者的利益不会受损。“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显示其对待改革的谨慎态度,当改革一旦危及到自身的核心利益时能够及时回撤,必要时猛然踩下了刹车。在固守权力的目标下,能够改革的东西事实上就很少。■

(作者单位:新华社四川分社)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张钦礼一案的前前后后

○ 陈 健

(一)

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上世纪60年代,新华社一篇关于他的大通讯,使他轰动全国。而和他一起在兰考创建了一片新天地的县长张钦礼却鲜为人知。他俩是“亲密的战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

我提笔写这桩案件时,突然改变写法,把结尾移到开头。

张钦礼铁窗生涯13年,出狱后于2004年5月7日去世。兰考十万群众自发地为他举行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囚徒荣归”的葬礼。兰考县城万人空巷,通往墓地的大小公路两旁、农家田埂地头,群众为他摆的祭品是一碗碗清水,是杂面窝窝头,赞扬他为官一生,两袖清风;怀念他在贫困饥饿的上世纪60年代,和焦裕禄结伴带领他们走出困境、生出希望,使他们免受饥寒,甚至于饿死。

我和老伴周原当日给他的唁电:“苍天有眼欲落泪,万民有口皆是碑。”

时隔九年,2013年8月,张钦礼88岁的老伴刘秀芝因脑梗住院,想见我一面,85岁的我,冒着近40度的酷热,从北京到兰考,与秀芝数次相拥而泣后,即去拜祭张钦礼。他的墓地周围已成一片碑林。这些石碑、玉碑的立碑者,不仅来自兰考和河南其他县市,也有来自山东、河北、上海、台湾的。数不清多少万人在60多块墓碑、感恩碑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好像每一块石碑、每一个人名,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有一块台湾的感恩碑,特别耀眼,碑文记载:一位叫刘中豫的老兵,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时,撇下他3岁的孤儿,这个孤儿在张钦礼的关爱下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就职于政府机关。碑文最后两句是:“以旌张公之德,彰显千秋大义。”那个年代的人都知

道,谁要是扯上和台湾国民党有什么瓜葛,是要整肃的。

张钦礼三次遭难时,周恩来总理三次解救他,也没能改变他的命运。

文革中,河南省委曾给中央一份报告,提出保护兰考、林县两个典型。毛主席在此报告上批示:“同意”。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过程,一个很复杂的历史现象。

习近平担任副主席期间,在兰考视察时曾问过张钦礼的情况。时间是2009年4月1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问:“当年和焦裕禄一起带领干部、群众除三害的那位县委领导是谁?”时任新闻干事的刘俊生答:“县委副书记张钦礼。”习又问,“这位同志还在吗?”刘答:“他去世了。”

(二)

张钦礼是兰考人,他的父亲张元谋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由吴芝圃(解放后任河南省省长、省委书记)领导的著名的濉(县)、杞(县)、太(康)农民起义运动,和吴芝圃相识。起义失败后,回兰考和妻子师华清一起打游击、打鬼子。张钦礼从小跟随父母,受到革命的熏陶,1943年参加地下党的活动,1945年入党,1954年任兰考县县长,对兰考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对兰考的群众有很深的感情。

兰考座落在黄河边上,黄河多次在这里决口,形成了风沙、盐碱、内涝的自然灾害(以下称三害)。1958年以前的兰考,经过治理,三害有很大的变化,虽说还是豫东老灾区的穷县之一,但群众的日子还过得去。大跃进反而使兰考更穷了。但当时的兰考主要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具体情况我后面再谈。

张钦礼的全部不幸在于他说真话。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57年反右时,兰考九百多名脱产干部,却划了366名右派。起因是县委组织部部长孙跃堂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和原来的妻子离了婚。不久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孙跃堂怕他“惹是生非”,捏造罪名将他打入监狱。1957年反右时,开始叫帮助党整风,几个知情者在县委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随即就有二百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转入反右时,这些签名者都划成右派。张钦礼为他们大声疾呼,鸣冤叫屈。为此,他受到了“撤销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孙跃堂呢?虽有“错误”,但因“引蛇出洞”有功,原职原薪调到邻近的东明县工作,不久又晋升为县委副书记。

张钦礼的灾难由此开始。他作为党内“异端”的形象,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直到生命的终结。

1958年秋,省里召开地、县秋粮征购大会,要求各县报产量、报征购数,报了三天,层层加码,也报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购数字。张钦礼在会上发言了,他说他不仅报不出来,其他地县报出的数字都是假的。他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张钦礼被押送兰考接受群众的批斗,批斗八个月,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降了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张钦礼劳改的地方叫老君营,县里只给他16元的工资,每月还要交8元给生产队。开始在大食堂吃饭,1960年春群众普遍浮肿,村口路边经常有饿死的人。大食堂解散,张钦礼到群众家里吃派饭,有时吃的就是群众偷偷从外地讨来的发馊发霉的“百家饭”。当时外出逃荒被称为“盲流”是要受惩罚的,但这些去外地讨饭的群众不避讳他,告诉他不光兰考有饿死的人,外地也有,他们听说,信阳地区有的村庄人都饿死光了。有一段时间,张钦礼也饿得不省人事,妻子来看他,他不认识她,她千方百计把他救过来。

张钦礼开始给周总理写信。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横祸。他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省委领导压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让人讲话。许多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好干部好党员横遭批斗,开除党籍;好多群众逃荒要饭,有的饿死。”这使他这个

当县长的彻夜难眠。他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写完信的时间是1960年10月28日。

一天夜里,一群饥民来到张钦礼的草屋,叫他信不要寄出,免得被当地截扣后败露坏事,干脆去北京找周总理。他们为他准备路上吃的干粮,偷偷把他送到火车站,千叮咛,万嘱托,叫他到北京见不到周总理,打不赢这场官司就别回来。

张钦礼能见到周总理十分不易,门槛多,好同志也多,细写起来要用很多文字。总之,中南海接待处的一位马局长,先把他的信交给了周总理,安排好他的食宿叫他等待。1960年12月9日上午10时,马局长带他去见周总理。周总理先看到张钦礼的信,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浮肿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的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开始有些犹豫,稍后慢慢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菜团子成了碎渣,掉到地上,这是用树叶掺一点杂粮做成的。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总理眼里有泪光,张钦礼在一旁也哭了。

张钦礼从北京回来,关于他的平反,一波三折,拖了半年多。这中间地、县委给他平反留个尾巴,他不签字,又回到他劳改的老君营,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派人来找到他。

他先在省委大院碰到已经停职反省的吴芝圃,吴问他:“听说你去中央反映河南的问题?”张答:“我去了,连你也告了。”吴芝圃一时语塞,又问:“你爹可好?”张答:“我爹不好,饿得浮肿。”说着,用手指按了自己的腮帮,按了个坑,说:“我也浮肿。”这样的一问一答显然很不愉快,张钦礼赶紧走了。

刘建勋临危受命,来河南解决饥饿的问题。他来河南前,请示周总理,总理给他两个字“化缘”。刘建勋理解是“要饭”,就是向一些稍微富裕的省、市“要粮、要菜、要一切可能吃的东西”。

张钦礼见到刘建勋,刘对他说,国务院来了

电话,问你的情况,让我听听你的意见。张钦礼谈了群众的饥饿和他的平反阻力。刘建勋请他吃了饭,代表省委正式给他平反。他回到兰考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和县长的职务,领取了三年补发的1246元工资,把它全部捐给了“县救灾办公室”。这笔钱对张钦礼一家可不是小数目,他的夫人月工资40多元,要养活五个孩子和她自己。张钦礼对妻子说,群众比我们更穷,有的正在挨饿。

刘建勋了解了像张钦礼这样的干部,平反的阻力这么大。随即以省委的名义下达文件:凡在反对浮夸风中受处罚的同志,他们的问题一风吹。

(三)

焦裕禄1962年冬由洛阳矿山机械厂调到兰考任县委书记,他在这个工厂工作十年。他带着大企业熏陶出的新知识、新思维来到兰考。

不错,他是带着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的精神来到兰考。当时兰考的情况怎么样呢?全年粮食的总产量只有六千万斤,是大跃进前的三分之一;以粮为纲,占全年总收入三分之一的芝麻、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有的连种子都没有了;大批群众外出逃荒要饭;大批牲畜死亡;树立在大风口上的五十华里长、十道防护林带近两百万棵树,大办钢铁时,全部砍光,风沙再起,形成新的沙丘群;一个总人口36万的县,三年来人口减少了12万,不能说这些都是饿死的,一是饿死的,二是农村妇女不生育,还有其他原因。

县委大院有一个办公室,叫“劝阻办公室”,从全城各个出口处劝说堵截外出讨饭的饥民,这叫阶级斗争,因为他们出去讨饭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留在家里的群众,坐等救济,又是一大批干部把国家的救济粮分送到群众手里。在没有任何副食的情况下,每人每天六两原粮。

焦裕禄撤下“劝阻办公室”的牌子,换上“除三害办公室”的牌子,调公社干部卓兴隆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使领导救灾的干部成为除三害的干部,坐等救济的群众,成为生产自救的群众。坐等救济是伸手要恩赐;生产自救,是创造自己的生活。焦裕禄还到火车站,对外流讨饭的群众不劝阻不堵截,而是把他们送上火车,并嘱

托他们,讨饭的地点不要太分散,便于大家互相照应。

他树立了四种不同类型的生产自救的典型,称他们为“四杆旗”。它们是秦寨、赵垛楼、双杨树、韩村。

焦裕禄听说有两个来自广东的技术员魏建章和来自湖南的朱里楚,他们正在兰考搞“农桐间作”的实验。由于这项科研成果可以防风固沙,适宜在沙区试验推广,所以选在兰考。他们住在一片沙地的两间草房里,吃的是粗粮野菜,加上风沙干旱,使这两个南方的年轻人多次生出撤走的念头。焦裕禄立马意识到这项研究的价值,通知粮店全部供应他们大米。当时不仅是饥饿的年代,也是知识和知识分子被贬值的年代。一般高级干部,是没有资格享受全部细粮的。后来这项研究成果,不仅对以后张钦礼领导兰考生产大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也在豫东、全国几千万亩沙地大面积推广。这是后话,那时焦裕禄已经去世多年了。

焦裕禄组织的120人的调查研究组,分三路调查摸清了风沙、盐碱、内涝的底细,制定了一整套除三害的规划。他是作长期打算,要把除三害的工作放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

焦裕禄在兰考没有像张钦礼、卓兴隆、潘子春、蔺永沛、樊哲民(他们以后都遭受迫害)等领导干部的鼎力相助,不要说工作成绩,恐怕也难以立足。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时由中央电台著名的播音员齐越播出,他多次被焦裕禄对贫困、饥饿中的群众人性化的关怀情节所感动而哽咽着播不下去。

(四)

焦裕禄过世几个月,四清运动开始了,开封地委派出2400多名团员的“四清工作团”进驻兰考。他们一到兰考,就全面夺权,对准的就是当年焦裕禄抓生产的那个班底,张钦礼首当其冲,他被停职清算了一年多。

这中间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周原来兰考采访焦裕禄,向总社副社长穆青汇报了焦的事迹后,穆青、冯健来到兰考。1966年2月7日新华社播发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长篇

通讯,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四清工作团一位负责人气急败坏地大叫:“早知道先来兰考采访的周原是个摘帽右派,当时就该把他轰走。”焦裕禄病逝在郑州,埋在郑州郊区,遵照他的遗愿:“我活着没把沙丘治好,死了也要埋在沙丘上。”兰考举行了迎接他骨灰的迁坟仪式,几万干部群众自发地到车站迎接,四清工作团领导人警告所有四清工作队员,谁都不准去,他自己也没去;在纪念焦裕禄的追悼会上,卓兴隆自编自写了一副挽联挂在灵堂两侧: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画宏图。地委一位负责人喝令“拿下”,张钦礼喝令“挂上”。

焦裕禄在兰考和张钦礼一起制定了一幅除三害的蓝图,在开始实施的时候,就看到一支想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队伍,打头的就是张钦礼。新华社的大通讯里,称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就触犯了长期整他的许多人。这场斗争对张钦礼来说是延续,就像一部书,分上下两卷,都由一根线串起。对张钦礼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罪名”,都挂在这一根线上,都是在中央合理合法的政治运动中罗织的。

焦裕禄也许没有意识到,他来兰考的思想、思维和一套工作运行机制,对于长期抓阶级斗争、抓老灾区救灾工作的路数是一种颠覆。

(五)

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兰考的四清工作团,立即改为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由副团长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县委抛出了张钦礼,让人贴出张钦礼的第一张大字报:“张钦礼是1957年的漏网右派”。9月间,大城市破四旧的红卫兵来兰考串连,县委借用他们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传单:新华社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一株修正主义大毒草,理由是没有写阶级斗争。材料由张钦礼提供,他借此出名,是“政治扒手”。把他两手染黑,戴了高帽,打了花脸,游街示众。张钦礼东藏西躲,甚至于躲到临界的山东省。

1967年1月29日,开封军分区介入兰考的文化大革命,当天下午1时到达,立即开始大逮捕。县委书记穿上军装和部队配合,把当年焦裕



张钦礼(左)与老农

禄的得力助手、重用的人才、提拔的干部、在全县树立的一批先进生产队的干部、群众,甚至焦裕禄结交的农民朋友,都一网打尽。兰考一片腥风血雨,城乡路上到处是披枷带锁、五花大绑的干部、群众。到2月22日,共逮捕了1206人,兰考和邻近东明、杞县等三个县的监狱,塞满了兰考的“犯人”。“要犯”都砸上了脚镣。对这些人的批斗场面惨不忍睹。

张钦礼被游斗一百多场,几次打昏,打伤了肋骨。他在监狱半年多,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直到1967年7月20日,周总理指示河南三派群众组织来京开会协商,了解了张钦礼的处境,当即指示河南军区负责人,限日把张钦礼送到他面前。张钦礼半夜被人从监狱里架出上了吉普车,他以为是对立面要枪毙他,车到县界,他要求停下车,他说,我死也要死在生我养我的兰考。几个解放军说,明天不把你送到指定的地点,我们几个都要掉脑袋。

周总理看到张钦礼,一时说不出话。七年前,他第一次见到的张钦礼,是从劳改地偷偷来京“为民请命”,衣衫褴褛,面黄浮肿,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他立即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带他去吃饭;这次见到的张钦礼,是从监狱里放出,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赶快把他送进医院。

1967年7月25日,下午一点半,周总理在京西宾馆接见河南支左部队的军官说:“河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郑州的二七公社、开封的八二四、洛阳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

央电台,当时都播发、利用了总理这一指示的新闻。从此以后,周总理支持的叫造反派,他的对立面叫保守派。河南广大干部、群众支持参加这些造反派组织的盛况可想而知。兰考“捍卫焦裕禄司令部”参加的是开封的“八二四”,张钦礼自然而然地成了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成为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开展的清查“三种人”的对象。

张钦礼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来见周总理。总理指示他: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要紧跟;回去成立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由大乱走向大治。

(六)

张钦礼回到兰考被委任为兰考县革委会主任。他首先从监狱中放出二、三月间被逮捕的1200多名干部群众,恢复了4000多名党员的党籍,整修了被破坏的焦裕禄纪念馆,制定了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条例。然后着手继续实施焦裕禄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规划。

仅仅两年的时间,兰考已经封住一部分沙丘,引黄淤灌出五万亩盐碱地。兴建了机械、农修、化肥等一批小型工厂,有力地支援了农业。不知为什么,省委突然派了一批解放军来到兰考,撤了张钦礼革委会主任的职务,批斗他一个多月,说他在兰考以生产压革命,那项劳动奖励条例,是典型的物质刺激,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批完斗完,把他发配到信阳大别山里。后来张钦礼才知道,他在兰考的所有活动,都被对立面报告给了省委的二把手王某。王某是空军某部的一名军长,支左到地方成为省委二把手。张钦礼当时并不认识王某,也不了解他的背景。

张钦礼在信阳挂个虚职,由押送他的几个人日夜监管。在监管人员中,有一名是省公安厅副厅长。为了使张钦礼不与外界接触,又把他送到深山里一个叫灵山寺的古庙里。张钦礼在大别山被软禁了五百四十多天,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

周总理于同年10月7日再次指示河南军区负责人,在三天内把张钦礼和领导修建红旗渠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送到北京。

信阳军分区派出十几名解放军在大别山里

搜寻到了张钦礼。当张钦礼和杨贵走进总理指定的地点时,许多党政军的领导都在这里,刘建勋也在。这是批斗王某的一个会议。会上,张钦礼才知道王某此时已被定为林彪的死党,是林彪在河南的代理人。周总理质问王:“你为什么要迫害他俩?一个在平原治沙治碱很有成绩,一个在山区治山治水很有成绩,你为什么要迫害他们?”一连几个为什么。

张钦礼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一个贫困县的七品芝麻官,竟和林彪的死党挂上钩?他茫然不知所以,脱口请求总理帮他离开河南,总理答应了他,当然没有兑现。事后,他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下了当时想离开河南的心情:

“我在河南工作有一种身在险境苦挣扎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摔得粉身碎骨,这不是已经摔了三次了吗!虽不是粉身碎骨,也折腾得少皮没毛,死去活来。运动一来,他们掺水和泥,说你是圆的团团,说你是长的拽拽,说你落后保守,工作没跟上,这些话都不论斤两,轻的批判斗争,重的撤职罢官、开除党籍,甚至蹲监坐牢。官大一级,压死泰山,他们都是上级,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没有理。俗话说,树移死,人移活,免得低头不见抬头见,老成见老印象,运动一来都起新作用。”

(七)

总理想把杨贵、张钦礼留在中央工作,刘建勋说,两个典型总得给河南留一个吧。如果张钦礼当时留在中央,就是另一种命运了,因为杨贵在北京安然无恙。刘建勋也是出于好意。

张钦礼回到兰考,在省革委会、省农协都挂有官职,还有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等职。张钦礼对所有新封的官衔都很淡然,他只坐镇兰考。张钦礼说,苍天有眼,让他这一次能安安静静集中六年时间领导群众和三害斗争。

刘建勋有一段话评价他们,“你们这帮人啊,疯啦!不要命啦!从工地被捕进了监狱,从监狱出来又去了工地;除夕干到半夜,初一天不亮又去了工地。”刘建勋说的这帮人就是当年饿着肚子跟着焦裕禄苦战三害的干部、群众,之后又跟着张钦礼几进几出监狱之门而不改初衷,继续拼

命除三害的这一帮人。

张钦礼这帮人在监狱时,都砸上脚镣、带着手铐。放风时固阳公社社长吴思敬还悄声对张钦礼说:“我睡不着觉,琢磨出‘九孔闸工程上、中、下的施工方案’。”张钦礼哽咽着:“我的好兄弟,咱俩在这种地方还能想到一块。”这帮人中的一些干部、群众,只要从监狱中、各种批斗学习班中出来,就直奔九孔闸工地。因为九孔闸工程是引黄淤灌的关键工程之一。

张钦礼这一帮人六年中干出的结果是:引黄淤灌出26万亩沙荒盐碱地为良田;种植了56万亩农桐间作地(区);建立了60个县、社工厂,填补了兰考历史上没有工业的空白。仅县办的16个工厂,年产值4000多万元,税利760多万元,粮食产量由1962年的6000万斤增加到三亿两千多万斤,人均800斤,家家有余粮,是解放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兰考也由老缺粮县,到1976年,已上缴给国家3000万斤粮,100万斤皮棉,80万斤油料。就连当年来兰考视察工作的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看到兰考在文革的混乱中,打出一片新天地,兴奋不已。不知在什么场合,不经意地对张钦礼说,大庆缺少副食,黑龙江省过年也只能给他们500头生猪。张钦礼立即派当时的副书记杨捍东和四杆旗的支部书记给大庆送去1000头生猪、60吨粉丝、120吨酒。张钦礼说,不能让铁人的大庆工人缺肉菜。

(八)

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开展的清查运动,又给某些人迫害张钦礼和“捍卫焦裕禄司令部”这个群众组织提供了机会。在“四清”和文革初迫害张钦礼的那位领导人成了文革的受害者,被提升为商丘地区政法书记,不知为什么此时的兰考县却划归商丘地区管理,这样,兰考的清查工作,就由这位领导人一手运作了。负责河南省清查运动的是省委书记戴苏理、主管政法的副书记赵文甫。张钦礼被捕前几天,戴苏理把他叫到省委,威逼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并作检查,否则,矛盾的性质就要转化。纪登奎在文革中比较早地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建勋和他有不少接触。张钦礼不揭发不检查,说了几句讽刺话,扬长而去。

几天以后,张钦礼在治黄淤灌的工地上被捕。当刑警给他戴上手铐时,他放开嗓门,对着蜂拥而上的几百民工高喊:“苍天有眼,焦书记在地有灵,兰考所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今天是1978年10月16日,记住这个日子,这是一个人妖颠倒的日子……”开始,工地上一片哭声,稍后,大家冷静下来,立即推出了张传岭、阎协崇、史占卿三位农民代表,让他们回家给张钦礼准备点吃的,去郑州监狱探探虚实。三人来到郑州监狱门口,要求和张钦礼见面,刑警不允许,后要求把吃的转给张钦礼,开始不同意,他们苦苦哀求说:“老县长跟着我们过穷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饿就流虚汗,支撑不住会昏倒不醒人事,有口吃的垫垫就能挺过去,兰考的人谁都知道他这个病啊!”刑警允许了。无奈,三人在狱墙外面转悠,他们哭着转着,转着哭着,也不知道转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

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报》一版刊登一条新闻,大标题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张钦礼。”同一条新闻还有其他两个。张钦礼的罪名是:

- 1.“恶毒攻击中央领导”(指文革中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 2.“反党乱军,践踏社会主义法制”;
- 3.“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原四清工作团的领导人);
- 4.“擅自扒堤决口,破坏工农业生产……”(实际是引黄淤灌工程)。

张钦礼对所有指控都不承认,审讯他的人员说:“你有问题由省委决定,法律服从政治,我们这里只是过个手续,你再辩,加判”。

张钦礼在郑州监狱关押了一年多,直到1979年12月24日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钦礼有期徒刑十三年。因张钦礼一案和“捍卫焦裕禄司令部”所涉及的清查对象有4000多人。其中120人判刑,其他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或降级下放,或兼而有之。

焦裕禄当年树立的四杆旗的支部书记,两名死在狱中:一名是秦寨的赵新贞,一名是赵垛楼的李运兴。赵新贞原是国家干部,回村领导群众生产自救时,连微薄的工资都搭上了。他当时想到群众身体普遍虚弱,提出:不能干一天干半天,

不能挖一锹挖半锹。焦裕禄把这个口号推广到全县,结果,外出要饭的群众听说新来的焦书记能体恤灾民的疾苦,都陆续回来参加生产。赵新贞是焦裕禄最看重的基层干部。他被判刑十年;双杨树的王发祥找不出“罪证”不能逮捕判刑,在家监督隔离,第十年在隔离中死去;韩村的杨素兰是位女知青,她回村带领群众割草几十万斤卖给国家,买点小型农具生产自救。文革中,张钦礼遭难,她抱着吃奶的孩子被捕入狱,清查运动时,她闻讯跑了,在外流浪四年,捡了一条命。

卓兴隆当年在兰考时,被焦裕禄赏识,从公社调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他和张钦礼成了焦裕禄的左膀右臂。姚依林来兰考视察时,也发现卓是个人才,建议刘建勋提拔重用他,刘即调任他为柘城县委第一书记。他任书记时,颇有焦裕禄的风范。清查工作时,卓兴隆是一位优秀的县委书记,后开除党籍。卓兴隆咽不下这口气,患肝癌英年早逝。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通讯播出后,兰考云集了来自全国的300多名作家记者。新华社著名的记者华山已从新华社调到全国作协搞创作,也来到兰考。他见到周原第一句话就问:“你能用一句话概括焦裕禄吗?”周即回答:“焦裕禄像一道闪电,照亮一下夜空,陡然消失了……”周原还没有说完,华山接过话茬,而且一激动就结舌:“……留……留……留下一片火焰。”兰考的这片火焰被集体合谋扑灭了。

(九)

张钦礼从郑州监狱转到新安监狱服刑,兰考的干部、群众、勤杂人员、小商小贩及机关食堂的炊事员等,他们很不容易凑够路费,费了很多周折,带点能解救张钦礼“饿痨病”的食品,去新安探望他。从兰考到新安监狱有700多里,要乘坐火车、转长途汽车,再步行几里才能到达。东坝头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全村人凑钱,选出了两位代表,买了二斤水果糖,去探望他。他俩对张钦礼说:“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这里坐牢,选县长时,全村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花为生的兰考农民,相约在同一时间去探望张钦礼。他们能为他带的食物就是各自买了两

个烧饼,每个烧饼里夹两根油条。监管人员问他们要介绍信,他们说没有,又问他们和张犯是什么亲戚关系,他们说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们为什么来探望他?”监管人员不准他们进来。四位农民一起跪在监狱门口,不走也不起来。他们说,张钦礼是他们的老县长,他为兰考人民坐监狱,现在跪下是向他行大礼。这位监管人员被感动了,把张钦礼叫了出来。张钦礼看到这四位素不相识的农民,每人手中捧着两个夹油条的烧饼,也立即向他们跪下。五个人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相对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监管人员也泣不成声。

也是在新安监狱。一天来了一位领导,他很想目睹一下这位曾被周总理三次解救、焦裕禄亲密战友张钦礼的“尊容”。提审他的两名监管人员很想讨好这位上级,满足他的好奇心。他们喝令张钦礼跪下,张钦礼不动声色,不理不搭。他后来对刘秀芝说:“他们打掉了我的门牙,顺口流血,砸上十八斤的死刑脚镣。还故意往脚脖子上砸,一锤下去,砸掉一块肉耷拉下来。我忍住满腔怒火,不吱声,不下跪!”

张钦礼的老伴刘秀芝也是抗日战争参加工作的老干部老党员,因为张钦礼是一县之长,怕影响不好,总是限制提拔使用她。张钦礼判刑时,她是县供销社的干部,月工资只有46元,每月探监时还要为张钦礼带吃的。先在郑州后又在新安。每年除夕这天,她带着白面和肉馅,从兰考出发天黑赶到监狱。看着丈夫吃她包的饺子,为的是让他得到些许安慰,熬过漫长的十三年铁窗生涯。几十年来,为了张钦礼,数不清的威逼恐吓,逼她揭发张钦礼,她只有一句话:“钦礼是个好党员。”永远的七个字,包含着他们志同道合;支持他的所作所为;理解他把这么一个经常比一般农民还要贫困、比一般干部还要受屈辱的家庭交给她承担。

周原曾多次做过努力,保张钦礼监外就医。后来一封给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杨析综的信,起了作用,杨在信上批示:“相信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保证。”也只是提早半年多释放了他。时间是1990年5月20日。

张钦礼释放后,我和北京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去郑州看望他和刘秀芝。我们和他谈了两天两个半夜,从采访焦裕禄到监狱生活,了解了很多有意义的细节。谈到焦裕禄,他仍然心存敬意。他说,焦

书记留下的不仅是他的精神,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他说,他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是,由于总理的支持,使他有六年的集中时间,带领当年和焦裕禄一起组织过的除三害队伍,创造了从解放到他被捕时的兰考黄金时代。他说,他不敢预测,如果焦裕禄不过世,他俩继续合作,焦该是何种命运?

(十)

张钦礼的葬礼和他墓地的碑林,已经见证了他和群众之间绵绵无尽的感人事迹。但有两件事例,仍令我感动。

张钦礼在最风光的时候,省里、地区给兰考两辆吉普车,张钦礼转手卖了,为什么?当时兰考有2564个生产小队,还有42个小队的群众口粮不足。张钦礼利用卖车的资金,为这些小队打机井,配了八匹马力的柴油机,旱时浇地,不浇地搞副业。解决了群众的温饱。他对刘建勋说:“一个县委书记,坐着小汽车开到吃不饱肚子的群众面前,我脸发烧,群众当面不敢说什么,背后捣共产党的脊梁筋。”刘建勋把这事告诉了一同来的姚依林。姚大声说:“我回去给总理汇报,让他对兰考的事放心。”

张钦礼有个女儿,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解放军女战士。一切都按照正常手续办完,快要走时,张钦礼把她的名字划掉,换了一个贫农的儿子。他对女儿说:“这个贫农的儿子如果在部队里能提干,他和他的家人都可以改变命运。你爹是县长、是书记,你一走向社会,就有一个比他高的平台,你应该让出这个名额。”

张钦礼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做透做绝;人民的司法机器却把他砸进监狱。

原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象,六年前看到了我为张钦礼写的申诉,说:“这是个大题目”;我老伴周原已过世两年,我在他留下的日记中看到“张钦礼代表一个时代”。

现在,兰考有两处墓地,都很出名。一处是焦裕禄的,一处是张钦礼的。历任的中央领导、河南省委领导,还有其他领导,也有群众,都来过焦裕禄的墓地;千千万万普通群众由于仰慕张钦礼的品格,感叹他的人生,也来过他的墓地。共



群众自发为张钦礼扫墓

产党要求的干部,应该是领导欣赏,群众赞誉,现实生活中这两者很难统一。焦裕禄、张钦礼两人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却统一起来了,成为亲密战友。他俩都为改变农民的生存条件,一个在工地累死,一个在工地被捕。

张钦礼和焦裕禄在兰考恰似“一对孪生”,讲一个不能逾越另一个,否则就失去了生命的光彩。■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社科人文 文学小说 党建管理 经济管理 书画摄影

正规出书 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一)社科人文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二)管理和学术类书稿:党建管理、行政管理、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专著;(三)文学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四)小说类书稿: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五)美术类:画册、书法作品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签订标准出版合同,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专业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80-8368

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

综合编辑部 收;邮编:100025

电话:010-57733087、57192223、57733086、57192229

传真:010-89506878;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高晶、牛萍萍、文馨、顾娜(编辑)

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bookhk.net>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真人马沛文

○ 郑本法

光明日报社原副总编辑、高级编辑马沛文老师逝世了，享年93岁。他是新闻战线优秀的理论家、评论家；在长期的新闻工作中，他组织、撰写、修改了大量有社会影响的理论、评论和新闻稿件；特别是1978年5月，他协助总编辑杨西光编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中国思想大解放，为随后的改革开放揭开了序幕。

当时，马老师任《光明日报》副总编兼理论部主任，组织和编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他分管范围的事。在那之前，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句句是真理”。用实践标准取代“最高指示”的标准，在那“两个凡是”还占统治地位之时，政治风险不言而喻。然而，马老认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尤其是带根本性的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能解决大批的积重难返的现实问题”。为此，他置风险而不顾。我结识马老，即源于此。当我得知他是位思想开放、敢讲真话的人，就冒昧给他写信，希望与他建立联系。虽然他是名学者，我是无名晚辈，但他却认真回了信。他的逝世，使我陷入了对他的深切怀念和诸多回忆。

一、我梦见了马老师

夜里我梦见了马沛文老师，其情景大致是：马老师出了本新著，我主动请求推销。马老说：“不用，已经订好了的，司机送去就行了。”尽管他这样说，我还是执意要去。但不知为什么，我起晚了。一觉醒来，看见马老已在鲜花盛开的庭院



马沛文(1921—2014)

里散步、赏花。我抱歉自己起来晚了，急忙穿起，正要向马老打招呼，话没出口就真地醒了——原来这是一场梦。其时是3月7日凌晨2点30分，距离马老仙逝一个月。一个月来，除了悲痛，就是哀思。马老那高大的身材、笔挺的脊梁、发亮的脸膛、严肃而又不失幽默的话语，特别是他那放言改革的政治勇气、刚正不阿、仗义执言的品质，一直活跃在我心里。我再也睡不着了，便立即打开电脑，开始写些纪念文字。

二、遇见不平及时鸣

我第一次同马老师见面是1984年11月在南昌召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年会上。我因发表《“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值得研究》(见《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2期)挨了批，被说成“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与党中央不一致”，直至被开除党籍，险些被送进牢狱；深感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重要作用和悲惨命运，以及整人者受不到应有的惩罚、挨整者得不到该得的补偿之不公，我就在大会上发出《要用法律手段保护人才》的呼吁。会后马老采访了我，并在《光明日报》内参《情况反映》特刊上刊出了《我的遭遇》，使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真相，我很欣慰。

1985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马老《究竟谁该检查》一文，介绍了华中师范学院内刊刊登我那篇研究专政问题的文章以及我因此而受到的遭遇，旗帜鲜明地说：“按理，这位作者应该受到称赞。可是，也怪，他受到的却是批判……”他说，如果说文章的作者“与当时党中央的提法不

一致”,那么,整他的领导“到现在仍与党中央提倡的百家争鸣方针不一致,与党中央反对整人的做法不一致。在整党中,应切实对照检查的该是誰呢?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之前,我曾经致信《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参考资料》主编、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理事长、华中师范学院党委书记高原同志,请他评理,得到了高原同志的保护和支持。1985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老师《赞“保护作者”》一文,该文批评我院领导而赞扬高原同志:“有些领导干部,受左倾思想的熏陶久,中毒深,总是把左的错误做法,看作是发扬党的战斗性、维护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正确行动,往往身在左中不知左,整人成癖,整人成瘾,整人成习,以至恶习难改。”“保护作者”的问题不但存在,而且尖锐地存在着。“《究竟谁该检查》一文反映某省社会科学院领导的问题就是一例。”而华中师院的领导迥然不同,他们挺身而出,“恳切陈词,据理力辩”,为作者讲话,“这种坚持真理的鲜明态度,保护作者的负责精神值得称赞。”“如果有的理论工作者的观点有错误,是不是也要保护呢?回答是肯定的。并不是保护他们的错误观点,而是保护他们研究和探讨问题的权利。对其错误观点自然可以批评,但这种批评,只能以理服人,切不可以势压人,还要允许人家保留意见,进行反批评,努力创造学术研究的自由气氛,这才是百家争鸣。在学术问题的探讨面前,各家之间一律平等。”“况且,我们一时认为错误的,也有以后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可能性……因此,很多学术理论问题,如有争论,也只能继续探讨,不可轻率做结论。否则,发现错了,再去承认错误,不好;要是硬着头皮不认错,更不好。我们切记这个教训。”

平心而论,我那篇文章在当时无非是说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回事儿,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符合我国实际;而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依然主张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不过说在过渡时期未必搞得那样纯,应使其他党派、其他思想和其他经济成分有适当地位;谈不上理论突破,更没有科学创新。现在看来,实行党政分开、改善党的领导、所有制形式以及指导思想等问题都是值得认真研究、应当深入探讨的。正是得到像马老、高原这

样学界知名人士在理论上和道义上的保护和支持,我才能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一些成绩。我因有缘结识马老而倍感自豪。

三、主张内举应避亲

1986年我因到旅顺参加《社会学词典》定稿会议,途经北京时拜访了马老师。交谈中马老好奇地问我“书记专业户”的事儿。我口无遮拦地对他说了某省委书记及其夫人、儿子都是书记,以及当地百姓送其“书记专业户”的“雅号”的事实。会议结束后我刚回兰州就得到《新观察》发表马老《“内举”应“避亲”》一文的消息。我敬佩马老的记忆力和写作能力,更敬佩他主张公平正义和大胆针砭时弊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智慧。

南北朝时期门第观念极深,门阀制度极严,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说的正是这种情形。西晋文学家左思《咏史》之名句“世胄蹑高位,英雄沉下僚”也是对这种腐朽传统的抨击。马老说:“这在盛行世袭制的封建社会中,一点也不值得奇怪。”而在现代社会,“类似的这种封建传统还在传,就很值得人们深思了!”

春秋时期晋国大夫祁奚因年迈请求退休。晋公问,谁可代替你?答曰:解狐。有人惊诧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答曰:晋公问的是谁可代替我,没有问谁是我仇人。不久,解狐去世。晋公又问,谁能代替解狐?祁奚答曰:祁午。又惊诧说,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又答曰:晋公问的是谁能替代解狐,没有问谁是我儿子。对此,马老评论说:“祁奚的事迹之所以千古流传,就是因为他举荐干部的标准只是惟贤惟能,而不管是仇是亲,这是何等无私的品德!”而我们有些领导安排干部时往往“惟亲是举”,与祁奚的品德相去十万八千里,怎么能够相提并论说成是“内举不避亲”呢?他指出,群众中“废了终身制,来了世袭制”的议论是值得我们警觉的。他认定,为了端正党风,抵制“夫荣妻贵、父荣子贵”一类的封建宗法思想,“内举”应“避亲”。

四、要民主不要主民

1986年底举行人民代表换届选举时,我院选

区发生这样一件事：我原本是选民推举的两位候选人之一，因选举领导小组组长即我院院长对我有成见而把我划掉，由他喜欢的人取而代之；正式选举的结果是，两位候选人得票都没过半，我虽不是候选人，得票也没过半，但却比候选人的得票数多得多；见势不妙，院领导提出放弃代表指标，被区选举委员会依法驳回，我成了第二轮选举时的第一候选人，并成功当选；结果一宣布，大多数选民欢欣鼓舞，而我院主要领导却垂头丧气；事后院党委书记在大会上竟说：“我们中国人的素质太差……现在还不能直接选举，这次选出的是啥人？”

对此，马老师既感到“十分气愤”，又认为“发人深省”。他在首都1987年1月20日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借用我们院一位老先生的话说：“这是民主的胜利”，是对“主民者”的示威。那位党委书记的话，除了说明他本人的“素质太差”还能说明什么呢？马老指出：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的“主民”思想和抵制民主思想是普遍现象，“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有必要把这种思想革掉吗？不是有必要从各方面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吗？”

五、最值得自豪的事

1988年马老师赴青海调查省领导残酷迫害优秀干部王生福的大冤案。当时他虽已年近古稀，但却依然从北京乘硬座火车到西宁，又从西宁驱车穿越被称为“天空无飞鸟，地上不长草，氧气吃不饱，风吹石头跑”的柴达木盆地腹地，不远万里，深入到案件发生地。与他合作的是时任光明日报驻青海记者站站长陈宗立同志。应马老之约，我也从兰州就近到西宁同他们相聚。老陈负责收集资料，马老执笔撰写述评，我专门誊清文稿。令人难忘、非常感人的是，马老白天接待来访梳理案情，夜晚集中精力伏案写作（那时宾馆房间里灯光灰暗，所谓“伏案”，其实是“伏台”，即伏在卫生间的洗漱台），通宵达旦、夜以继日。6万多字述评《正与邪、法与权的一场大搏斗》（以下简称《大搏斗》），几乎是他一气呵成的！若不是有扶正抑邪的品质，若不是有重法蔑权的坚定信念，若不是马老博学多识且才华横溢，怎能写出如此精彩的奇文？述评全文分王生福是非常优秀的共

产党基层领导干部、王生福的大冤案从形成到平反的全过程、王生福的大冤案提出的几个理论问题等三部分。这样长的文章到哪儿发表呢？马老采纳了我的建议，使该文发表在当年的《法律咨询》。

文章发表后其反响是强烈的。先是《文汇报》做了介绍，接着是《新华文摘》进行了转载，《中国人才报》《领导科学报》发表10多篇文章从多种角度对《大搏斗》进行了赞扬和评论。而制造冤案的青海省委主要领导人（两届省委领导人中三名省委书记、两名省委副书记、三名其他常委）却极其恼火，他们或向中央告状，或组织力量反击，或要《法律咨询》公开检查，或要对《大搏斗》作者做出严厉处理。当时马老给我来信说：青海告状，我在“候审”；“反正我们有承受任何处理的精神准备。”并强调说“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做的一件最值得自豪的事”（详见马老专著《鱼雁集·与郑本法的通信》）。

因文获罪，早在马老预料之中，且早有准备。他在《大搏斗》引言中就称：“多年来毁灭法制的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造成的积弊，许多领导机关，包括有的像省委这样高级的领导机关，他们多的是专制意识，少的是法制观念……脑子里装的是权力至上的封建思想，甚至面子至上的腐朽观念，为了维护冤案制造者的所谓面子，受害者即使冤沉海底，他们也在所不惜。他们看国家法律似儿戏，视人民利益如草芥，加上党内一些干事是外行、整人是内行的人，趁火打劫，挟嫌报复，有些坚持原则，嫉恶如仇的同志倒往往成为他们打击的对象，甚至出现无能者整有能者，谋私者整无私者的怪事。如此这般，产生冤假错案哪能不易？平反冤假错案岂能不难？”他坚信王生福大冤案具有极大的典型性，并认定叙述和分析它从产生到平反的全过程，“对揭露党的某些组织的腐朽性，认识改革党的领导的迫切性，懂得实行司法独立的必要性，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他能够泰然处之，沉着应对。

六、劝我潜心搞科研

在交往中，马老既同情我的遭遇，精神上给予鼓励，行动上坚决支持，又担心我把握不住自己，生

怕我太分心,耽误了搞科研、做学问。来信强调:“潜心科研,不管外事,打更厚的基础,出更多的成果!”这是良师对学生的高度负责,这是益友对同仁的真诚关心。对此,我心领神会,非常感激。

我曾向马老转述我与我院党委书记在一次大会上的交锋过程。起因是之前的院党委扩大会为“追谣言”(即院领导按关系亲疏,对中层领导人分等处理,有的退居,有的留任之说),把我围攻一顿。我就在大会结束之际提出有话要说几句,即:那天党委扩大会上我没按你们要求出卖他人,今天“造谣者”在现场,可当面把问题搞清楚,看是谣言还是真事。党委书记立即起身大声训斥:“今天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看来还需要讲几句。今后凡是在大会上讲话,必须经过批准!”我问:你今天“本来不准备讲话”,可见会上没安排你讲话;你现在讲话经谁批准了?他无言以对,就大喊:“你郑本法不要牛皮!”我回应:“封建专制的时代过去了,你×××也别牛皮!”

对此,原以为马老会鼓励我几句,或者至少会为此开怀大笑。然而,恰恰相反,他却认为我不该如此。事后他还来信严厉地批评我:“你把同领导的关系搞得太紧张了,舌刃唇枪,剑拔弩张……劝您不要再发挥这种斗争精神,而应发扬钻研精神。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读书、科研上,这方面的天地是宽的。而向领导的不正之风作斗争要适可而止,因为没有多少余地。弄得不好,会惹出意想不到的麻烦,是得不偿失的。”

仔细品味,马老教诲,句句是金。他对我如此关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子女。而我那种乐此不疲的斗争精神与过去多年接受“斗争哲学”的熏陶不无关系。幸亏马老点拨,否则浪费光阴,势必后悔莫及。

七、左害与史德史识

1993年我院承办全国地方志编纂理论研讨会。会前受托,我邀请马老与会并做发言准备。他回信称:我对方志学无研究,甚至无知识,只能从“信史”“直笔”之类的原则谈,而这样一定会触及禁区;党的历史著作往往既不“信”,更不“直”,维护左的路线和左的传统是其根本目的。

马老自称“无研究”“无知识”,实为谦虚之

词。他据清代史学家、我国方志创始人章学诚“方志为古史”“志者,史之隅”的说法,二十四史前四史中魏蜀吴三国的史书即名《三国志》的事实,认为社会科学志就是社会科学史;“指导修撰史书的理论,同样是指导编纂志书的理论”。会上他以《树立史德,提高史识,清除左害》为题,发表演说,声如洪钟,铿锵有力。

关于“史德”,马老说,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对史学理论有突出贡献,强调“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提倡“不掩恶,不虚美”,主张“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说的是与史德相关的问题。提出“史德”概念并有深刻阐述的是章学诚。他对章学诚“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主张非常欣赏;认为,只有按事物的本来面貌记述事物,而不以人的主观愿望对客观事物肆意增损和妄加褒贬,写出来的史书才是“信史”。他批评对待1959~1962年大饥荒“嫁祸于天,诿过于人”等错误做法,主张社会科学志的编纂应树立史德,发扬“实录、直书”的史学精神。

关于“史识”,马老说,章学诚对刘知几《史通》中讲史学家须兼史学、史才、史识三长进行了发挥,主张史学工作者应有淹灌各种史事的知识,判断史事是非的见解,善于表达史事的文笔;否则,如是非莫辨,甚至是非颠倒,写出来的只能是“秽史”。他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之后的理论务虚会这两件党史也是社会科学志上的大事,揭露了对这两件大事“不举事实,不讲道理,光扣帽子,光打棍子的粗暴批判”和种种攻击,说:这是“典型的是非颠倒,也是典型的缺乏史识。”他相信“纸墨之寿,永于金石”,我国众多的理论工作者“令人振聋发聩的理论大突破”也“终有一天会发出黄钟大吕之音”!

关于“左害”,马老说:“史德和史识的问题,追本溯源,都是左祸作怪的问题。”他推介《中国“左”祸》一书,说该书乃“全景式长篇历史纪实”,记载了1927~1991年中一次次的种种左的灾难,“骇人听闻,发人深省”;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左祸猖獗,许多学者在劫难逃,有的甚至被迫自杀或锒铛入狱。他以自己切身感受动情地说:“左的习惯势力,仍在护左。凡是作者的报道和文章中,要反左,要批左,要防左,一律欲砍之大吉。像阿Q忌讳光忌讳亮一样,有的人也极端忌

讳反左、批左之类，”真乃是“仇人相见，分外眼明”，决不放行，斩之杀之。他希望史志编纂者“消除自己头脑中左的影响，把自己的笔从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编出和写出更好的史志。

马老的讲演，对与会学者大有启迪。

八、真话真文和真人

1996年马老把自己近18年以来在相关会议上的发言和论文汇集集成书，取名《放言集》。受他委托，我做校对，也就自然成了最早拜读这部著作的人。马老是位真人，他说的是真话，写的是真文——这就是我读了这部专著后的切身体会。说起来轻巧，而面对社会现实，做真人、说真话、写真文谈何容易？

《放言集》这部著作既没洋八股，又没土八股，在思想、语言和艺术上独树一帜。它不仅敢于实事求是，而且善于实事求是，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它从广度、深度和力度上对危害多年的左毒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有力的清洗，是件珍贵的精神产品。读了这部书，使我进一步懂得了搞科研、做学问的路子；认识到马老师其品质、理论、知识、语言之长处，无一不值得我学习。

马老对《放言集》中存在的一些缺点、不足或错误，不仅毫不掩饰，反而认真剖析。他在加印絮语里就列举了我对其中的一处提法的异议。这个提法是：“如果省委允许省人大实行监督，允许舆论实行监督，两案（指青海省的杨小民杀人案和王生福大冤案，下同——引者注）的问题早已解决了。”我异议：人大和舆论对党的监督是理所当然的，而不能靠党居高临下地“允许”，因为居高临下地“允许”是靠不住的；如人大和舆论能够实行有效的监督，两案就不会、也不可能发生，而不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马老针对我的异议明确表示说：“言之有理”。

九、遗嘱三却永存

马老对其后事的遗嘱是“三个不”：

一是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他认为，“这类仪式，既同死者无关，也对生者无益，还有点劳民伤财，大可不必”。

二是遗体尽快火化，不要保留骨灰。他认为，“如果保留骨灰，既要购骨灰盒，还要交存放费。虽然花销有限，但纯属浪费，毫无意义。尤其让我不安的是每年清明节或周年祭，家属要前去探望。其实，没有任何可探望的东西……”何必费时误事？

三是子女们已经自立，不要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他希望子女“今后继续正直处事，清白做人，对于国家的现代化事业，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样“我就心安理得，怡然瞑目了”。

不仅如此，马老还认为：“如果患了不治之症，而又痛不欲生，或者变成植物人，其实是形体上活着，精神上死了的人”，就应当“安乐死”。其好处是：“免除患者之苦，缩短家属之累，终止医药之费”。春节后我打电话问马老病情，马老的姑娘告诉我，家父已“走了”。她说爸爸患的是脑梗，后又发作两次心梗，第二次未能抢救过来。因老人家说过不要做加重痛苦、令他活得没有尊严且加重家人负担的抢救，故其子女签署了放弃有创抢救的协议书。同此前“三不”一个意思，是为了使自己干净利索地悄然离世而不拖累亲友，不打扰组织和同事。

在与马老的交往中，他给我印象一直都是位多做奉献、少有索取、乐于帮助他人而不计自己得失、不愿麻烦别人的人。1991年夏我去天津参加中国社会学年会，途径北京时请他帮我复印他为我写的东西，他愉快地答应了。那天中午吃过他轧的饸饹面（说这是他家乡陕北的风味），他要我躺在大厅里沙发上休息，自己戴上草帽，冒着酷暑，提着包包上街帮我印东西。从窗口看着他那离去的背影，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多么好的老师，多么好的人！

得知马老仙逝的噩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给我来信说：马老仙逝，非常悲痛；虽是不留骨灰，但其精神永存！马老的老友杜导正率子女追思马老，对马老生前的业绩做了高度概括，留言说：沛文同志在邓胡赵时代中央的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包产到户等三大工程中走在最前面，尤其是宣传张志新冤案的报道中是首都冲在最前面的第一人，心态好，敢承担，有才华，有贡献；原本应该多活若干年，但却忽然走了，很遗憾；虽然自然规律奈何不得，但老同志们还是很难过的。■

（作者为甘肃省社科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1960年的强拆

○ 徐荫秀 口述 高树林 李力跃 记录整理

我叫徐荫秀,已是古稀之人,老家住在吉林省永吉县金家乡任家村,1961年爸爸以所谓的反革命杀人未遂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刘少奇主席在枪口下将其抢救出来,为其洗清不白之冤。现在我家姊妹弟兄四个家庭二十多口人时刻想念着刘少奇主席,不忘他的大恩大德。讲这事还得从我家大瓦房说起。

大队要建食堂无木料,要扒我家私房

解放前我家里有农田一垧多,由父母耕作,爷爷是老中医靠行医收入补贴家用,家里生活水平在当地算是冒尖户,爷爷没有发家至富当财主的想法,不积钱,不买地,住着祖上传下来的上等砖瓦房,木料是红松到顶。土地改革时农会头头一度惦记我家的大瓦房,想把我家划成富家成分,爷爷读过书,懂得土改政策,和农会头头理论:“我家虽然有土地一垧多,但我家没有雇过工,没有放过债,凭着我家有个像样的大瓦房,就给我家定富农,符合土改大法哪一款?”土改工作队也觉得爷爷说的在理,就把我家定为中农成分。但好景不长,1959年大队书记以落实毛主席指示办好任家村食堂为由,要我爷爷献出房子的木料建食堂,爷爷当然不答应。和于书记理论。

书记动怒了:“跟你没有道理可讲,反正房子扒定了,你不同意也得扒。”

爷爷说:“我就不让你扒!”

于书记强拆民房,三次受挫

第二天,生产队就派来十余人前来扒房子,爷爷冲着来人说:“我们乡里乡亲几十年,瓦房是我个人财产,是祖上传下来的,不是土改时分的,我不同意拆,希望诸位不要和我过不去。”听爷爷

讲这番道理,这十几人不顾生产队长的阻拦一哄而散。大队于书记第一次强扒民房子流产了。

几天后大队又调来十几人的强拆队伍,在大队一个头头率领下来到我家庭院,这拨人是本村的地、富、反、坏分子和他们的子弟。于书记亲自对他们训话:“今天我代表大队党组织向你们下达战斗任务,老中农徐家树的房子,革命需要扒掉,用那顶好木料盖我村共产主义的大食堂,没有改造好的徐家树一定要阻拦,你们不要怕尽管扒,出现问题由大队负责。这次给你们一个立功受奖机会,在扒房子的战斗中,勇敢向前冲的受奖,萎缩不前者将受到惩罚。”这些受管制的人哪敢违抗命令,当大队头头喊一声:“扒房开始。”人人想表现一番,个个冲在前,真有争功受奖之意。连大队书记都敢顶撞的爷爷,哪里惧怕这些常常被批判斗争的人,爷爷抓住走在前面的一个地主分子,大声喊道:“今天你们地富反坏来欺负我这个老中农,你们谁敢扒我的房子,我就跟你们拼命,就死给你们看。”爷爷这一声喊叫,却把这些胆小怕事的地富反坏们吓住了,再没人敢上前了,任凭大队头头叫骂,就是不敢动手,第二次扒房战役就这样不了了之。

不肯认输的大队于书记又出新招。这天下午他来到他管辖下的一所小学校,把学校的校长、教师召集起来进行动员,要求高年级每班选出几名愣式些的高个子学生,参加扒房子战斗,老师和校长虽然老大不愿意,但经过反右派斗争的小知识分子们不敢抗命。第二天校长和几名教师率领二三十名小学生来到我家,还没等爷爷从房里走出来,就有几个愣头青已经爬上房顶,爷爷见状,奋不顾身随着爬上房顶,拖住一个已动手扒房子的小愣头,并冲着房下的校长喊着:“你是一校之长,知书达理,有哪个王法规定,可以扒私人住宅?你们再扒我就跳下去死给你们

看！”校长可能害怕爷爷跳下房子时会拉着他的学生,为了学生的安全,或者不想见到流血,很理智地叫停了,率领他的学生打道回府。

强拆有新招;不让拆,断你饭

接二连三地强拆不成,于书记气势汹汹地来到我家,当着众人的面批评教育爷爷:“老中农,办食堂是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你为什么抗命?”爷爷说:“我家老少七口,都在食堂领饭,怎么叫抗命。”于书记说:“大队要建个食堂要你家献出房子木料,你为什么不献?”爷爷反问:“你是大队书记为什么不带头献?”于书记被抢白,更加恼怒,对爷爷吼着:“老中农听着,你对抗大队,对抗毛主席大办食堂,为了让你受到教育,从今天开始,食堂不供你家饭啦。”“不供就不领,反正房子不叫你扒,不给饭吃,这是你们往死里逼人。”说着爷爷用粉笔在墙上写了:“硬扒我的房子我就死,要于书记给偿命”几个大字。

于书记说:“你用死来逼人,吓谁?你死吧,我给你抵命。”说完于书记就走向生产队食堂,向食堂管理员下达本大队最高指示:“老中农徐家树不同意扒房子,从今天起不给他家饭吃。”说完扬长而去。

于书记下令不给我家饭吃,我家还以为是吓唬吓唬,共产党哪能让老百姓饿肚子呢?晚饭开饭了,大弟弟像往常一样拎着饭桶去食堂领全家人的饭,食堂管理员对大弟弟说:“大队有令,因为你家不同意扒房子,就不给你家饭。”读了几年书的大弟弟顺口说出一句顶撞人的话:“现在都社会主义啦,还能饿死人吗!”食堂管理员无可奈何地说:“我只管饭,不管死人事,有意见就找大队吧!”弟弟拎着空桶回家,一边走一边抽泣着。母亲见状,叫弟弟小点声,不能叫爷爷听见,妈给你们多做些菜将就一下、挺一挺,孝顺的母亲将往日从其口里省下来的饭,热一下送给爷爷。妈妈和我们以菜充饥,爷爷心知肚明,知道孩子们在挨饿,自己也很痛心,饭没有吃就独自睡下。

面对强权,爷爷以死抗争

第二天,大队派人来追逼爷爷是否同意扒房

子,爷爷没有好气地说:“我只要有一口气,休想扒我的房子!”于书记听手下人向他汇报,气急败坏地说:“老中农徐家树没有饿着他。”于是,于书记下达了把我家锅台扒了的最后通牒……爷爷抗不过了,他为自己的儿孙们不再挨饿,为了向混乱世道抗议,入夜爷爷服了毒药,一个人静静地离去,走向阴曹地府,可能去向阎王诉说不平。

第二天家人见爷爷没有起来,没有去叫,以为爷爷因拆房子一事心情不好,多日睡眠较少,想让他安静地睡个早觉。

每天七时一刻准时来摧扒房子的大队来人,像往常一样准时来我家报到,死磨硬泡,追逼爷爷扒房子,今天一进门见爷爷还躺在炕上没起来,就上前一边扒弄,一边叫,爷爷没有反应,他一看爷爷脸色紫青、没有呼吸,吓得喊叫起来,“老中农死了……”一边喊着跑回大队向于书记复命。

强权、腐败、欺压在继续

在外边出工搞农田建设的父亲,闻讯从工地赶回家,看着被逼死的爸爸悲痛失声,跪下给爷爷磕两个头后,直奔大队找于书记评理。父亲来到大队,没有见到于书记,也没有见到其他头头,一问三不知,逼人死亡的于书记连同其他头头们自知惹祸,就去公社求援、搬救兵。

入夜,于书记的救兵——以张成仁为首的公社三名公安人来到我家,一个拎着捆绑人的绳子,一个挎着枪,说是要和我爸爸谈点事,爸爸以为是来调查逼死人的事,就顺从地跟着他们到生产队长家。

公安们坐在生产队长家南炕,爸爸坐在北炕沿上,公安们拿出笔纸,开始以审问的口气和我爸爸对话。

张公安:“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爸爸一一作答。

张公安:“你认识徐家环吗?他是做什么的?”

爸爸:“认识,在旧社会当过吉林省省长”。

张公安:“你和他什么关系?”

爸爸:“徐家环是我六爷。”

张公安:“听说你在徐家环家干过事?”

爸爸:“八岁读书时,住在六爷家。”

张公安：“你读完书跟着徐家环干了哪些事？”

爸爸：“徐省长派我到洮安做事，我嫌远没有去，就回家种地了。”

张公安：“你父亲徐家树是伪省长徐家环的弟弟，他跟着伪省长干了哪些事？”

爸爸：“我父亲是老中医，行医治病。”

张公安：“你六爷徐家环是什么人？”

爸爸：“是中国人。”

张公安生气地说：“我还不知道是中国人，他给谁办事，是抗日的还是给日本办事的汉奸？”

爸爸：“徐家环省长是康德执政任命的，当然为康德办事。”

张公安问：“康德皇帝是汉奸，你六爷给汉奸皇帝办事，是不是汉奸？”

爸爸：“不知道。”

张公安：“你在为你六大爷开脱，他是汉奸你都不承认。徐家环不但给爱新觉罗溥仪办事，还为日本人办事，是地地道道的汉奸。”

爸爸：“我不知道，就不知道。”

张公安：“什么不知道？你是汉奸徐家环培养起来的，你的阶级立场有问题。”

爸爸：“我是农民，就知道干活吃饭。”

张公安：“据说你家老爷子徐家树依仗伪省长徐家环的势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

爸爸气愤极了：“那是胡说八道，血口喷人。”

张公安：“是胡说吗？徐家树不是很霸道吗？对抗毛主席办公共食堂的伟大指示，阻拦大队扒房子，还用死来威胁大队领导，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爸爸：“大队扒私人房屋，逼死人，你们公安不但不处理，还来审问被害者家属，你们像个共产党吗？”三个公安齐声喊，你不老实、站起来、把头低下。爸爸就不站起来，并与公安对着喊起来：“我没有干错事，又不是地主、富农、为什么把我当敌人。”

公社三公安以伪省长六爷的历史问题，强压爸爸，逼着爸爸承认爷爷的死与大队无关，是自作自受，还说爸爸反攻倒算，就这样逼到深夜。爷爷尸骨未寒，丧事未办，又拿六爷的伪省长历史问题压人，爸爸感到无百姓活路，悲痛异常，怒火燃起，极其冲动地说：“于书记逼人死命你们不管，反而逼迫死者家属，你们是害人的共产党，再

逼我就跟你们拼了！”张公安有意激化矛盾，他大声说：你这个汉奸伪省长的孝子贤孙，向共产党反攻倒算，你必须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对你实行专政！爸爸气昏了，疯也似的，一边从箱子盖上操起一把镰刀冲向公安张成仁，口里还骂着：“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就得该杀。”张成仁三公安故作惊慌，从南炕爬起，踢坏玻璃从玻璃窗中钻出逃离。公安张成仁脖子被玻璃划出一道浅浅的伤痕，说实在的爸爸没有勇气杀人，只不过极度气愤下失控，做样子罢了，如真想砍杀，爸爸离三个公安只有几步远，就在他们踹窗户、钻窗户那段时间里向他们砍几刀的时间还是足够的。

爸爸没有勇气杀人却以反革命杀人犯被三公安和大队民兵围住抓起来带走，被于书记请来的三个公安引诱成为“反革命杀人犯”。

爷爷被逼自杀，父亲被抓，房子被扒

爸爸被抓走后，大队为化解爷爷被逼自杀的影响，谎称爷爷是得了传染病，逼着我家将爷爷快点埋葬。我一家七口，爷爷被逼自杀，爸爸被抓，妈妈一个农村妇女束手无策撑不起一个家，我是家中的老大，当年不足20岁，弟妹们都十几岁或几岁，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大小队的头头说啥是啥，让我们向东不敢向西。首先生产队出人草草将爷爷埋葬了，了却了于书记的心病；然后扒房子就提上日程。

于书记派人对我妈说：你家男人是反革命杀人犯，你家是反革命家属，你们再阻拦扒房子，就把你们也抓起来。妈妈怕极了，不知所措；我们四个孩子更被于书记吓住，只好乖乖地把家搬到李姓富农北炕，七口人变成五口人，不能再说睡不下了……我们搬家的当天，于书记一声令下，扒房子，没有人再敢阻拦，于书记很顺利实现了扒我家房的愿望。房子是扒了，但是食堂却没有建，于书记为讨好公社领导，不久把上等红松木料运到公社。

刘少奇主席在枪口下救了爸爸

1960年12月份，永吉县法院以反革命杀人

未遂罪判处爸爸有期徒刑10年。爸爸不服,上诉致吉林市中院,比永吉县法院还革命的吉林市中级法院,改判爸爸无期徒刑,爸爸不服,上诉吉林省高级法院,省高院为了表现法律为政治服务,法官阶级立场坚定,改判爸爸死刑,立即执行。

上一次诉加一次刑,爸爸没有勇气再上诉了。吉林省高级法院报国家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时,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杨秀峰同志,认真审查了案卷,认为爸爸构不成犯罪,并向国家主席刘少奇作了汇报,刘主席细查了全部案情,否定了死刑判决。要求放人,房子重建,给予补偿。

爸爸出狱后五个月死去

吉林省高级法院接到刘主席的指示后,隐瞒刘主席的指示,只是通知我家说:爸爸在监狱染上了肺结核,可以办保外就医,但需五名贫下中农做保,1962年5月初,被关押一年零9个月的爸爸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带着病、背着在押犯的包袱走出监狱。

爸爸回来,房子被扒了,不能为冤死的爷爷伸冤,一家六口人挤在富农家一铺北炕,还带着在押犯、保外就医的不光彩的帽子,整天愁眉苦脸郁郁寡欢。爸爸在监狱染上肺病,无钱医治,回家五个月后撒手人寰。

文革中爸爸牵连了刘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吉林省高级法院的向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提供了刘少奇为民仗义执言、在枪口下抢救爸爸的正义之举,当作批判刘少奇的“炮弹”。王淮湘竟把事隔多年的已结了案的父亲徐洪煦的案件,于1968年又搬了出来,诬陷刘少奇同志为“现行反革命杀人犯辩护,鼓吹反革命分子的‘反党有理论’”。父亲虽然不在人世也不放过,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们家又成了反革命家属,大队、公社的造反派扎了两个稻草人,一大一小互相牵着,大小草人分别贴上刘少奇和爸爸徐洪煦的标签,拉着稻草人游街、示众,拉着到各种会场进行批判。我们家做为反革命家属受到株连,留在家里的妹妹

徐荫轩和地富子女一样受到歧视,遭受批判和斗争,逼着和爸爸划清界线、逼着揭发刘主席及爸爸的反革命罪行,不许入党,不让上学,爱情被人遗忘,妹弟们在改革开放后年龄很大了才勉强成了家。

十一届五中全会后我家获得新生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中央为刘少奇主席平反昭雪,4月3日中共吉林省永吉县委也为父亲徐洪煦的反革命案件召开平反大会,全县33个社、镇设分会场,近七千人收听了大会实况,会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刘少奇同志“反党有理”的罪名实属移花接木,栽赃陷害,必须予以彻底推翻,因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受到株连的徐洪煦案件予以平反。在会上,我做为徐洪煦的子女发了言,我感谢刘主席1961年在枪口下救回爸爸的生命,因救爸爸刘主席遭受攻击和诬陷,我们全家内心深感不安。改革开放,刘少奇主席特大冤案平反昭雪,我家也获得新生,感谢改革开放!感谢邓小平!我家世世代代不忘刘主席的恩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 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 100045

本刊电话: 010-68534879

传 真: 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文革中的贵州省公安厅

○ 晏乐斌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我正在贵州省兴义县捧鮀区乐作公社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11月初,四清结束,我与同事段正清回到贵阳市我所在的机关省公安厅。

一回来,只见我们的省公安厅机关大院的场地上、礼堂和办公楼的墙壁上,摆满、贴满、挂满了批判厅长宋子健、副厅长贾贯之、辛培田以及一些处长的大字报,说他们推行了一条“又臭又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其中,经二处处长张启民、五处科长康岩中等人策划,在省公安厅大院场地上摆放出了一份题名为《以宋子健为首的省公安厅一小撮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字报,长达48张大纸、6千多字。大字报摆出几天之内,就有100多人签名。大字报是1966年11月3日贴出,他们就以这一天命名成立了“贵州省公安厅113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队”(以下简称“113总队”)。

后来这个组织发展到有290多名成员参加,占公安厅工作人员的78%。

夺取省公安厅的权力

1967年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113总队”于1月16日下午,夺取了“贵州省公安厅”大权,召开大会,将省公安厅领导宋子健、韩严明、贾贯之、辛培田,扭送到礼堂讲坛上,宣布:“夺取省公安厅党政财文大权”和“一切权力归造反派”。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贵州省核心小组组长李再含,在贵州“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反军乱军、镇压群众”(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69)71号文件《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用语)。“113总队”成为支撑李再含政权的三根支柱之一,即对贵州人民行使镇压之权的“刀把子”;第二根支柱是,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

究所的一些人,是李再含的笔杆子;还有贵州“八一八”专业武斗队的“枪杆子”。李再含经营的“独立王国”,就是利用和依靠这三支力量和贵州军区的“三支”、“两军”的官兵,对反对他的人实行镇压。

对内管、卡、压和镇压

“113总队”1967年1月16日夺权之后,发布《第一号通告》,勒令:“凡未参加‘113总队’、凡省公安厅工作人员自即日起,向‘113总队’和各处室战斗队报到,报到者安排工作,发给工资”;“拒绝报到者,不安排工作,不发给工资”。同时封闭各处室办公室门窗、封锁文件柜和办公桌。

与“113总队”持对立观点的省公安厅另一部分工作人员,于同一天成立了“省公安厅红旗兵”(以下简称“红旗兵”),共有40余人参加。“红旗兵”人员原来工作的办公室被封锁关闭,无法进入,只好卷缩到省公安厅汽车库房去活动。“红旗兵”活动、只存在了9天,1月25日晚上,在“113总队”头目带领下,100多“113总队”队员将汽车库的“红旗兵”总部捣毁、砸烂,“红旗兵”不复存在了。一部分人员于当晚乘火车到北京去告状,他们满以为会得到顶头上司——公安部和党中央的支持与公正、公平的对待,后来他们空手而回。一些人一回来就遭到“113总队”成员的训斥、打压;没有向他们报到的人,工资被扣发,工作权利被剥夺,在“学习班”上,没完没了地检查。在1968年3月李再含掀起的“三反一粉碎”(反对右倾翻案,反对右倾投降,反对右倾保守,粉碎反革命复辟)运动中,原“红旗兵”人员18人打成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坏分子、漏网右派、地主等,对他们施行刑事拘留和隔离审查。

1968年5月13日是贵阳市一部分大专院校、

中学的红卫兵冲击、进驻公安厅一周年的日子，“113总队”将隔离的省公安厅的“牛鬼蛇神”二十多人，与冲击公安厅后被关押在看守所的红卫兵押出来示众，在公安厅大院举行了批斗大会。接着在院里绕场游斗，一些人用石头、木棒砸打这些被揪斗的人，将他们砸打得头破血流。同年5月25日，“113总队”，在行政科楼上，组织“清算‘红旗兵’保皇罪行大会”，将厅领导宋、韩、贾、辛和处长刘世杰、王贵芳、顾俊基作为“走资派、特务、历史反革命”，以及被他们揪出来关押的原“红旗兵”人员10多人，进行了大会揪斗、批判，搞“喷气式”，揪斗了两个多小时。副厅长韩严明、贾贯之、辛培田，三人昏倒在地。

“113总队”对这些统称为“牛鬼蛇神”的人，集中关押在四处楼下一间会议室里，规定要直起腰坐着，不准躺，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左顾右盼，不准在室内走动；上厕所、取水用要报告；白天不是布置写检查交代材料，就只准看毛泽东著作，别的读物不准看，稍有违犯，就受训斥。同年10月25日，又将他们每人胸前挂一块写有“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漏网右派”、“地主”、“坏分子”、“走资派”等罪名的牌子，写有每一个人的名字，先是上卡车押解到贵阳市大街上游街示众。接着，押解他们到省公、检、法机关设在贵阳市郊区沙子哨劳改农场的“五七干校”继续关押审查、劳动批斗。让他们住在五六间低矮潮湿、臭气熏天的猪圈里。

12月9日下午4时，看守人员令他们提前收工回到猪圈住地，令其蹲在猪圈门外，看守人员进猪圈搜查，将他们的物品全部拿到室外，从下午4点多开始，一直搜查到晚上8点多才结束。看押的头目刘××在搜查辛培田的物品时，见辛的地上放有二包糖，一面训斥辛，说：“辛培田，你怎么有两包糖？”一面用脚踢糖，将纸包着的沙糖踢散在地上，辛解释说：“我前天到农场小卖部多买了一包（半斤装）。”刘说：“当时我只准你买一包，你怎么买了两包？”辛说：“我的肝痛多买了一包，下次不敢了。”刘又用脚踢了另一包，结果两包红沙糖全踢散在地上。这一次搜查，他们在寒冷的室外冻了4个多小时，连晚饭都没有吃。辛培田一只手捂住肝痛处，一只手收拾物品和撒在地上的糖，难友们见状，无不为之掉泪。辛培田

因肝病未给予治疗，1971年死亡，终年46岁。

成立“动态组”，侦控群众

1967年1月25日，贵阳地区的造反派，在贵州省军区的支持下，夺取了贵州省党政财文大权，经毛泽东批准，任命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以他为首组建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公安厅“113总队”头目、科长康岩中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省核心小组成员。同年4月11日，贵阳市出现了一个反对李再含的群众组织——“四一一”。这一组织是以贵阳市大专院校、中学红卫兵为主体，与支持李再含政权的“支红派”造反组织势不两立。这一组织搅得李再含政权不得安宁。公安厅“113总队”设立了间谍组织“动态组”，有成员20多名，搜集、侦控“四一一”和其他对立面群众组织与个人的大量情报提供给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和贵阳地区以及一些地市的“支红派”，他们用来对付对立面群众组织。

镇压群众

因为反对李再含和省革委会，1967年1月，公安厅“113总队”组织，配合贵阳地区“支红派”造反组织，将拥有几十万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红卫军”造反组织，予以捣毁、摧垮，头头李铁乃、黄世明和几十名骨干被捕后，长期关押审讯，不作处理。同年8月，“113总队”与贵阳地区“支红派”造反组织，在贵州军区和“支左”部队配合下，对以学生为主体、拥有几十万群众的“四一一”组织，采取统一行动，以“保卫红色政权”的名义，将“四一一”组织踏平、消灭，人民群众称呼为“八月踏平”，在贵阳和全省各地打死多人，打伤数百人，抓获数万名成员游街示众后被关押。公安厅“113总队”就抓获了100多名“四一一”成员，分别关押在公安厅礼堂、汽车库房。这些学生受尽折磨。不少“113总队”队员，用带有铁扣的警用皮带，抽打这些学生，打得他们头破血流，皮开肉绽。

在1968年9月18日的兴义安龙县“龙广事件”中，李再含擅自用部队开枪镇压群众，其中

也有康岩中率领的“八一八”专业武斗队配合围剿当地对立面群众组织,打死9人,重伤致残12人,700多人被关进所谓学习班,200多农户被抄家。有一个人被“支红派”打死数日后,又将已掩埋的尸体挖出来,用冲锋枪扫射。

1969年7月,公安厅“113总队”配合贵州省独立师、贵州省军区独立营,在贵阳市紫林庵广场,制造了“7·29屠杀事件”,由独立师师长刘金池受命,命令部队开枪,打死54名群众,打伤数十人。这是导致李再含被撤职的原因之一。

撤换调整贵州省领导班子,新调支左部队

前述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即中发(69)71号文件,撤换了以李再含为首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调陆军54军军政委蓝亦农、43军军长张荣森到贵州,组建贵州省党政领导班子。并调43军129师到贵州,与先期换防到贵州的陆军14军41师,共同支左。蓝、张和支左部队,按照中共中央指示,逐渐揭开了李再含为首的贵州省革委会在贵州“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镇压群众”的盖子,派129师师长闫尚杰对省公检法系统,重新进行了军管,对省公安厅原有工作人员集中到贵州省政法干校举办学习班,初步揭开了省公安厅“113总队”造反组织的盖子,清算了康岩中、张启民等人的问题,隔离审查了康岩中、张启民、李工和文革中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原副厅长谢××等6人。对被打击迫害的厅领导人宋、韩、贾、辛及其他19名被迫害的工作人员,进行纠正、平反,恢复名誉;恢复、组建了省公安厅党政领导班子,被砸烂的省公安厅机构恢复运行。

新的军管会也推行极左的干部路线

新的军管会在对待省公安厅原有工作人员,也推行极左的一套。1970年3月,只留下20人在机关工作,还称这些人为“留用人员”,其余全部到贵州省政法干校进行审查学习。经过近二年的审查,于1971年年底,将造反的和被迫害

的,不分青红皂白大部分调离公安厅,又多数调离贵阳市,分配到遵义、兴义、六盘水地区、黔东南自治州和省劳改。分配去黔东南自治州党委组织部的37人,限令工作人员和家属、子女,于1971年12月20日早上7时,到公安厅大门口上已准备好的卡车,到该自治州所在地的凯里县城关镇报到。当这样一种不通情理的作法遭到少数同志的抵制,不服从分配时,军管会又扣发工资,集中他们去办学习班,实际是进行批判斗争,仍拒绝服从者,最后军管会组织七八个人一组,分别一个一个地“做工作”,强行逼走。当时“一切权力归军管会”,地方干部无任何话语权可言。

大搞翻案运动,逼死省公安局长

1971年“913事件”林彪被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之后,贵州的蓝亦农因受牵连调离贵州。省公安厅“113总队”的造反组织,本来在清算、揭开李再含、康岩中问题和省公安厅的盖子时,已自行解散,不复存在了,有的成员已调出省公安厅机关,分配到贵阳和外地了,他们又聚集起来,在康岩中等数十个原“113总队”骨干成员的策动下,又死灰复燃,找新组建的贵州省革委,要求“落实政策,调回省公安厅”(此时省公安厅改为省公安厅),为李再含翻案,为“省保卫领导小组正名”,为“‘113总队’造反组织正名”,并于1974年3月至5月,几十人纠缠、威逼、胁迫新上任的贵州省公安局长贾贯之,长达两个多月,日夜轮番纠缠,使贾贯之得不到休息,神情恍惚,结果被逼致。原“113总队”的一些骨干成员,在贾贯之同志的追悼大会上又发难,大闹会场,冲击会场,使参加追悼会的人惶恐地离开。

1976年4月,北京天安门“四五运动”起来之后,康岩中等人又起来闹事,他们策划围攻省委负责人鲁瑞林、李葆华、吴向必。

粉碎“四人帮”后,康岩中被依法逮捕,1978年被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改判无期徒刑。■

(作者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关于红卫兵的一桩历史公案

○ 陈楚三

1983年,在中组部青干局任处长的李志民找到我,说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多年关监狱、住牛棚,与世隔绝,对文革中的红卫兵怎么回事不太清楚;他希望我写个东西,介绍红卫兵的起源和发展。我推脱不过答应了,但提出:各行各业都有红卫兵,很乱,我只写学校的红卫兵;红卫兵起源于中学,我对中学红卫兵不了解,只能写大学的红卫兵;其他大学的红卫兵我也不了解,只能写我就读的清华大学的。李志民同意了。此后,我花了大约半个月时间,用稿纸写了一万字左右,以私人信件寄给李志民。

当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公布。我在信中认为,毛主席确应对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但中央其他负责人也有左倾错误,例如,清华校长蒋南翔就是被刘少奇打倒的;红卫兵正是左倾错误的产物。信中简述了中学红卫兵(即“老红卫兵”,1966年8月“红色恐怖”的制造者)产生的背景是左倾错误的影响:“遥想当年送苹果,江青阿姨多爱我”(老红卫兵的一句口号),以及他们后来成立“联动”反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简述了大学红卫兵部分人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革命,举了地质学院朱成昭以及报纸上报道的韩爱民等例子。信中着重叙述了清华大学414派和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派的斗争情况,指出414派“全体是反谢(谢富治)的,骨干是反陈(陈伯达)的,核心是反林(林彪)的”。基本观点是,反对把红卫兵视为“洪水猛兽”,主张对红卫兵也要一分为二。

信中对红卫兵是跟着林彪四人帮“受骗上当”的说法提出异议。我指出,我是共产党员,应当听党的话。叶帅在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说过,林彪同志只有五十九岁,身体非常健康,这是我们革命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周总理则不止一次说过,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

的伟大旗手。不听林彪的、江青的,那么总理的话、叶帅的话我们听不听?信不信?要是都不听,还能当党员吗?如果一定要说我们受骗上当,那就是受党中央的骗,上党中央的当了。我还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只有六十多年,而文革长达十年,占了六分之一;对长达六分之一的一段历史,不应当简单地“彻底否定”,而应当认真总结,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我在信中特别提出“八旗子弟”问题。我说,许多干部子弟运动初期敢于造反,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但当自己的父母受到冲击、被打倒,就患得患失,不那么“紧跟”了,有些人逍遥了,有的还因此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产生怀疑。比较起来,大批工人、贫下中农和普通干部子弟反而无私无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此相联系,我在信中向李志民所在的中组部青干局推荐了三个人:沈如槐(清华“414”派头头)、罗征启(清华党委副书记)和任彦申(清华学生,新世纪任江苏省委副书记)。

我给李志民的信既没有草稿,也没有留底,就直接寄出了;李志民告诉我,当时的青干局长李锐看过这封信并批给几位处长副处长传阅,他所在处的副处长刘泽彭也看了。

由于我的信当时未留底,上述我信的内容只能是大意。

据说,后来刘泽彭将我给李志民写的这封私人信件通过某种渠道送到陈云处,陈云对我的信做出极其严厉的批示。陈云对孔丹信的批示中提到的“陈楚三的材料”,应当就是我的这封信和他的批示。据了解,关于我的信及相关批示,以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有人说是《参阅文件》)下发。

我曾在2011年7月给有关部门写信,请求“把有关此信的中央《参阅文件》副本,或者写有中央领导人批示的我的信的副本,给我一份。一方面,此信我没留底,又有老一辈革命家的批示,给我一份对我而言是弥足珍贵的纪念。”但一直无回音。

者一边,而为后者所忌恨的。如北京中学生中的“西纠”“东纠”,大学生中的“一司”等,都是周总理和党政军老干部极力支持、引导,用以控制局势、保护老干部、维持社会秩序(如保卫国家机关、保护档案、反对过火行为等)的组织。“联动”更是为了反对中央文革而成立的。他们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前后都被中央文革压垮或镇压,打成“保守组织”或“反动组织”,其中一些受到程度不同的打击和迫害,林彪、“四人帮”还通过追查他们的“后台”来整老干部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那时起,“老红卫兵”作为组织不复存在了,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长期受着压抑,在诸如反“十二月黑风”、“一月夺权”,反“二月逆流”、“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邓”、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文革”的关键时刻,从思想感情到政治态度都是与林彪、“四人帮”对立的。而那些紧跟林彪、“四人帮”,自觉充当中央文革得力工具的造反派(无论是极左派还是“策略派”),却始终把矛头对准党的各级老干部,对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积极参与各地、各部门的夺权斗争,砸机关、抢档案,打派仗,制造武斗,揪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对老干部搞“专案”和进行所谓“群众专政”,围困中南海,组织批斗中央领导同志的各种联络站和大会,窃取、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等等(当然,对这些造反派组织的成员,应根据党的政策和他们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区别对待)。两相比较,“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动、组织及骨干,与他们这些造反派的活动、组织及其骨干,在性质上都是根本不同的。把“老红卫兵”说成是“造反派”,势必把水搅浑,转移人们对“三种人”的视线。

在“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一些人也有打、砸、抄行为,如打了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如“地富反坏”,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当时被认为是“四旧”的东西(如一些寺庙,某些商标等)。这是在当时“破四旧”的号召下发生的,时间很短暂(个把月左右),我们认为大多属于一般性错误。当然,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如个别打死人的,如果过去没处理过,也必须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但这不能与“三种人”的打、砸、抢混为一谈。我们理解,所谓“三种人”,无论其中哪一种(包括打、砸、抢分子),都是以为林彪、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为目的,都首先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少数人由于年幼无知,搞了一些打、砸、抄的事情,并不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问题。如果把这类问题列入“三种人”问题,实际上就模糊了“三种人”的政治性。

“老红卫兵”和“三种人”基本是同一代人,现在大多三、四十岁。正如陈云同志指出的:谁对聂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第三、第四把手清楚?老同志不清楚。只有那个时候也是“红卫兵”、后来成为“保守派”、“逍遥派”的人才清楚,他们知道是谁整老干部的(大意)。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次整党中,“老红卫兵”虽然也需要结合自己的经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觉悟,但对他们在“文革”初期的缺点或一般性错误,绝不应当再予追究,对中央文革曾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罪名,更不应该再拿来做为追究他们的依据。相反,倒是应当充分肯定他们在“文革”中的主流并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依靠他们和广大的中青年和“三种人”进行斗争。

以上是我们个人的一些想法,不知当否,恳请指示。

此致

敬礼

国家经委干部、共产党员孔丹
冶金部干部、共产党员董志雄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本刊编者注:

陈楚三,父亲陈潭秋是1921年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2名代表之一,后在中共党内历任要职。1943年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陈楚三1960年-1967年在清华大学上学,文革期间是温和持重的造反派,1968年被分到贵州当工人,1985年到北京联合大学当教师,1995年到一家民营企业工作直到退休。

孔丹,父亲孔原(1925年入党,1949年后历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国务院外事办主任,总参二部政委等职),孔丹在北京四中上高三时赶上文革,是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负责人之一。文革后直接上吴敬琏的研究生。1981年任张劲夫的秘书,以后任光大集团总经理、中信集团总经理、董事长等职。■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亳县“特殊案件”的记述

○ 梁志远

在“大跃进”和大饥荒的年代,亳县是安徽省重灾区之一,突出表现是不仅饿死人多(已报道过),而且人吃人的“特案”没有空白公社(场)。当时,我先后在县人委(政府)办公室和县委生活办公室主持工作,随县领导单独听汇报、接材料、亲朋交谈等,涉及“特案”亦非罕见。我是共产党员,在大灾面前,以党性、人性为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对特殊历史,记下工作笔记与活页记录。现阅此史料,悲惨至极,催人泪下。亳县的“特案”,以扒坟破尸吃肉为多数,还有更惨的父母吃儿女、儿子吃父亲、杀亲吃肉和杀人吃肉等残酷悲剧。现将我记录的部分不同惨状记述于后:

县委亲自处理的第一起“破尸案”

1959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县委常委会议室向县委第一书记赵建华汇报工作。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和一位公安人员去找第一书记请示汇报一个紧急问题,请他们先讲情况,我亦听取了汇报。这位公安局副局长说,城关公社涡北派出所在泾庙窑洞里抓到一个正在煮小孩肉的盲流农民(河南省人)。派出所无法处理,就连人和煮的肉一同送到局里。但我们也不知如何处理。赵当即定为“破尸案”,后上级统一称“特殊案件”,并决定将“犯人”逮捕。捕后,由县政法党组副书记李廷芳亲自审讯后认为,犯人身体瘦弱,无政治目的,未经请示县委,发两个馍,教育释放。

第二天,赵知道处理情况,把李廷芳叫到了县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李即兴师动众,电告城乡公安人员在全县追捕,经过四个小时的巡查,又将“犯人”重捕入狱。又经过半个多月的审讯调查,再次弄清“犯人”确无政治目的(不是破坏三面红旗),报县委批准释放。本案到此理应结束,但却留下了严重后患。涡北派出所所长李玉贤

在办理此案后,因向别人说过历史剧《打蛮船》中“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剧词,在1959年冬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被视为“制造反党言论”,对其残酷的批斗。但在批斗中严禁扩散原话,只批枝节、不讲要害,并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两级、调出公安系统。李玉贤不明原因,不服处分,申诉多次,从无人理睬。至1962年甄别平反仍留下降级处分。到1990年代,听人说明原因时李玉贤失声痛哭地说“现近四十年了,我已退休,才知道冤屈原因”。

县政法党组副书记李廷芳,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整后,带民工到南方修铁路,没有再回亳县工作。

饥饿残忍吃亲人

城关公社葛鱼池生产队(《安徽省亳县地名录》254页,以下简称《地录》)[注:《安徽省亳县地名录》是亳县地名委办公室通过地名普查编写于1984年8月出版的历史资料。从1958年公社化开始,至1983年9月政社合一的体制全部解体,恢复了区(镇)乡体制。本文所用地名,均以原公社化时老公社和生产队(村庄)名称为准。]一个名叫实话的农民,于1960年春吃了自己的侄女。因其哥嫂都饿死了,剩下一个八九岁的女儿由他收养,不久也饿死了,被其煮吃后,实话本人精神紧张,曾患病多年。

双沟公社王阁大队大王庄生产队(《地录》273页)王玉珍是我的亲姐夫,他家七口人(其祖母1959年春饿死)1960年春第三个孩子饿死了,他与我姐把孩子煮吃了。在吃后腹泻不止,于3月28日前后,他俩和母亲先后死去。他们死后,剩下一儿一女两个孤儿,被送进大队孤儿院,后被我和妹妹分养成人。

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生产队(《地录》241页)1960年春朱李氏在全家四口人饿死三口的情

况下,自己极度饥饿已奄奄一息,她在已死未埋的女儿身上啃吃了几块生肉。当大杨烟酒专卖处主任任怀赞前去其家检查时,她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但还知道要馍、要饭。生产队朱本善把其情况告诉任的同时,看到她在床前腹泻拉下许多烂肉。事到如此地步,即使有馍、有饭、有医、有药也难得救,何况没有抢救条件呢,最后生死不明。

十八里公社候桥大队孙何滩生产队(《地录》233页)吴××,1960年春其父饿死后,身上被割掉几块肉,当生产队长找人掩埋时,发现尸体肉被割的事实,于是队长指尸训吴,你毫无良心,敢吃你爹的肉。吴低头不语,默认了之。从此,在当地传开了“吴××吃爹”的惨剧!

魏岗公社逮楼大队陈营生产队(《地录》69页)1960年5月24日,县委生活检查组长孙振林(共产党员、县文化馆副馆长)带领检查组去该队检查生活,在检查中除群众反映饿死人等问题处,普遍强烈反映本村马××,丧尽天良、毫无人性,在其父饿死后,不仅吃了父肉,并煮熟以每斤1.6元出卖。因当地领导回避,特向检查组反映。孙听汇报时亦表示管不了此事,我亦回避。

杀亲吃肉不罕见

城父公社龙台庙大队韩老家生产队(《地录》256页)一个名叫韩三的16岁青年,1960年春父母饿死以后,即与其弟韩四在一起生活。同年3月将其弟韩四打死吃肉。把头和脊背放泥圈里,正在煮肉时被干部发现。经审问供认杀弟吃肉的事实。因其未满18岁,经公社党委研究决定,将韩三抓送公社火箭营(公社小农场,劳武结合经常随意关押人的地方,下同)扣留关押,数日后在火箭营死亡。

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生产队(《地录》167页)张韩氏一家四口人,1960年春饿死二人之后,身边只剩下一个女儿,经常和她争饭,又迫于饥饿人性丧失,打死了女儿煮吃。之后精神稍有失常,不断叫喊女儿的名字,本人以后改嫁。

五马公社泥店集西南王楼村(《地录》114页)王××的老婆王×氏(1922年生人)身边一个十来岁的女儿,经常与其争饭,1960年春被其打死煮吃。

大杨公社丁固李集西南邵庄(《地录》240页)农民孙其龙一家八口人,1960年春,在饿死几人之后,对其中活着的一个儿子(是秃子)打死吃肉。因吃人肉引起家人腹泻,致使全家死亡。

几个多户吃人肉的村庄

古城公社洺北大队西王庄(亦称河西王,《地录》293页),1960年春全村有几户都吃人肉,大队发现后,多次教育制止无效。大队书记耿××下决心抓典型。有一次抓到王××的母亲吃人肉的事实,将其捆绑殴打后,送公社火箭营关押,不久死亡。该庄吃人肉的问题得到制止。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组长(中共党员、县法院副院长)陆美(女)1960年汇报,在魏岗公社张任大队检查生活,大队干部向她汇报,蒿庄生产队(《地录》67页)40多户的村庄,约有10多户吃人肉,几乎天天夜里有人下地扒死人,弄得好多死人户夜间下地看坟,防人扒吃。公社也知道情况,但也无法制止。

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地录》167页)1960年也是一个多户吃人肉的村庄,吃人肉基本是半公开的,谁都知道谁吃,就是不说罢了。孤儿张催粮近门的奶奶就不断用人肉加入张的稀饭中养活了他。

还有亳州市谯城区一位负责同志曾告诉我说,在那个年代里,吃人肉不算什么秘密,他家村庄十里河公社(集)东南港小庙(《地录》215页)1960年春吃人肉的不是一户而是几户。吃过人肉,把骨头都抛在庄附近麦田里,收麦以后,白花花的人骨头,扔的东一块、西一块,是他亲眼看到的。

一次批斗吃人肉的大会

立德公社北王大队李寨生产队(《地录》299页)1960年春一度吃人肉的户越来越多,生产队、大队也制止不下。他们无奈,就决心抓典型、搞批斗办法解决。经过几天注意,抓到一个几次吃人肉的老中农李和尚的老婆,召开群众大会批判斗争。主要是几个干部发言,“你破坏”、“你犯法”、“你往政府脸上抹黑”等等。最后大队负责人总结说,今后谁再这样(指吃人肉)就法办谁,关

死你监狱里等等。这次批斗大会,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李程氏等几户存有人肉的赶快把肉埋了。从此,没有发现再有吃人肉的情况。

两起抢吃人肉的闹剧

一是,据农业银行离休干部王××述说:我家住五马公社泥店集西南王楼村(《地录》114页)。1960年春,农民有不少因饿而吃人肉。为了制止问题的蔓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村里王××的前妻多次吃了人肉,一天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大盆里就被干部抓获。干部把本人和煮的熟肉一起送到大场里,召开群众大会准备批判斗争。会未开始,到场的人均闻到肉香,久饿难忍的农民,有人说我来尝尝,伸手拿一块就吃,接着一哄而起,抢夺争拿,乱成一团。转眼把一盆人肉抢吃一光。王××说:“我爱人在场也抢吃一块,并说很香。”干部们尴尬惊呆,大会不宣而散,不了了之。

二是,据李玉显、李兴勤父子回忆:在双沟公社(原康庄后改为李营大队)后李营(后湖)生产队(《地录》276页),1960年春吃人肉事屡有发生。农民李春祥家刚煮好一盆人肉,被村干部逮了个正着。干部认为人赃俱在,除大训李春祥家人以外,喊人开斗争大会,肉刚端出,就被饥饿的农民一哄而上、抢吃一空。干部惊呆了,再也没有办法,只能收场。半个世纪过去了,前后李营的老年农民还不断讲述这些悲惨故事。

老公安谈“特案”

尚振华是从县级亳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岗位离休的。1990年代,我们经常见面谈论大饥荒问题。他曾多次跟我说,他1960年在县法院任秘书时审判的“特案”,大杨公社钓台生产队(《地录》239页)张秀英(女)由于当时饥饿把自己饿死的小孩吃了。不久又打死邻居家的小孩。案发被捕,审讯供认不讳,判处死刑,正在办理手续中监毙。

田朝珍,1950年在城里派出所参加工作,1990年代在县卫生局副局长岗位上退休。1996年7月与我同在老干部病房住院期间,他告诉我说:1960年春,他在县公安局工作时,曾带领侦

破组到五马公社黄营大队郭桥村(《地录》90页)破获了一起杀死一名13岁的男孩连臣的“特案”。凶犯杀死连臣当夜煮吃,白天在村口路旁充猪肉出售。凶犯(57岁,其名字再也记不清了)被捕后经审讯,承认全部事实,判处死刑未执行前死于狱中。他坚信在公安局“特案”的档案中一定能查到该案。

张长富,1952年从阜阳地委调毫县公安局任侦察股股长,1986年从毫县大寺闸管所主任岗位上离休。2000年以后,我们曾多次在老干部病房住院。张多次给我讲过:1960年春,他与县公安局刘德炎在十九里公社大寺集(《地录》159页)西头破获的一起一个农妇李××(名字记不清)杀人家两个小孩吃肉的“特案”。这个女人20多岁,丈夫外出当工人,一人独自在家生活,本人极度饥饿,身体瘦弱。审问时似乎有点精神失常。1960年春她打死本集孙乐意7岁女儿吃肉,不久又打死本集姓马的4岁外甥男孩。我们一开始就在其屋内翻出了用刀砍开的小孩身子,把尸体对接后,少了个头没找到。时由刘德炎同志拍照后抓捕。后来公安部来人检查工作时汇报请示,判为死缓。在关押十几年后,大概在1975年左右释放。这时张已在大寺闸管所任主任,从而知道了该女释放后与大寺食品站职工王学诗的儿子结婚。

时振生是位老公安,文革前任县公安局副局长,五马公社李吉楼大队人。他对我讲:我家乡大队所在地李吉楼村(《地录》115页)有一名叫小车子的富农分子,独身一人于1960年春饿死后,因家无人,近门几户商定将其分吃。之后无人提及此事。

他还对我说:1958年他被错打为右派分子,公安局把他放在县城隍庙营教所与犯人一起劳动。在此他认得了一个女犯人王福兰是五马公社(集)人(《地录》83页),是因卖人肉而关押劳教的,以后情况不详。

一位老公安,中共党员,在县市公安局工作几十年,家住五马公社泥店(集)(《地录》113页)大队第四生产队。1958年该队放出亩产水稻4万多斤特大“卫星”,受到县和国务院的奖励。他很沉痛地跟我说:放“卫星”给他们造成了严重恶果。1960年,我们四队160口人,饿死30多人,

更严重的是发生了人吃人事件。“特案”不仅我们队有,第七队最多,有说是7户,也有说是9户。多年后没人再去计算,反正是真事,谁也不能否定。我亲眼看过煮熟的人肉,拔净汗毛与猪肉很难区别。

两个孤儿吃人肉

据老公安时振生的妻子李桂英述说:俺是农村人,1960年在本大队(五马公社李吉楼大队)工作,分工到刘洼底生产队(《地录》114页)检查,发现两个孤儿,男孩叫满堂,15岁,女孩叫小卞,12岁,正在煮人肉吃。问其情况,他们说家里大人饿死后,为不再饿死,就学别人吃人肉的办法。他们准备了一条绳、一个扁担、一把镢头,白天看准新坟,夜晚前去扒尸。有时砍掉一条腿,有时砍掉两支胳膊,用绳子捆好,小扁担一挑,拾回家煮吃。虽经劝说,他们不听还照吃不误。由于多次吃没事,最后一回吃多了,满堂腹泻不止而死,其妹不敢再吃。

一具被人吊割的尸体

据后李营(后湖)李玉显、李兴勤父子等人回忆:双沟公社康庄大队中李营生产队(《地录》276页)农民李学武的儿子李闯,1960年春赶店集(《地录》279页),在回家途中饿死在韩大庄北地路旁。天黑后被附近饥饿的农民用绳子系着脖子,扒光衣服,吊在韩大庄北地一棵树上,一刀一刀把肉割光,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第二天当人们看到这具惊人的尸体后,消息迅速传开。待李学武家人前去确认是李闯后,被运回家地里埋葬。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骨架惨案,当地一些65岁以上的人至今还记忆犹新。

一个杀人吃肉被乱棍打死的农民

一位曾在安徽省委整风整社工作队工作的干部回忆:1960年秋,他在安徽省委整风整社工作队,到亳县五马公社于瓦大队李枣园生产队(《地录》102页)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农民亲口对他说,本村农民劳壮(乳名),同年春因饿杀吃邻

居一个4岁的男孩,被本村干部和死者的亲属在其房间内查到熟肉。但缺一个头,经过审问,头被扔到河里。在干群逼迫下,本人下河捞上人头,一阵乱棍猛打,当场死亡。

一家三口人饿死,埋后尸体被盗

五马公社泗合大队陈庄生产队(《地录》84页)贫农陈庆年(1959年65岁),全家8口人,本人能写会算,在饥饿中,自信外出有望吃饱,于1959年底独自外出,一去杳无音信。在家7口人中饿死3口,埋葬后坟内尸体全部被人扒吃。后当地流传着“陈家8口死4人,户主外流无音信,在家死仨被人吃,死了四口无一坟”的悲惨歌谣。

人肉的市场交易

随着饥荒程度的不断加深,1960年春不仅“特案”覆盖了所有公社(场),人肉的市场交易也不断发生,摆摊设点的有,流动串乡交易的也有。如城父公社党委1960年3月××日的电话汇报,丁楼大队吕楼生产队(《地录》248页)吕怀山,从3月17日至21日,共扒3具女尸,煮熟人肉充当猪肉摆摊出售。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任寨生产队(《地录》155页)农民周文,在本村出摊以人肉充猪肉出卖,被县委农工部科长李延荣等检查发现批评教育并令其埋掉。核桃林场五亩林区邢庄(《地录》228页)邢太法担挑串乡以人肉充猪肉出售。有一次到刘窑林(《地录》229页)让康绍秀等人买,因都仔细认出不是猪肉或羊肉,都清楚看到是人肉而未买,在当地也广为人知。

亳县饿死多少人?

亳县“特案”频发,充分说明大饥荒极其严重的程度。然而,饥荒没有引起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夏秋旱灾粮食严重减产的情况下,仍然大力开展反右倾运动。对粮食高估产、高征购,逼粮、搜粮入库,农民的口粮极少,雪上加霜,导致1960年春农民大批饿死,人吃人的“特案”是极度饥饿所致。

1960年5月上旬,县委为了对农村非正常死亡心中有数,让我安排一个中等大队人口死亡比

例调查。我选了古城公社李8大队作为调查对象，并拟好分姓名、性别、年龄、成分、死亡时间五项内容的提纲，交县委生活检查组组长王心斋去调查。调查的结果是：该大队原有3130人，1960年1月至5月8日，共死亡719人（不含外流死亡他乡的人数），占总人口的25.3%，同时还在继续死亡。汇报后，县委认为，选点不准，死亡比例过大，要重新选点调查。接着，由县委书记亲自选点，以十河公社十河大队为全县中等大队。我派县生活检查组组长李运曾等人前往调查。调查结果是：从1960年1月1日到5月15日，共死亡909人（缺东关分支三个生产队，没查），占被调查村队原有人口的29.15%，同时还继续死亡。这两个生产队如果加上1959年和1960年1月到12月底的死亡人数，总共死亡人口都占原有人口的30%以上。

1960年底，我带领姚志远等，在双沟公社王阁大队调查了饥荒偏重的大王支庙等六个村庄。这里原有127户，575人，两年死亡239人，占原有人口的41.5%，其中死绝18户，占原有户数的13%，小李庄原有75人，死亡36人，占原有

人口的48%，小许庄原有65人，死亡32人，占原有人口的49%。

1960年底，我在五马公社泗合大队杨庄调查，原有68人，除4人外流未归外，全庄仅剩18人，两年死亡46人，占原有人数的70%以上。

我根据以上调查判断，全县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应当在20万人以上，有近3万户彻底毁灭。仅观堂一个公社，就有孤儿400余人。有的孤儿被收养后饿死。十八里公社羊庙大队幼儿园收养11个孤儿，饿死10个。■

（作者为安徽亳州市科技局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启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往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102488信箱3分箱

邮政编码：102488 收款人：崔秀岭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400-610-0896

盒式助听器苏食药监械（准）字2012第2460530号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2第2460710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2第2460711号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禁忌内容或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3120253号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红卫兵两次冲击人民日报

○ 陈祖甲

在文革时期的前半年中,红卫兵有两次冲击《人民日报》。

1966年8月26日,大约上午十点钟左右,在王府井的《人民日报》读者接待室,来了一批红卫兵。他们身穿军装、臂佩红袖标,气势汹汹、蛮不讲理,在接待室的桌子上把鞭子甩得“叭、叭”响,说是要编辑去见他们,并气势汹汹地贴出大字报:“勒令人民日报立即停刊!”

原来,那一天,《人民日报》的第二版发表了一整版红卫兵的文章。版面用了通栏的大标题:“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头条是北京二中红卫兵的文章《向旧世界宣战》,其余的是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战斗小组、哈尔滨工业大学半工半读一个红卫兵和铁道兵某部王某的文章。《向旧世界宣战》一文把矛头直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所谓的技术权威以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指责他们“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理出了大量的港式头”;“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做出了大量的港式衣裙”;“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照出了许多下流低级的照片,把那些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电影明星们捧上了天,使他们神魂颠倒,眉飞色舞”;“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贩卖了大量古今中外低级黄色冒险小说,使那些狗崽子们从你们那里得到满足”;“还有那些商店,你们摆了那么多香水、雪花膏、口红、项链……等奢侈品,及港式衣裙、火箭鞋等是给谁预备的?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头皮鞋吗?”这样谩骂在现在看来是极其幼稚可笑的,但在当时是“革命有理”。那么,这些完全符合红卫兵的“革命之理”,红卫兵为什么还会冲击《人民日报》社呢?

原来,红卫兵主要针对的是这一版右上角位处二条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叫《致爸爸妈妈们的

一封公开信》,作者为“中直某机关红卫兵”。文中以气冲斗牛的语言怒斥他们的父母,声称“要造他们的反”。这里摘引几段:

“爸爸妈妈们:儿女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卫兵了!大家都称你们为老革命。但是,我们要告诉你们一句:在老革命中,有的人是在混革命!你们想混到哪天才到头呢?”

“难道你们不觉得可耻吗?难道你们不觉得危险吗?难道你们自己也不感到痛心吗?难道你们还想这样混下去吗?”

“你们要是忘记了劳动人民,忘记了你们牺牲了的战友,忘记了革命,你们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分子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谁说儿子不能造老子的反!你们‘修’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造反有理,造反到底!”

“十几年来,你们当中有的人养尊处优,长期蹲在办公室,你们的‘资本’早就花光了;你们的革命锐气早就磨钝了,你们和劳动人民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走出办公室,到群众的大风大浪中来,换下你们的头脑,洗掉你们身上的污垢,灌进新鲜的血液,彻底改变你们这种精神状态。不然,在这场大革命中就要被淘汰了。”这些怒斥《人民日报》的红卫兵认为这篇文章的矛头指向了革命领导干部。

读了上述几段就足够看到文章的火药味之浓烈。不过,在当时,也是很平常的。《人民日报》8月9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月11日发表社论《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8月12日报道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西门接见斗志昂扬的工农群众;8月14日发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8月19日报道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兴无灭资、破四旧。被历史认定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还刚刚开头。

据了解,到《人民日报》社闹事的红卫兵主要

是“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他们中不少是高干子弟或中直机关干部子女。那样,文章直指他们的父母,同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联,他们不能坐视不问。

当时,这版文章是理论部编辑的。主要负责人是沙英,编辑有陈柏生、陈大可。我刚从“四清”工作队回报社,作为年轻编辑,具体设计版面。在红卫兵冲击的时候,我们哪敢下楼接待。曾任理论部文革领导小组的头头何匡下楼接待。红卫兵们当然不买他的账,依然狂甩鞭子,我们的办公室在四楼都听得到。当时没有人敢解决这个局面。

时间过得很快,到十二点吃饭时间了。那时,报社食堂在编辑部楼对面的东单三条27号。报社的同事们都要走出报社大门前去用餐。这时红卫兵堵住了大门,检查工作证。工厂的师傅们属工人阶级自然放行,编辑人员则需报出身,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可以放行,如果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则需审查是不是版面编辑。如此情景,叫我们几个执行编辑非常恐慌,怕被无缘无故地被抓走。可饭也不能不吃呀。不知哪位提出了躲避的高招,我们从编辑部北边的楼梯下到二层,再向西通过总编室办公区下到工厂,然后从报社后门溜到晨光街走向长安街,乘上公交车到豫王坟宿舍汪子嵩家里。老汪招待我们吃了简便的午饭。大约到下午三四点,老编辑们都直接回家了。我是单身,宿舍在报社的旧楼,只得回报社。当我走进报社时,红卫兵已经撤离。据说是当时跟陈伯达来报社夺权的总政宣传部的钱抵千同志以解放军的身分出面做了工作,我们这才躲过了一劫。

之后,当时的总编唐平铸同志在五楼开大会时,说明这个版面是毛主席要求组织编辑的,稿子也是上面交来的。事件总算有了了断。

红卫兵第二次冲击《人民日报》是1967年1月19日。那一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称:“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此前,上海的造反派制造了著名的“安亭事件”,提出向上海市委夺权。接着是造反派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由此,引发了全国的“一月革命”风暴的降临,到处纷纷夺权。

那一天晚上,大约十点钟左右,一群红卫兵



冲进《人民日报》,占领五楼俱乐部礼堂。据了解,他们是以“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红旗战斗队”、“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东方红战斗队”为主的大学红卫兵。因为已经近深夜了,报社工作人员大多回家了。前几天,北京一家高校的红卫兵刚同报社人联合,把胡乔木拉到报社五楼批斗。那么,今天他们想干什么?我们住在报社的一些单身编辑都想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来他们也是夺权来的。可是,这些失去理智的年轻人哪里知道《人民日报》早由陈伯达带人来“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了。毛泽东主席早就有言:“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陈伯达的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他们来又有什么用呢?不过,当时,《解放军报》也开展了夺权活动。他们也许是冲着时任《人民日报》总编唐平铸等来的。

过不久,陈伯达亲自带着王力、关锋来到五楼俱乐部礼堂。陈伯达用闽南普通话发表了一通演讲。当时,我认真地把他的讲话都记录下来了。可惜的是,以后这份记录不知扔到哪里去了。总之,他是支持和鼓励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的。就这样,以后在报社有了“首都革命造反派驻人民日报监督小组”(俗称“红卫兵监督小组”),监督《人民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而那时从《解放军报》调来的一些编辑也陆续地离开了。之后“红卫兵监督小组”还要“揭人民日报阶级斗争的盖子”,把彭德怀同志拉到报社进行批斗。这个“红卫兵监督小组”大约在林、陈事件暴露后,自然地消亡了。■

(作者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谢富治与“枫桥经验”

○ 尹曙生

在1959年秋天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定为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分别被罢官。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由林彪接替,黄克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由罗瑞卿接替。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已有10年,由谁来接替他呢?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选择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委员谢富治,来接替罗瑞卿的公安部长职务。

自1958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掀起了“公安工作大跃进”,滥捕、滥杀、滥拘留、滥劳教、滥集训、滥收容,打击的人数超过了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详见《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新上任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面对这样的局面,是改弦易辙,努力纠正左的错误,停止滥捕、滥杀,还是继续“大跃进”,错上加错?谢富治选择的是后者。在他的领导下,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大跃进”,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

让我们来看看新任公安部长的“三把火”,就可以一目了然。

1960年2月11日至27日,谢富治以新任公安部长身份召开了第10次全国公安会议。会前,公安部党组对这次全国公安会议的指导思想进行了讨论。面对过去2年来在对敌斗争问题上的严重扩大化的现实,以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为首,提出了在对敌斗争问题上应该实行“由紧到松的转变”,放宽政策,停止滥捕、滥杀的错误。可是谢富治不同意,提出要继续“实行紧的方针”。他在全国公安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继续大鼓干劲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连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他说:“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阶段,党中央提出要争取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连续大跃进,公安工作也还需(要)有适合情况的大跃进。因此公安工作的方针,就是要充分利用大

好形势,进一步地把对敌斗争搞得紧一些,把敌人控制得严一些,把房子打扫得干净一些,扫除来自敌人的一切危害,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建设环境”,“总之要加强专政,主动进攻,先发制敌,不让敌人乱说乱动,把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压缩得越少越好,让全国人民放心地搞建设而无后顾之忧”。会后,全国公安机关根据谢富治的要求,就像1958年“公安工作要点”提出的那样,“把需要逮捕的人都逮捕起来,把需要拘留的人都拘留起来”,把反对、抵制“大跃进”运动的人和潜在反对、抵制的人,统统抓起来,不让他们有抗争的机会。1960年,正当全国人民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的时候,公安机关不是去救人,而是去抓人,全国逮捕、拘留人数是1959年的四倍,乱劳教、乱集训、乱收容更加是遍布城乡,泛滥成灾。大批被拘押的人员死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集训队、收审所。仅青海、安徽两省1960至1961年就死亡被拘押人员10万多人,全国有50多万人死亡(其典型案例见《饥荒年代青海三类人员死亡情况》一文,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和杨显惠《夹边沟记事》一书——笔者)。这些被害者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因为对大跃进不满发牢骚、进行抵制,或因为了活命,偷盗、哄抢粮食、食品,被拘押的,不是“阶级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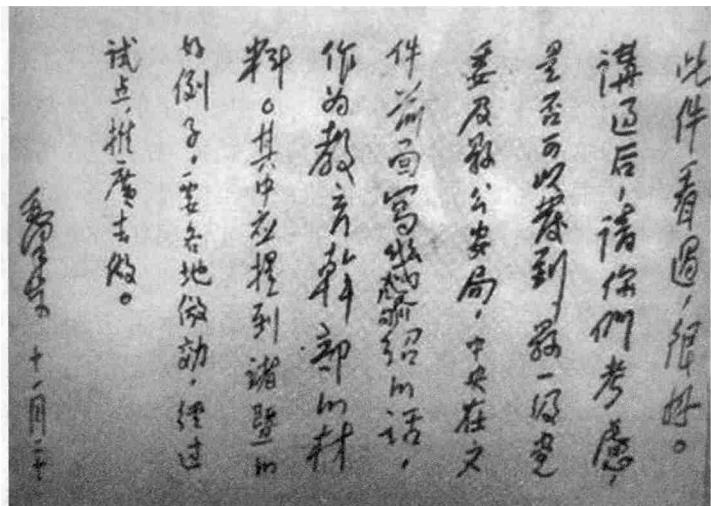
1960年秋天,全中国人民处于极其艰难困境之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急剧增加,在这困难关头,公安部在谢富治领导下又召开了一次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议题是根据公安工作“紧”的方针,研究开展一次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经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当前敌我斗争形势和开展社会镇反、内部肃反(清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上报中共中央。“意见”认为:“敌我斗争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情况,即在一部分地区和一些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单位,残余敌人有所暴露,有小的抬头,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比去年有所增加,斗

争比较尖锐”。要求“从1960年9月到1961年6月的10个月内,在社会和内部开展镇反和内部肃反运动,再给敌人一次有力打击”。中共中央于1960年10月21日批转了这个“意见”。但是,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提出在国民经济建设上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会后,中央也感到不宜再继续开展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所以公安部的“意见”(也就是谢富治的意见——笔者)被暂停执行。

面对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运动被暂停执行的局面,谢富治仍不进行反思,却又以公安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题为《关于目前对敌斗争情况的汇报提纲》,提出在对敌斗争中采取“先放后打”的方针,先让敌人“放”,在敌人暴露比较充分的时候,选择适当时机,“给敌人一次全面有力的打击”。2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提纲”。

但是,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失败,各项工作,包括公安工作不得不进行调整,乱抓、滥捕、草菅人命的情况初步有所遏制,“秋后算账”也没有得逞。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简称“七千人大会”)后,在刘少奇的主导下,对政法工作也作了总结,写了个《四年政法工作总结报告》。报告中说:“在政法工作取得巨大成绩(应该说是巨大灾难——笔者)的同时,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第一,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错捕了少数(应该是大多数,而不是少数——笔者)不应该捕、不应该判的人。少数(应该是多数、绝大多数——笔者)基层公安机关(包括公安部、省市一级公安机关也是如此——笔者)不按照国家法律办事,用拘留、劳动教养和集训的办法,变相地捕押了一些人。还有一些无权关押人的机关单位(如公社、大队、工地、企业、学校)甚至个别党委机关、个别负责人,也非法行使拘留、逮捕的权力。或者滥用拘留、劳教、集训等手段,变相捕人押人。尤其严重的是,极少数的地方负责人(不是极少数,而是大多数——笔者),破坏了党对群众的领导必须遵守的说服教育原则,采取逮捕、拘留、判刑等法律手段去推行他们的违背中央路线、方针的错误政策。



毛泽东对枫桥经验的批示

第三,少数地方在劳动改造工作、劳动教养工作和狱政管理工作上破坏了正常的秩序——采用了一些不正常的甚至是封建野蛮的管理办法去折磨人。有的单位(大多数劳改、劳教单位——笔者)发生犯人非正常死亡现象比较严重(很严重,见《青海三类人员死亡情况》一文,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笔者)。有的非法举办的劳改(劳教、集训)队,甚至随便把人打死。第四,有一些地方和单位发生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违法乱纪现象,随便检查信件,非法搜查人身和住宅,非法采取查对笔迹、捺取指纹等手段”,“造成了打击面过宽的严重后果”,“混我为敌,用对待敌人的专政手段打击了人民群众中只有一般违法行为的人,甚至是冤枉了少数无辜的群众”(几百万人算不算是少数无辜群众?——笔者)。

这个总结尽管不深刻,但是,问题都点到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样的总结,也是难能可贵的。它的作用同样也是无可置疑的,因为1961年之后,公安机关滥逮捕、滥拘留的现象确实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但是好景不长。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毛泽东的主持下,1963年5月和9月先后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

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在这两个文件中,毛泽东对国内的政治形势做出了这样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号召在农村、城市要“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猖狂进攻。于是从1963年秋天开始,一场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了。

公安机关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身为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于1963年6月,派出6个工作组,由他自己和几名副部长带队,到7个省、区,参加当地党委领导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浙江省是其中之一。7月中旬,谢富治召集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的河北、河南、江苏、浙江等七个省(区)公安厅长座谈会,七月下旬又召开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重庆六市公安局长座谈会,研究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问题。8月16日,他以公安部党组的名义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敌斗争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竭力夸大敌情,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揭露的大量材料说明,当前的阶级斗争确实是严重的、尖锐的。资本主义、封建残余和其他旧的习惯势力的复辟活动,1961年就开始抬头了。在歪风邪气上升的情况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十分活跃,去年夏秋前后达到了最高峰,在农村的一般地区,地、富、反、坏分子中表现坏的和有破坏活动的,由通常情况下的20%上升到30%—40%”;“地、富、反、坏分子的活动,有动刀、动枪与‘和平演变’的两手”;“同农村一样,城市的阶级斗争也是严重的、尖锐的。农村出现的资本主义势力、封建势力和其他旧的习惯势力的复辟活动,城市都有。而且城市是资本主义势力比较集中的地方,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残余势力都比农村大的多,因而阶级斗争和对敌斗争显得特别激烈和尖锐”,所以“必须把对敌斗争列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任务之一,把锋芒对准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要依靠和发动群众,通过说

理斗争去制服敌人”;在政策和策略上,“除了对于行凶报复、杀人、抢劫、放火、放毒这一类现行犯,应该立即逮捕法办外,对于运动中揭发、坦白出来的其他敌我性质的案件,应该实行在运动期间‘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对于少数该捕的,要先把他们放在群众中进行斗争充分利用其反面教员价值以后,在运动后期,经过审查批准,再依法处理”。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认可,以后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在谢富治的主导下,以浙江省为试点,组织以省公安厅和宁波地区公安干部30多人为主的工作组,由省公安厅副厅长吕剑光带队,到诸暨县枫桥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敌斗争试点。当时枫桥区有7个公社,6.7万人口,有地、富、反、坏四类分子911名,占总人口1.35%。社教工作队认为有比较严重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有163名,群众要求逮捕法办的有45名。社教工作队根据公安部“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精神,组织群众反复批斗,最后全部制服,没有逮捕一人,全部依靠群众就地监督改造。谢富治在杭州亲自向毛泽东汇报枫桥经验,得到充分肯定,于是他心中有底,专门派人到浙江,帮助工作队总结经验,写好文件。最后,以浙江省委《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报中央。毛泽东看了,批示道:“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根据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于1964年1月14日发出《依靠群众力量,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指示》(这个“指示”是在上述公安部的报告基础上形成的),同时批转了浙江省委的报告。1964年2月28日至3月18日,公安部召开第十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学习、贯彻中央“指示”和“枫桥经验”,讨论通过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敌斗争的一些问题》(即《第十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纪要》充分肯定“枫桥经验”,要求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坚决贯彻执行,并提出应当做好的六项工作。其中的第二项是关于农村的专政对象,《纪要》明确规定:“一是仍然戴着帽子监督劳动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二是已经摘掉帽子的原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三是没有戴过帽子但坚持反动立场的普通反革命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和地主、富农的

子女中思想极端反动的分子”。这个规定把已经摘掉帽子的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的子女都作为专政对象,这样就使专政对象的范围一下子扩大很多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束后,全国四类分子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一下子增加了100多万,仅安徽一省就增加7万多专政对象。据1979年2月5日《人民日报》第4版报道:文革结束后枫桥区人口增加到13万,其中四类分子也达到3千多人。经过15年时间,枫桥区四类分子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3倍。

“枫桥经验”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以往由公检法专政机关用逮捕、拘留、判刑等手段来对付专政对象,改为依靠群众、实行群众专政,就是所谓“10个好人夹一个坏人”的办法。这样做的好处,可以节约执法成本,可以在群众中强烈地、人为地树立对立面,用一部分人压制另一部分人,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同时也是接受了大跃进时期的经验教训,捕人、判人太多,人满为患,死人太多,社会影响也不好。

“枫桥经验”和毛泽东亲自批准下发的王光美的“桃园经验”、陈伯达的天津“小站地区夺权经验”一样,成为了整个农村“四清”运动中的指导性文件,“四清”工作队员人手一册,学习贯彻。谢富治“功”不可没。

依靠群众对敌人实行专政的“枫桥经验”得到领袖的充分肯定。1963年11月22日,毛泽东同汪东兴谈话时说:公安部的日常工作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好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不要忘记群众。

从1964年至1966年文革前,在城乡全面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公安机关拘捕人数大大下降,群众专政风起云涌,所谓说理斗争名存实亡,武斗成了主要形式,大批基层干部和四类分子在群众专政的强大压力下自杀身亡。因为人民群众自大跃进以来吃尽了苦头,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有满腔怒火,无处发泄。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们被告知,他们前几年所受的苦难,都是因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部,被四类分子腐蚀、侵袭,打进来,拉出去,实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复辟造成的。有了假想敌,

就有了攻击的目标,可以尽情地发泄自己的愤怒,因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四类分子的所谓“说理斗争”只能是空想。很多四类分子和基层干部被逼自杀。当政者成功地把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转嫁到四类分子和基层干部头上,避免了被追究的责任。

“枫桥经验”的群众专政模式,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随着公检法机关被砸烂,群众专政的威力发挥到极致,无法无天也到了极致。1966年的“红8月”,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首都北京就有1700多名学校的老师被自己的学生打死;1967年8月13日至10月17日,湖南省道具有4193名四类分子和子女被群众专政队杀死,有326人被逼自杀,年龄最大的76岁,最小的才10天(怕他成了“赵氏孤儿”,杀了以绝后患——笔者)。1967年8月23日,道县柑子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共开庭审讯13人,其中8人被判死刑,宣判一个当场打死一个。安徽省从1968年5月开始,到1969年,从省到地、市、县、公社、机关、企业、学校、单位,先后成立了3000多个群众专政指挥部,成员达90多万人,先后关押了150多万人,被群众专政队员用棍棒和其他刑具活活打死的有1074人,打后受伤死亡359人,被刑讯逼供而自杀的4646人。另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印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一书记载:文化大革命期间有420万人被非法关押审查,172万8千人非正常死亡,703万人致残,7万多个家庭整体被毁。这些都是群众专政的结果,是无法无天的结果。其实这组数据是大打折扣的,因为安徽一个省被群众专政队非法关押的人数就达到150万人。

“枫桥经验”是极左年代产生的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文件,以“群众专政”代替司法机关,几百万被群众专政的四类分子的合法权益被剥夺殆尽,其悲惨遭遇令人惨不忍睹,家属子女受到的歧视难以尽述。因为毛泽东批示的“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这几个字,可以被人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读。

今天重提“枫桥经验”应当摈弃“群众专政”,而强调“矛盾不上交”的精神■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教训

○ 陈大斌

1964年毛泽东主席发动“农业学大寨”运动,至今已半个世纪。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就批转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对这场运动作了总结,要求各地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利进一步肃清农业战线上‘左’倾路线的影响”。三十多年过去,总结经验教训的文章、专著也出了一些。但至今在坊间仍然有各种似是而非的议论在传播。至今还有人对这场运动“左”倾错误的本质及严重危害缺乏应有的认识。“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场“左”的“继续革命”狂潮。它持续了15年,对中国农业生产、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及亿万农民的生存状态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些教训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一、上下结合形成“继续革命”狂潮

“农业学大寨”运动初始时,领导机构的号召、新闻媒体的宣传,都是把大寨作为一个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当时各地农村的一些社队开展学大寨活动,也主要是搞农田基本建设,建设“大寨田”,确也有些地方在这些方面做出成绩,收到一定成效。

但是,情况很快发生变化。大寨本是一个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而很快大寨就变成阶级斗争的典型,学大寨的运动也被弄成了一场“继续革命”的政治斗争。要正确了解、认识这个变化的实质,首先要从毛泽东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上找原因。毛泽东发展农业指导思想的核心是消灭小农私有制,实行集体化。1953年就开始了农业合作化,继而于1958年兴办人民公社。这样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偏误就是忽视生产力发展。按照这样的思想认识,似乎只要改变了所有制,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就建立起来了。

1956年中共八大就明确指出,国内主要矛盾

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按这种估计,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但是,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推翻了八大的估计,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国内外的主要矛盾。”1958年,经济发展上要“超英赶美”,在生产关系上追求“一大二公”,急切地要通过人民公社先向全民所有制,再向共产主义过渡。为达此目标,轻率地发动所谓“大跃进”,兴办人民公社,加上一个以“快”为中心的“总路线”,成为所谓“三面红旗”。高举“三面红旗”的结果,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全国各地农村都出现了“饿、病、逃、荒、死”的现象。人民公社不得不进行调整,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心单位上来。

对出现这样严重的局面的原因及如何总结经验,纠正“左”倾错误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在中央领导层出现了分歧。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都作了自我批评。刘说造成目前局面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强调指导思想犯了“左”倾错误。对是否还要继续坚持“三面红旗”持保留态度。毛泽东承认工作上犯了错误,强调犯错的原因是没有经验。不承认指导思想上犯了“左”倾错误,主张继续高举“三面红旗”。而这时全国有百分之三十的农村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而且得到多位中央领导人的支持。邓子恢大讲安徽责任田的好处。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猫论”支持包产到户。刘少奇对湖南的农民说,搞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经验,搞人民公社是一种试验,包产到户也是一种试验。陈云甚至主张让农民分田到户。

党中央领导层里有人强调错误、困难严重,有人支持“单干”。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

的。于是,1962年8—9月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及会前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动了一场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批判,并以此为据强调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1963年开始,毛泽东在全国农村开展了“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题就是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且提出斗争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时期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在酝酿、发展,以打倒“党内最大走资派”为目标的“文化大革命”也已箭在弦上。

这就是毛泽东树立“大寨红旗”的政治背景。起始时他的确赞扬过大寨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精神,但在当时形势下,他在全国农村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绝不可能只是要树立一个“生产典型”,搞一场推广发展生产经验的运动。典型和运动都要体现他“继续革命”思想,适应他开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斗争的需要。“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晚年的主要思想理论的结晶。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农业学大寨”运动,都是在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这就决定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必定要政治化。

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继续革命”理论主导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这是这场运动政治化在指导思想上的原因;在运动实践尤其是在昔阳县的狂热实践中,大寨红旗的旗手、后来的全国学大寨运动的主要推手陈永贵则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一起,陈永贵就扯旗造反,先参与夺山西省委的权,当了省革委会副主任,继而再带头夺昔阳县的权,出任县革委会主任,迅速完成由“生产能手”向“革命闯将”的转变。之后,进一步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成为所谓“农民政治家”,领导全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他先在昔阳,后试图在全国农村掀起“继续革命”的狂潮。

陈永贵有很强的政治敏感,尤其是对毛泽东在农村的“理想”有很深的领悟。他是靠创造了“大寨经验”受到毛泽东重视,靠“农业学大寨”运动而风云一时的。他知道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他的优势所在,是他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可靠路径。同时,他更清楚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他知道在当时形势下,绝不可把大寨当成一个“生产典型”;



当年的“农业学大寨”宣传画

开展“农业学大寨”一定要搞成一场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的政治运动。在这方面他下力气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全面篡改大寨的历史和基本经验。把大寨十年艰苦创业史变成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史。他善于把大寨的每项经验都与毛泽东的号召,与“继续革命”的理论挂上钩。毛泽东发什么号召,陈永贵都千方百计紧紧跟上,并编造出一个个故事,说大寨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取得了突出成绩。以大寨的实践证实毛泽东伟大英明正确。这样一来,他挟文化大革之势将“大寨经验”推向全国。他自己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也便“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同时,也把大寨经验、“农业学大寨”运动完全纳入“左”的“继续革命”的轨道。

最突出的事例是1967年9月,在昔阳召开的山西省农业大学现场会上。陈永贵一口气讲了6个小时,对大寨的历史进行全面歪曲。他把过去多年来大力支持、帮助、培养大寨成长的山西省委、晋中地委及昔阳县委的领导干部多人“揪”到会场上“批斗”。陈永贵指着这些老领导说:“中国赫鲁晓夫和山西省、晋中地委、昔阳县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是大寨人民的死对头。”“大寨就是同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决斗争中胜利前进,把红旗举得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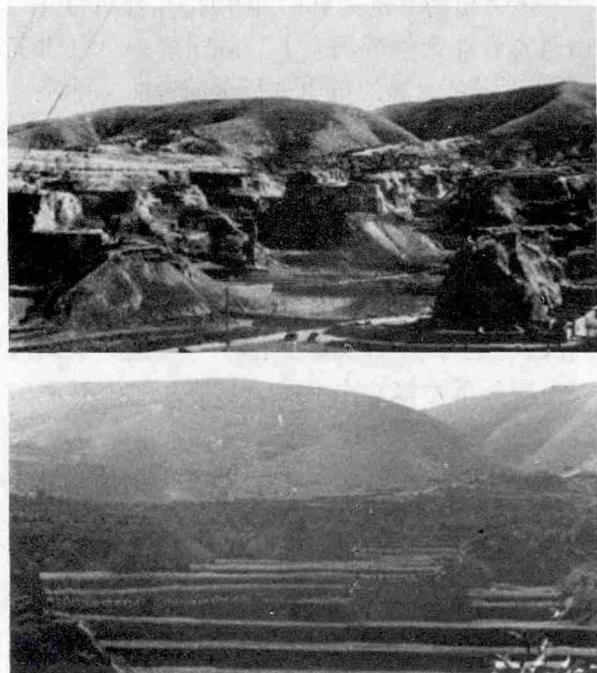
这时的陈永贵已决心投入毛泽东倡导的“继续革命”大潮,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把大寨与“农业学大寨”运动都拖上“左”的战车,全力投入“继续革命”的战斗。昔阳出生的作家孔令贤在所著《大寨沧桑》一书中写道:“陈永贵竟能对大寨以事实写就的历史反复于股掌之间,按照当时‘文化大革命’的调子,鼓动如簧巧舌,贬刘颂毛,表现自己一贯正

确。”孔令贤接着写道,对“陈永贵的种种表现大寨和昔阳的乡亲们也大为惊异。”“不知道他还要有如此强烈的叱咤风云的政治抱负!”

上有伟大领袖提出的“继续革命”理论作指导,下有“农民政治家”陈永贵这样忠诚的追随者的狂热响应,推波助澜,“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狂潮。在整个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在全国农村,尤其是陈永贵任书记的山西省昔阳县农村阶级斗争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斗走资派干部,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民,揪“五种人”,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不断地人为地以各种名目制造“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在昔阳“继续革命”的理论得到全面贯彻实行,受害尤深。全国农村在这场运动中也形成持续十几年的大规模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无数冤案,也造成极大的思想、政策上的混乱,致使整个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亿万农民的命运都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些方面过去多年来已有大量事实揭露出来,用不着笔者再加赘述了。

二、极其危险的“乌托邦”追求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另一项值得重视,却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是狂热地对“一大二



上图:大寨大队改造前的后底沟原貌

下图:大寨建设的后底沟第一个人造平原

公”“乌托邦”的追求。

“一大二公”的“乌托邦”不自“农业学大寨”运动始,是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兴办人民公社时的指导思想。毛泽东非常钟爱“公社”这个“新事物”。说公社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到一起,构成未来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它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便于先向全民所有制,继而再向共产主义过渡。并断定有了人民公社,“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人民公社的建立及其一系列过激的“左”的政策的实行,在全国刮起破坏力极大的“共产风”,造成了严重后果。但在付出沉重代价后进行的调整中,人民公社不仅名称保存下来,而且仍然作为“三级所有”中的一级,“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也没有改变。这说明有人还对公社依依不舍,“一大二公”的“理想”还难以抛弃。“文化大革命”爆发时,1966年8月,公开发表了毛泽东有名的“五七指示”,提出了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建设“共产主义大学校”的思想。这说明,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所追求的除了要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以造反、夺权,“天下大乱”的办法打倒“党内最大走资派”之外,还规划着他心目中国家的未来蓝图。他向往、憧憬着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逐步消灭社会分工,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的社会。这是1958年“大跃进”、“公社化”过程中失败了的“一大二公”乌托邦理想,在“文革”条件下的复活。

陈永贵本是农民,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肤浅、片面的。他认为所有制越公越是社会主义,分配上越平均越是社会主义,生产组越大越是社会主义。其实质就是刘少奇批评过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他与“一大二公”的空想息息相通,心心相印,决心借“农业学大寨”运动,实现毛泽东“一大二公”理想。昔阳县是他狂热追求“一大二公”的“试验田”。

首先是把生产规模上的“小”改大,把公有制水平不断提高。具体行动是先在大寨后在昔阳全县实行由生产队核算向大队核算的“穷过渡”,并要通过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各地农村搞“穷过渡”。1975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

前夕,陈永贵又上书毛泽东,其中内容之一便是建议立即在全国农村实行“穷过渡”。无奈被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否定。

陈永贵绝不放弃。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加大推行“穷过渡”的力度。1977年5月23日,陈永贵在中共昔阳县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昔阳从1968年整齐划一实行了大队核算,这是一场革命。”他要昔阳准备好大队核算好处的材料。他要在全国农村像昔阳一样全面“过渡”到大队核算。1977年10—11月间,国务院召开一次“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会议主持者(陈永贵是主要人物之一)明确提出:“今后3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基本上完成向大队核算过渡。”这次会议后,全国各地农村多数地方抵制了这股“过渡”风,而陈永贵不屈不挠,在昔阳县加紧行动起来。陈永贵要求昔阳县委,在1980年之前,全县20个公社要有1/3完成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然后再向县级统一核算“过渡”,把昔阳建设成第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县!他在全县干部大会上问县里的一些老干部:同志们想不想看到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县呀?我们昔阳就是要干这样冒险的事!

1977年,陈永贵在昔阳县开始组织从大队核算向公社核算“过渡”。他决定先从大寨公社做起,再推到全县。1977年7月9日,大寨公社党委按照陈永贵的指示,制定出一份《关于逐步实现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草案》来。这份计划草案提出了宏伟的目标,要使大寨公社“成为消灭城乡差别的榜样,让人从大寨看到共产主义的明天。”陈永贵的“过渡”冲动已经急不可待,可以说颇有几分疯狂。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彻底否定才不得不罢手。

陈永贵实现“一大二公”乌托邦理想的又一个方面的行动是坚决批判并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主要措施是:在全县范围内彻底“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收自留地、关闭集市贸易、取消家庭副业。就是要用这“一整套”办法,使资本主义在大寨、昔阳断根、绝种。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昔阳资本主义越批越“深入”,不断有新口号提出来,批什么“山沟里的资本主义”、“家庭里的资本主义”、“院子里的资本主义”、“房前屋后的资本主义”等等。有的公社只允许社员“一户一猪一树”,“一人一鸡一兔”。



毛泽东接见陈永贵

在收了自留地,砍了家庭副业,关闭了集市贸易,胜利地攻占了一个又一个有形的“资本主义阵地”的同时,陈永贵在昔阳又开展起“思想领域”的斗争,要消灭人的“私”心,灭人的“私欲”,培养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新型农民。

在1963年大洪灾之前,大寨还是原来旧村的时候,社员们各有住房,各家都有自己的厕所、猪圈和自留地,用陈永贵的话来说,各家都有一个“私字”大本营。大水之后建设的大寨新村是统一规划修建的,像一列列火车车厢排成数行,户户门连门,每家没有自己的院落,没有所谓的“房前屋后”,出了门便是公地,革“私”字的命可谓彻底。初次见到这种住房,我感到这不适合农家生活,以为是受山区地形的限制的无奈选择。可后来才知道这是陈永贵的精心设计。他要用这个办法彻底消灭社员的私心,培养一代一心为公的新型农民。

为达到这个目标,陈永贵还在分配制度上搞出一个“新套套”,这就是大寨评工记分法。这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全面开展后,首先向全国推行的,也是影响最普遍的一项“大寨经验”。这个被广大农民讥为“大概工”的“大寨评工记分法”(简称“大寨工”),原来只是大寨为了减少评工的麻烦而采取的一种“简化”办法,一月一季评一次工分。在当时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劳动管理普遍混乱的情况下,大寨这样做也是一种探索,本也无可厚非。但1964年毛泽东听陶鲁笳汇报时赞扬了这种办法,1966年春天陈伯达又插手此事,说,“大寨工”是一项“伟大创造”,是在“农村突出政治”,引导农民一心为劳动,是“培养”一代共产主义新型农民的有效途径。陈永贵闻听此言,“茅塞顿开”,马上就坡上驴、“上纲上线”,说他创

造的这项经验是在大寨搞了一场“劳动管理革命”。目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树立一心为公劳动，为革命种田的世界观。”

为了推行“大概工”，1966—1967年间，国家农牧渔业部在大寨召开两次全国性现场会，陈永贵做了两个半天的发言，说由于实行了这种办法，大寨在培养新型农民方面已经取得了伟大成效，说今天的大寨人已经“非常革命化了”，劳动“已再不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了，而是为社会主义创造财富。”说今天的大寨人是“站在虎头山，眼望天安门，心胸全世界”，“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风格的农民”。“大概工”在全国农村推行后，所谓新型农民没有见到，而全国各地人民公社社队的劳动管理进一步陷入混乱，结果是“大锅饭”盛行，农民普遍怠工，人民公社完全失去发展活力。

从以上诸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陈永贵为实现“一大二公”乌托邦理想，一腔狂热，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借“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大势，先在大寨、昔阳，后在全国农村，实现毛泽东1958年“大跃进”时期未能实现的“一大二公”的社会理想。昔阳是他的“试验田”，他要先行在太行山里，在大寨及昔阳县搞出一个真正体现“一大二公”，实现县级全民所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个人私有财产及私欲、人人为公、处处公平、没有差别，而且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当代“乌托邦”，实现毛泽东的遗愿。

空想的“乌托邦”在一群不掌握政权的理论家们手上，作为一种学说来研究时，写出几篇充满空幻色彩的“锦绣文章”，或在某个封闭地方实行一场充满激情的社会实验，表达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不满，寄托一点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和探求，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而掌握了政权的人们，头脑发起热来，不顾客观条件，真的要以阶级斗争的强制手段把“乌托邦”变成现实，结果必定造成天怒人怨的大悲剧，整个社会都要为之付出沉重代价。1958年血的教训过去只有十多年时间，可谓殷鉴不远，就有人硬要去重蹈覆辙，这是多么可怕啊！

三、农村改革开局时的最大阻力

“农业学大寨”运动又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是

它在农村改革中的表现。改革开局时，他竭力反对安徽等地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纠正“左”倾错误的行动，成为阻碍农村改革进程的重要阻力。

我们都知道，中国农村改革是从安徽等地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开始的。虽然，粉碎“四人帮”之时饱受“左”的错误摧残的中国农业已到崩溃的边缘。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绝大多数生产队都成了“三靠队”（种地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不变革就没有出路。但当时党中央领导仍坚持毛泽东倡导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的路线，认为“四人帮”的错误是“右的不能再右了”。这就决定了纠正“左”的错误，改革人民公社体制的行动不可能立即发生。连一马当先走在改革前列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都坦言，当时他也不能提出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因为“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他说，当时他在安徽纠正“左”的错误的行动只能是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六十条’中去找根据”。就是以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为突破口。

与安徽情况相类似的还有四川。中共四川省委在农村方面最重要的措施是：从1977年秋开始“全面清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在安徽、四川两省的带动下，全国先后有甘肃、辽宁、内蒙古、广东等省、自治区也开始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纠正“左”的错误。

历史证明这是一项正确的选择。正是安徽等省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的行动，为农村改革闯出了道路。

而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对立面，是“左”倾错误。“六十条”规定的各项政策，多年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不能真正实行，在不少地方遭到全面破坏。这中间最大的破坏力之一就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现在要落实政策，必然要遭遇“左”的力量的反对，其中冲在最前面的便是正处在高潮中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一腔狂热正准备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陈永贵等人，认定安徽等地落实政策的行动，把所有制从公变为“私”，生产组织规模从大改小，与“一大二公”背道而驰，是搞“一小二私”，就是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陈永贵忍无可忍，要发动“反击”。反击的矛

头首先指向中央媒体的宣传报道。其实,这时新闻媒体的报道主要是宣传安徽某地落实政策,拨乱反正,纠正某些“左”的错误的行动,对“农业学大寨”运动只是要“拉开距离”,并没有对它进行揭露、批判。但他们却主动向媒体“亮剑”。1978年初,陈永贵决意趁回乡过年之机,在山西组织文章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中央媒体以纠“左”、落实政策为中心的农村宣传报道进行“反击”。这是一场新中国新闻史上罕见的由地方党报组织的向中央媒体发起的“反击”,是农村改革进程中的一场严重的斗争。

从表面上看,他们“剑”指媒体,其实“反击”的矛头指向安徽等地落实政策,纠正“左”的错误的行动。这样一来,排除“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干扰,就成了关乎农村改革能否正常展开的一场严重斗争。这是一场不期而遇而又无法绕开的遭遇战。开始时,要落实政策的人并没有主动去反对、批判“农业学大寨”运动,而“学大寨”运动却从一开始就坚定地反对落实政策。两军对垒,斗争不可避免。不管你愿不愿意,要纠正“左”倾错误,就得与“农业学大寨”运动“左”的一套做法展开斗争。是从农村农业实际出发,落实政策,纠正“左”的错误,拨乱反正;还是继续深入发展“大批促大干”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成了这一时期农村农业战线上的斗争焦点,两者之间的斗争孰胜孰负成为决定中国农村农业命运、前途的关键。

春节过后,陈永贵组织的“反击”打响了第一枪。2月26日,《山西日报》在头版突出位置发表了山西省委召开电话会议部署春耕生产的新闻。一位省委书记在这次会议上借题发挥说:“对于大寨的根本经验和一整套经营管理上的先进经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学习、推广。”3月2日,大寨所在的晋中地区的党委机关报《晋中报》紧紧跟上,报道了晋中地委召开县(市)委书记座谈会的消息,借通过参加座谈会的众人之口高喊:“大寨、昔阳基本核算单位过渡经验,以劳动管理为中心的一整套经营管理办法……都是大寨根本经验和昔阳学大寨成功的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真学大寨,就要坚信不移、坚定不移地推广这些经验,或为推广这些经验积极地创造条件。如果对大寨、昔阳的一个个具体经验发生某种程度的怀疑、动摇,不认真推广,那么,学大寨



上世纪60年代陈永贵(左三)、郭凤莲(左五)和其他大寨带头人的合影。

运动也就只留下一个空口号,到头来还是假学,甚至滑向反对学大寨的道路。接着该报发表社论说,“学习推广大寨、昔阳一整套经营管理经验,始终存在着斗争。这个斗争,实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在整个“反击”过程中,山西从省报到地方报发表各种文章、报道二十余篇,唱主角的是《山西日报》。4月16日该报发表的长达万字的编辑部文章:《真学大寨就有农业发展的高速度》。该文可谓此次“反击”的领衔之作。文章说,“我们也有同志总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对于大干社会主义,缺乏魄力,放不开手脚,不是把着眼点放在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上,或者在顺利的时候,还觉得社会主义可靠,一遇到艰难险阻、天灾人祸,就忘了社会主义,又觉得还是资本主义、小农经济那一套可靠。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可以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搞社会主义。”文章强调,“一定不能忘记农村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这个主要矛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继续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向各种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反动势力和错误倾向进行斗争。”

从这些材料里,我们不难看出,三十几年前那次“反击”是多么猛烈,斗争是多么尖锐!但这种“反击”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除山西省外,全国各地没有一家媒体响应。

大概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许多人不了解三十多年前那场“反击”的详情,甚至根本不知道改革过程中曾发生过这样一场严重斗争。然而,这是确凿的史实。不少史家都认为这是农村改革过程中的第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严肃斗争。令人

也谈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与军科军史研究部及《红西路军史》作者商榷

○ 冯亚光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及2011年出版的《红西路军史》，虽然间隔20余年，但观点一致，对西路军的叙述或论述，都意图与张国焘挂钩，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创立永凉根据地

《军战史》在第五章第五节“西路军转战甘西北”中写道：“在此期间，敌军毛炳文部于16日开始西渡黄河，拟向大靖前进。红军总部将此情况电告了西路军领导人，并指示他们‘兵力应相当集结，速打通远方为要着。’17日，西路军领导人向中央及红军总部报告了部队行动情况，并提出：‘我们决以打通远方与争取在甘、凉、肃地区建立根据地之任务，主力须速西进，迅取甘州’，‘再以五军出肃州’，‘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位，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18日，中央领导人复电西路军说：‘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指示他们，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部；部队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

欣慰的是，斗争的结果“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干扰被排除了，农村改革得以继续向前推进。若让“农业学大寨”运动占了上风，农村农业战线上便摆脱不了“左”倾的束缚，改革便寸步难行。农村改革的风云人物万里在1990年代回顾农村改革历史时，说，“农村改革的历史过程就是同‘左’倾错误作斗争的过程。”他说，安徽农村改革中的斗争“大体有三个回合”。“第一个回合就是突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阻力”。

检查政治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等。19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联名致电西路军领导人，指出：‘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对付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

此段行文，告诉读者：红军总部及西路军领导人主张西进，“打通远方”；而中央指示“留住一时期”，“创立巩固根据地”。《军战史》没有说清，似乎也不想说清，中央和红军总部为什么要西路军停止西进。难道仅仅是为了远方的物资“准备不及”？其实，准备不及并不要紧，西路军可以抓住战机，趁虚西进，接通新疆后再等取货物。河西走廊是马步青和马步芳的地盘，“二马”势在必夺，寸土必争。西路军屯兵那里，终日与敌鏖战，有耗无补，伤亡惨重。如此等待远方的货物抵达新疆，必要性何在呢？

《红西路军史》在第五章“创建永昌、山丹根据地”中说的比《军战史》更为直白：“党中央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看法是有分歧的。红军总部主张西进……”

改革初始时的那场“反击”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段时间里的“对抗”行动表明，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农业学大寨”运动代表人物是站在改革的对立面上的。所幸在实践面前陈永贵最终放弃了对抗的错误立场，回到正常的道路上来。但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斗争，已成为农村改革史册上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篇章。这是无法抹去的历史真实。■

（作者为《瞭望》周刊原主编）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西路军进至河西走廊后,就发现这里是一条“弄堂”,永凉一线地处走廊蜂腰部。这里南临终年积雪的祁连山,祁连以南又是大坂山、大通山、宗务隆山等大山;北依合黎山、龙首山和浩瀚无垠的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走廊平川几乎没有回旋余地,甚至没有护卫,仅有的屏障就是星星点点的土围子和战士的枪上刺刀和少得可怜的子弹、手榴弹。无论从地形、敌力和民情条件来看,大部队都难以久驻。11月17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洛(洛甫,即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我们决以打通远方……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18日,洛、毛、周电告朱、张并复徐、陈;19日,林(育英)、朱、张、周电复徐、陈;20日、23日,洛甫、泽东电示徐、陈;口径一致,均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创造根据地,保持向东回旋余地。西路军奉命停止西进,创立永凉根据地。红九军古浪一战,遭受重创,西路军领导人已感到形势不妙。11月19日和21日,徐、陈致电林、朱、张、毛、周:“马敌虽受重创,但仍能集新锐之兵与我拼死战,我方过河后人弹消耗极大未得补充。九军渡河至今伤亡二千四百左右,干部伤亡极大,更难提起。”他们认为,如在永昌、凉州地区与马敌和追敌毛炳文部决战不利;不决战则很难立足,因此建议继续西进,出甘州、肃州、安西地区,争取取得接济再回师击敌。这时中央已经知道西面敌力空虚,“邓发从迪化来电,安西、敦煌两县仅有民团,且无枪,更无军人”,而西路军派人与马步青谈判,马亦暗示西路军“速进甘、肃、安西”(凉州是马步青的地盘,西面不是),但中央一再电示西路军必须在永、凉地带坚持作战。“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永凉一线摆开,终日与优势敌人拼搏,试图站稳脚跟。徐、陈发表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战胜一切困难,建立永凉根据地。

中央令西路军在现地留驻,根本原因在于,河东红军要执行11月8日的《作战新计划》。只要河东红军尚未东北出和东南出进行新的战略转移计划,西路军就暂时不能西进。西路军在现地与敌血战,意义有二:一是迷惑蒋介石,造成西路军与河东红军隔河相应的态势,“使敌疑我西

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便于河东红军乘虚东出;二是拖住了河西“四马”(包括宁夏二马)的兵力,使之各图自保地盘,不敢向河东出击。蒋介石这时判断,陕甘主力红军将在黄河结冰时,突窜甘、新、蒙地区与徐向前部会合。于是严令王均和胡宗南部主力,以豫旺堡为扼制重点,沿海原至惠安堡、甜水堡一线,层层筑碉设防,令宁夏马鸿逵部加强东面的防御力量,共同控制西、北两个方向;并令已西渡黄河、布防兰州附近尾追西路军的毛炳文部也转向河东集结,以待陕甘红军西渡黄河时分段截击。这样,就给陕甘红军以乘虚东出的有利时机。

党中央将红军主力准备撤离陕甘苏区东出的计划,向张学良通报后,张要求红军暂在现地坚持一两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中央遂决定暂不行动,并紧急筹粮(数万红军已经到了缺粮断炊的地步)待机。徐、陈并不清楚河东红军的行动意图,于12月6日还向中央建议:“我们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大、凉、民进。”当日,毛、周、朱、张电告西路军:“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敌的任务下,暂不西进。”西安事变发生,整个局势变化,河东红军才取消了东出进行战略转移的计划。由此可以看出,中央令西路军在永凉地区艰苦鏖战,创建根据地,是为了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西路军问题也与西安事变息息相关。根据张学良的要求、陕甘红军放弃东出的战略转移计划,改为南下关中,援助友军抵抗亲日派的军事进攻;还拟令西路军东返,配合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当时的大局,是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西路军配合西安事变,顾全大局,无可争议。西路军的行动,是党中央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12月底,西路军撤离永昌、凉州地区,再次西进,建立永凉根据地的任务结束。西路军鏖战永凉,肩负的是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的千钧重担。

创立临高根据地

《军战史》在“西路军转战甘西北”一节的最后一段写道:“西路军在甘肃西部奋战了四个月,毙伤俘敌共约2万人,给了马步芳、马步青所



部以沉重的打击。西路军的广大指战员以有我无敌、不畏艰险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同敌人浴血奋战,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们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精神,永为革命后人所敬仰。”

这里讲了西路军给马敌以沉重打击,西路军指战员浴血奋战、英勇献身。但是,《军战史》没有说,西路军是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的战略部署和指示。如果不带偏见,把西路军的电报和行动全部研究清楚,承认其重要战略策应作用,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

西路军转战甘西北,第一次西进,奉党中央和军委的命令,在永凉一带创建根据地,艰苦鏖战,是为了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西路军再次西进,又奉党中央和军委的命令,在临(泽)、高(台)地区创建根据地,浴血奋战,同样是为了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西路军再次西进,以红五军开路,红三十军殿后,前攻后卫,边打边进。1937年元旦,红五军一举拿下高台;1月上旬,红九军一部围攻甘州未下,进驻临泽东南的沙河堡;总供给部、总部直属队和红五军一部驻临泽;总指挥部及红三十军驻倪家营子。

这时,河东形势又发生突变,内战乌云再次笼罩陕甘上空。蒋介石飞回南京后,囚禁了张学良,而且食言于“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顾祝同率37个师“讨伐”,其中15个师已进入潼关。东北军和西北军群情激奋,要同中央军拼命,要求放回张学良,要求蒋介石履行“诺言”。西安方面和中央军两军对峙,双方都摆成阵势,做出要打的姿态。红军坚决表示

与东北军、西北军采取一致行动。1月2日,军委通电:“各兵团各驻原地集结待命,准备配合友军作战。”1月5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陈、李及军政委员会:“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由于军委没有告知西安事变后河东方面出现的曲折,西路军领导人不知道全局情况,对于军委又一次改变部署,要“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迷惑不解。1月6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军委主席团:“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负完成任务使命,但停此太久消耗实力,全靠自力不能解决‘二马’,奠定抗日后方。如必须先机或同时完成奠定抗日后方的任务,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如何速示”。7日,军委主席团复电徐、陈:“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只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靠任何外力”。8日,军委主席团再致电徐、陈并军政会,指示进一步要求西路军在临、高地区创造根据地:“你们应从信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因为消灭敌人创造根据地,正是接通远方,建立抗日后方的实际行动”。“依现时敌情、地理、经济、粮食、气候条件,西路军须全部集结临、高地带,执行上述任务,并求休补,现勿分兵去安西”。同日(8日),徐、陈电告军委主席团西路军面临的困难,并“再次请求将四军、三十一军向凉州开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任务”。同日(8日),军委主席团又一次致电徐、陈,向他们通报:“蒋回南京后,违反条约,将兵撤出陕甘之计划不执行,重新部署逼迫陕甘”,“张、杨、红三方面团结很紧,决心抗战。”指示徐、陈,“创造肃、甘、安根据地”。9日,军委主席团又一次致电徐、陈,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令西路军“集中主力,坚决歼敌,才是出路”:“四军、三十一军路途三四千里,沿途阻

塞,何能来援助你们。请勿作此想”。“你们集中主力,坚决歼敌,才是出路……部队应缩紧编制,每人能拿一样武器,刀矛也好,能人自为战,即可灭敌”。当日(9日),徐、陈复电军委:“九、三十军今夜可全部集中主力在沙河堡,决在此灭敌”。西路军虽然久战疲惫,但总指挥部将红三十军、红九军集中于沙河堡,决心在此寻机歼敌。

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说:“多事之秋,变幻莫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二马,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有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

西路军第二次西进,又停止西进,在临泽、高台血战,也是为了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可是,《军战史》却略而不提,避而不谈。

西路军的失败

《军战史》第一卷第五章第五节三的标题是“西路军的失败”,《红西路军史》第七章的标题是“红西路军的失败”。《军战史》概略介绍了西路军失败的过程,但没有谈及失败的原因;《红西路军史》也介绍了西路军失败的过程,并且引用了“历史当事人对西路军失败的看法”。

《红西路军史》写道:“毛泽东是最早谈到西路军失败原因的。他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毛泽东的此文,曾在

红军大学作过讲演。

这篇文章的原注释说:“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毛泽东的这个断语和这条注释的文字表达让人困惑,很有点费尽心思强作文章的味道。仔细查过史实,发现与史实不符。第一,1936年12月西路军并没有失败,虽然受到大的损失,但仍在艰苦作战,第二次西进就在12月底元月初;第二,1936年12月党中央还没有精力、时间和其他客观条件来集中解决党内高层的路线分歧,到1937年3月中央才召开批判、清算张国焘路线的会议并作出结论。据此,毛泽东不会也不可能于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的这次讲演中,以一两句话来宣称张国焘路线已经破产了,何况这种宣称与西路军的失败相联系,而西路军这时还没有失败。我们断定,这个断语和注释不是演讲当时的话语和意思,行文上脱离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时限,是后来加上的。今天以这些说法作为历史研究的依据,是违背历史真实而站不住脚的。国防大学教授丛进写的《对“毛选”中有关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辨疑》一文,发表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对此已有详实论证,本文不再赘述。

这条注释,在1991年6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修订再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改写为:“……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注释的改写,清楚地说明西路军这一历史疑案不仅大白于天下,而且得到党史界的认可,得到党中央的肯定。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结果。

《红西路军史》写道:“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央

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西路军刚刚失败，中央即以此为由，开展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并致电共产国际请示。3月22日，由季米特洛夫签署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复电致“中共中央”：“对你们第64号电答复如下：我们没有十分准确的情报能够使我们对张国焘问题作出明确的表态。我们不相信，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像你们所做的那样来审查西路军的地位问题。（俄文版原编者在此处加注：“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西路军，中共中央企图将其失败的责任加在张国焘头上。”）我们认为，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作专门决议并就此展开讨论。要千方百计避免激化党内关系和派别斗争，时局要求团结党和红军的一切力量来对付敌人，并有必要准备齐心协力地反对无论来自何方的对红军的打击。”共产国际清楚地了解西路军形成的背景和西进河西的原因，因而不同意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加在张国焘头上，“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的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

共产国际有明确态度，但就在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31日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仍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此后，西路军便与“张国焘路线”长期捆在一起，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推翻了这一错误结论。

《红西路军史》的作者还援引了陈昌浩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节录）、《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书》。陈昌浩的两次“报告”都是当年在延安写的检讨。1937年8月，陈昌浩回到延安，被免去一切职务，接受了长达一年的审查。9月30日，他写完《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10月15日，又写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书》。《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现在只能见到中共中央秘书处1937年10月5日印发的第九章“渡河时期”（略去五、六节）和第九章“总的结论”，

约1·7万字。中共中央秘书处对此说明：“昌浩同志的长报告共九章，约有六七万字，因太长，现将重要的第一章及第九章全部抄出，供大家研究。”

在第一次报告书中，陈昌浩作了自我检讨，承担了“最主要的实际执行的责任”。但是，他强调，“虽然西路军对于中央与军委指示执行的不充分，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路线，绝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认为西路军西进是“当时中央军委的正确指令，与当时客观上之需要”，“西路军绝对是在中央领导之下”，“是为党的任务而斗争，指战员为命令而努力，这当不可否认的”。陈昌浩的第一次报告，几乎就是今天我们对西路军的评价。第二次报告书只有三千余字，简单、空洞，主要是上纲上线。诸如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始终执行了国焘路线。”

1939年9月，陈昌浩跟随周恩来、邓颖超等去了苏联。这期间，他曾当过采石工、消防队员，还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在苏联期间，陈昌浩曾多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回国，但未得到回复。直到1952年，离开了13年之久的陈昌浩才被允许回到了祖国。

徐向前于1937年6月回到延安，他回到延安的时间比陈昌浩早。他也写过检讨，只是毛泽东没有让他在大会上公开检讨。西路军乃至红四方面军的很多干部，后来长期笼罩在“张国焘路线”的阴影下。即便是徐向前本人，也经历了一段很微妙的“考察期”。抗战初期，徐向前在一二九师当了一段副师长后，被派到冀南搞平原游击战争；一年后又奉命赴山东，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他相继在两地打开了抗日局面。直到这时候，中央北方局才有一个电报，说“徐向前是可以信任的”。

检讨，任何人的检讨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反映历史现象的本质”。徐向前对西路军的认识也是有发展有变化的。“西路军自始自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就出自他的回忆录。■

（作者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泰山肃托案

○ 赵学法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20世纪40年代初,在苏共大规模反托斗争的影响和中共内部极左思潮的推动下,当时的泰山区发生了一起耸人听闻的“肃托”错案,史称“泰山肃托案”,致使许多抗日阵营内部的优秀党政军干部无辜蒙冤,甚至惨遭杀害。

一、案发背景

“肃托”的全称是“肃清托洛茨基反对派”。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主政时期,苏联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旨在排除异己,强化集权,许多不同政见者被残酷镇压,株连大批无辜者蒙难沉冤。在中国,陈独秀等人在1931年5月成立了所谓的“托派中央”,但门庭冷落,和者甚寡,始终未成气候。抗战期间,“托派”在中国境内并无统一组织,在中共内部更不曾潜伏着一个从上到下、系统完整的“托派”组织。可是,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国后,却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1月,康生在延安《解放》周刊第29和30期以连载方式,发表了臭名昭著的《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长文,毫无根据地诬蔑陈独秀是“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荒谬地将“肃托”与反对汉奸相提并论,虚构、夸大“托派”的声势,臆造“托派”有一套系统的组织,在党内造成了对“托派”的神秘感和恐惧感。

1938年8月,康生担任了中共中央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独揽“肃托”大权。在康生的强力推动下,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迅即开展了规模不等的“肃托运动”。作为抗日根据地之一的山东在所难免。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肃托”,自1939年春从鲁南开始,直到1942年4月刘少奇路过山东指导工作时,才

得以彻底纠正,历时三年多。据《山东党史资料》总第四十二期披露,鲁西区错杀33人,鲁南区错杀30余人,胶东区、滨海区等地区和八路军115师、山东纵队也有许多干部战士被错杀。其中最严重的是“湖西肃托案”和“泰山肃托案”。

“湖西肃托案”发生在1939年8月至同年11月,而“泰山肃托案”则发生在1940年8月至1942年2月。按说,“湖西肃托案”被制止、纠正后,不应该发生同一恶性的泰山区“肃托”错案。因为194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明确指出:湖西地区“在所谓肃托斗争中,曾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在暗害分子王须仁的阴谋下,采取非刑拷打,指名问供,有供即捕等诬陷手段,其结果不仅造成乱打乱杀的恐怖,而且使湖西地区党政军民工作都受到了极大损失,地方党在该地区内辛苦缔造的工作基础,悉被摧毁;忠实的党员和群众,遭受无辜的牺牲。”遵照中央的决定,暗害分子王须仁和王凤鸣以及对这一事件负有重大责任的湖西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等人,分别受到了严厉处分,对无辜牺牲者进行了平反昭雪,对被难者家属进行了抚恤。

中央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

（一九四一年二月）

一、在残酷和紧张的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面前,革命的一切敌人(民族敌人与阶级敌人),对与革命政党与革命群众,不仅采取公开的逮捕破坏,而且还采取暗杀的手段,设置暗杀分子,假入组织,伪装革命,利用党内某些弱点,来实行暗害,以逼其假刀杀人越货之计。这种暗害手段是极其阴谋毒辣的。它不仅可以达到其屠杀革命者的反动目的,而且可以蒙蔽与欺骗群众,使一大群群众对革命政党发生恶劣影响,丧失革命党的威信。我党在抗日方面,由于十年的斗争经验,对于这种暗害手段,虽然多有认识与高度的警惕。但是抗战以来,许多地方新发展起来的党,由于斗争经验的缺少,干部幼稚,发生了思想麻痹。便给了暗害分子以可乘之机,来实行其假刀杀人越货之计。湖西虐杀事件,是此等行为的一个证明。

二、一九三九年八月湖西边区(山东纵队南面军区),在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后,即停止政治错误。在暗害分子王须仁的阴谋之下,虽然非刑拷打、指名问供、有供即捕等手段被停止,其结果不仅造成了乱打乱杀的恐怖,而且使湖西边区党、政、军、政工等部门受到极大的

1941年中央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

尽管中央对“湖西肃托案”作出了决定,但并没有刹住“泰山肃托案”这驾狂飙的马车,在错误的斜路上又急驰了1年,个中原因更值得深入思考、探讨。

二、荒唐案情

1939年,莱芜境内的北部山区是泰山区的一块坚固抗日根据地,是中共泰山地委、泰山专署、泰山军分区的机关所在地。这一时期,泰山区中共的力量得到空前壮大,仅莱芜县就发展党员8000人。但在吸收新党员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地方操之过急,政审不严,致使党员成分复杂,思想不纯。加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伪、顽呈现合流之势,一度出现了奸细分化瓦解中共组织的破坏活动。

在这种复杂的斗争形势下,中共山东分局发出了开展锄奸工作的通知,同时要求各级党组织进行清理整顿,旨在纯洁党员队伍,加强党的建设。这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必须做好的。但是,由于个别领导干部在锄奸工作中提出了“怀疑一切”的工作方针,从而出现了严重扩大化。自1939年初泰山特委(后改地委)第一大队(后改军分区)建立军法处、吕剑光(莱芜人)担任处长后,在社会镇反工作中就露出了偏激冒进、捕杀无度的错误苗头,继而蔓延到作战部队。亲历者亓象岑1984年撰文说:“我曾亲眼看到在李条庄一次杀死战士5人,在野庄村一次杀死战士4人。有的是小题大做,有的是主观臆测,酷刑逼供,屈打假招……1939年夏天,泰安大汶口有7个青年学生(4男3女)出于抗日爱国热情,经秘密相约一起逃到莲花山(新泰西北境),找到泰山特委第一大队参加抗日。只是因为怀疑他们是被敌人派来的奸细,便在野庄村被一起杀掉了。”(亓象岑撰:《泰山区“肃托”错案》,载《山东党史资料》总第四十二期)这种混淆黑白、不分敌我的错误做法,不仅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反而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赏识。

康生的“肃托”指令下达后,泰山区的锄奸工作在擢任地委社会部副部长吕剑光(部长由地委书记刘莱夫兼)的主导下,在许多人还没有搞清什么是“托派”的情况下,就将斗争矛头对准了有名无实的所

谓“托匪”,上演了一场自相残杀的历史悲剧。

“泰山肃托案”,就是极端思想的酿成的系列冤假错案。

此案由怀疑泰山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刁芙蓉肇始。刁芙蓉原名王毓鉴,于1937年6月在北平私立宏达高中读书时,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七·七”事变后,随平津流亡学生返回山东参加抗日工作。同年9月,他在无棣县由李安民介绍入党,旋因日寇入侵山东,混乱中与李安民走散,失掉了组织关系。1938年春,又经杨士法介绍重新入党,年底到中共山东分局青委会工作。1939年冬由省青委会派到中共泰山地委青年部,次年擢任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

1940年夏季,泰山地委青年部长、泰山区青救会主任兼地委机关党支部书记彭子芳和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范琳(著名民主进步人士范明枢孙女),在向地委汇报机关人员思想状况时反映:听说刁芙蓉的胞兄王毓铨(旅美著名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后经周恩来批准回国,任中国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可能是“托派”,去美国留学后,刁与其兄通过书信;刁对地委社会部的工作有些不同看法,认为“杀人太多”,对党不利;他还曾流露出对地委宣传部部长董琰不够尊重的情绪。据此,彭、范估计刁芙蓉有可能是“托派分子”。这时恰值地委社会部副部长吕剑光从山东分局学习归来,闻知刁芙蓉的上述情况后,引起高度重视,未作深究即布置了对刁的暗中侦察。

事有凑巧。这年的麦收前,莱芜县鲁西区委宣传委员陈峰(原名陈际云,鲁西村人)曾在家中酒后失言,对鲁辛乡党总支书记李希伊说:“待麦子熟了,要动员鲁西村贫苦农民抢地主一点麦子吃。”(同上文)虽然李希伊没拿此话当真,未作具体布置,鲁西村也没有发生抢麦子事件,但陈峰说过的话却传扬开来。此事被负责侦察刁芙蓉的地委社会部代一科科长刘敬斋(莱芜人,后更名刘波平)知晓,遂上纲上线,认为这是一桩“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并把这件事情和他负责侦察的“托案”联系在一起。恰在这个时候,刁芙蓉到兰沟崖村(莱芜县鲁西区委驻地)检查宣传教育工作情况。区委书记郭居鉴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油坊东家之一,便准备了四盘菜摆在桌上,打算汇报结束后留刁吃饭。此事被刘敬斋看在了眼里,

记在了心里。当汇报接近尾声时,鲁西区抗日自卫团团长亓信忱(兰沟崖村人)也因公事来到现场。刁美萃婉拒了郭居鉴的盛情挽留,坚持赶回机关用餐,郭、陈、亓、刘四人一起送走了他。尽管负责侦察的刘敬斋亲眼目睹了刁美萃拒餐一幕,但仍将“破坏统一战线”、“吃吃喝喝”等情况串接起来,作为“托匪”活动的“证据材料”报告了地委社会部。刘敬斋这种罔顾事实、罗织罪名的荒谬做法,是造成“泰山肃托案”的直接导火索。

中共泰山地委社会部轻信了刘敬斋的一面之辞,在未作复查、核准事实的情况下,就草率地据此“汇报”提出了“破案意见”。经地委同意后,于1940年8月下旬逮捕了陈峰,成为“泰山肃托案”的第一个蒙难者。社会部根据屈打成招的“口供”,于8月28日逮捕了该区的亓信忱。然后按照陈、亓二人的“口供”和原来的“材料”,于同年9月间逮捕了刁美萃和郭居鉴。此后,再根据酷刑得出的新“口供”,按图索骥,辗转牵连,迅速在地委机关和莱芜县、区机关逮捕了近30名党员干部。呈现迅猛扩大之势,造成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恐怖局面。

1940年9月底,获悉敌人行将对泰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为了丢掉撤退中的“包袱”,决定立即处决一批“托匪分子”。于是,9月29日夜,在莱芜北部牛头河村处死了陈峰、谷德、刘子芬、王俊峰、王莹等16人。加上在这之前因坚贞不屈、酷刑致死的莱芜县委南部办事处书记李耐夫、莱芜县青救会会长孟华,共18人。但李耐夫、孟华被刑讯致死问题社会部并未报告地委,擅自将二人列入被处死的18人中。这是“泰山肃托案”的第一批被错杀者。9月30日凌晨,在反“扫荡”途中,又分别杀害了刘进和王鉴等数人。无辜被杀的这些热血青年,均系“七·七”事变后首批投身八路军、参加抗战的仁人志士,都在20岁左右,正值激情澎湃、青春燃烧的黄金年龄。

首批被捕者中,幸免于难的仅有亓信忱、亓丰珠、郭居鉴、李新华等6人。行刑那天,刘敬斋带着这些被折磨得几近麻木的“人犯”残忍地陪斩,亲眼目睹血淋淋的一幕,以示震慑警诫。据幸存者亓信忱后来回忆:所有被处死者都是用刀砍头,行刑过程是每个人各自挖好土坑,第二名把被斩的第一名埋好后再等候斩首,可谓触目惊

心,惨不忍睹。第一批被捕的30人,除上述6人因“坦白彻底,可以争取”被释放外,只留下了被认定为“托派骨干”的刁美萃和王墨林,计有22人被杀。

刁美萃经不住严刑拷问,违心地承认自己是托派的“泰山地委书记”,又在同样的情况下谎称彭子芳是托派的“地委组织部长”、王墨林是“宣传部长”。既然刁、王二人“承认”是“托派地委负责人”,就属于“要犯”,为继续追逼“口供”,故9月29日暂未处决。30日凌晨,反“扫荡”战斗打响,地委社会部负责人仓促安排两个只带大刀的战士,看守戴着手铐并被捆绑的刁美萃和王墨林,然后率领社会部的武装人员匆忙转移。旋因敌人愈逼愈近,空中又有敌机扫射,看守人员各自脱岗逃跑,刁、王二人分别在两个山沟里被敌俘获,带到莱芜口镇据点。敌人问清了他们的情况后,将刁美萃押往莱芜县城,把精神已经失常的王墨林滞留在口镇。不久,地下工作人员魏佑钿按照地委社会部的秘令,将王墨林骗出据点,被劫回泰山地委社会部后处死。新中国成立后始知,刁美萃失去自由后为敌所逼,间断地做过一些伪事,并因此建国后而获刑,但事实证明与“托匪”毫无干系,纯属冤案。后来终于查清,不仅泰山地区没有“托派”,而且整个山东都不存在“托派”,完全是人为制造的一场荒诞闹剧。

刁美萃和王墨林的被俘,使“泰山肃托案”更加复杂化。反“扫荡”结束后,泰山地委青年部部长彭子芳也遭逮捕。彭子芳生于1914年,辽宁开原人,1932年在天津南开中学参加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前在北平东北大学电机系读书,“七·七”事变后随平津流亡学生撤至山东。其父彭振国曾任东北军的军长。据彭子芳之女、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教授彭一、瑞玲回忆:彭振国与高崇民、阎宝航一起在东北发动组织过抗日部队,失败后寓居、病故于天津;彭子芳的弟弟彭德权“七·七”事变后在奔赴延安途中被国民党杀害;彭子芳在抗战前曾与吕东(建国后曾任冶金部部长、三机部部长、国家经委主任、中顾委委员)一起做地下党工作,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

虽然当时有人对此案提出疑问,但因彭子芳出身不好,轻信酷刑得到的“口供”,彭子芳最后还是被无辜杀害了。

“彭子芳案”株连了前述泰山军分区民运科科长刘佩久。刘佩久原名韩维楷,邹县人,抗战前就读于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并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出任乡师党支部的负责人之一。任作民生前曾撰文说:“韩维楷(刘佩久)同志于1933年2月下旬因交通员庄少云叛变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37年底在党的营救下无条件释放……”(任作民撰:《两次被捕情形》,《山东省志资料》1959年第3期)时任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董琰(新泰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卫生部政委刘特夫(德州人),地委委员、敌工部长兼泰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枚青(新泰人)和韩维楷一起坐过牢,都知道他在狱中表现得很坚强。不巧的是“刘案”发生时,了解情况的董琰、刘特夫均不在泰山区,而李枚青则因妻子白超被疑“托匪”而撤销职务,剥夺了发言权。就这样,刘佩久在失去有效证人的情况下被冤杀。由于彭子芳被捕前曾去泰安(东)县青救会检查过工作,认识青救会会长高华(又名萧雨辰)、组织委员夏荣和宣传委员于英民(原名鲁宝珩),地委社会部就将三人推定为“托匪泰安县委的成员”,并牵连了泰安(东)县委宣传部青年干部洪鹏、方正。他们于1940年9月被捕,受尽了身心折磨。后因泰山区行政专署专员赵笃生提出不同意见,并为其作证,地委社会部才释放了王墨林之妻鲁宝瑢,其胞兄鲁宝珩(于英民)等人也随之躲过了一劫。

与此同时,1940年夏天莱芜县连续发生了“王大脚案”、“沈念武案”和“王浩案”等错案。在“王案”中,县公安局办案人员因怀疑汶南区李庄妇救会长王大脚(未裹脚而得名,娘家姓亓,夫家姓王)与汶南区云凤乡党委书记亓凤鸣“男女关系不正常”,被臆断为“托匪”处死,并牵连逮捕了一大批人,横遭皮肉之苦、精神摧残。在“沈案”和“王案”中,莱芜口镇区委书记沈念武(一说口镇区民运委员)、寨里区委组织委员王浩等人,先后因街谈巷议的“疑点”,未经核实就被错杀,数人受株连而罹难。同年9月,因泰山专署文教科科员刘进对科长刘蒲村的思想方法有些意见,并对处理一些工作提出过不同见解,就被当作“托匪”怀疑对象抓了起来,在9月30日反“扫荡”途中处死。此案株连了一些与他有联系的学生,在第一批被错杀的人中就有邵毓举、王立军等人。同年

冬天,泰山地委社会部还无中生有地制造了“章丘县冯干、吕东生案件”,以“搞挑拨离间、搞小集团、有破坏言论、搞恋爱……”等莫须有的“罪名”,枉杀了优秀干部冯干、吕东生、高玉珠、菊耐等人。其中的菊耐曾任泰山专署锄奸科科长,因对社会部侦办的“肃托案”持怀疑态度,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从而引起了社会部负责人的不满,以菊耐与淄川妇救会长马淑贞谈恋爱为由,将其调离工作岗位,名义上到后方党校学习,实际上却当作“托匪嫌疑”抓捕。严刑逼供时将菊耐的两肋烧烂,致其奄奄一息,痛不欲生。更不可思议的是,菊耐被秘杀后泰山地委社会部却宣称:“菊耐在后方党校学习时,逃跑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沈把他交给叛徒、国特、国民党的莱芜县长刘伯戈,刘伯戈在莱芜县孝义村一带杀掉了菊耐。”

1941年初,泰山地委社会部联合莱芜县公安局,悍然逮捕了莱芜县委民运部长李雪峰和莱芜县妇联主任白超(枣庄人,流亡学生,李枚青之妻)。此时,因“侦破刁芙蓉案有功”的刘敬斋已出任莱芜县公安局局长一职,得到了重用,在“反托”问题上依然惯于捕风捉影、构陷冤案,充当着极左思潮的急先锋。李、白忍受不了致人死命的酷刑,又牵连出了许多人,并逼迫李、白“承认”了是“托派的县委负责人”。随后,李雪峰和白超被确定为“托匪主犯”,押往中共山东分局社会部处死。当时白超还不到20岁,已有身孕,即将临盆,在路上因奋力抗争而被活活勒死,残害了一人两命(一说分娩后处决,母子皆亡)。其他人均由泰山地委社会部处理。

1941年3月,莱芜县公安局以锄奸为由擅自作主,逮捕了一部分所谓“托匪分子”。其中有县委秘书处会计亓立华,县委行政秘书李德霖、县文教科长田长啸、县民政科长韩寓吾、公安局警卫排班长王若恒等若干人。泰山地委书记刘莱夫闻讯后,对莱芜公安局越俎代庖、违反组织原则的做法十分不满,立即委派蒋方宇赶赴莱芜调查核实。蒋方宇和莱芜公安局长刘敬斋一起提审了亓立华、李德霖、王若恒等人。先问其中被捕的一个战士“是不是托匪”,那个战士说没干过“土匪”。又提审王若恒,逼问他“是不是托匪”,他就说“是”,但却语无伦次,漏洞百出;让他说实

话,他就说“不是”。再提审李德霖,他承认先前酷刑下的“口供”,但却声明刚加入“托派”,既没有活动,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最后提审亓立华,他承认是“托匪”,但却自相矛盾,前言不搭后语;再三追问,他就跪下说“蒋部长给俺作主”,并说以前的口供都是胡编的。

1941年4月,地委社会部直接插手莱芜县的“肃托案”,通过严刑逼供,迫使田长啸等人承认了第二个“托匪县委”。经地委批准将被捕的一般人员在莱芜杀了一批,放了一批。田长啸,韩寓吾、李德霖作为“托匪县委”的主犯,押送中共山东分局社会部,田长啸被处决,临刑前大喊“冤枉”,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韩寓吾释放,李德霖戴着“托匪”帽子下放到八路军山东纵队《前卫报》社印刷厂工作,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得以雪洗“罪名”。

1941年春天,泰山地委社会部负责人赴新泰口头传达说,地委决定逮捕胡美贞、李玉琛、杨毅刚、赵文和、张元德等人。因李玉琛正在鲁中区党校学习,只逮捕了其余四人。后来又牵连上李振东、王守全、秦成西、陈传贵、秦梅轩、张俊亭、戴彬等人。除新泰县委书记周星夫、组织部长延春成、县大队副教导员曹礼琴、公安局长朱礼泉外,其余基本上都被“咬”了进去,六、七区的干部也大批被株连。此案错杀了李玉琛、杨毅刚、赵文和、张元德、李振东等一批“顽固不化”的干部。同年夏天莱芜城区区委书记沈磊光在反“扫荡”中率区队武装转移到安全地带后,为鼓舞士气领唱了一首抗日歌曲,即以“引导敌人”的“罪名”,当作“托匪”处决。

1941年春季泰山地委社会部改为泰山区公安局后,转任公安局局长的吕剑光继续狂热地推动“肃托”运动恶性发展。同年秋天,在没有弄清谁是“托匪”的情况下,仅凭“据说博山有一个知名人物,姓翟,是个奸细,要布置侦查”(同上文),就抓捕了博山抗日民主县长翟翕武、县委民运部长谢伯望、县委青年部长谢诚中、县政府教育科长魏行之、“各救会”(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干部杨立夫、王醒吾以及翟翕武常住的房东、军属于凤岗8人。幸亏这时中央察觉了山东“肃托”严重扩大化问题,采取紧急措施,才使翟翕武等8人幸免于难。

1941年初冬,中共中央电告山东分局:被当作托派处死的彭子芳同志是老党员,是个好同志;要



幸存的托派郑超麟(1991年秋)

注意假案。中共山东分局也迅即指示各地“要注意假案”。中央电令和山东分局的指示传达后,泰山地委内部主张慎重从事的意见开始上升。(参见亓象岑撰《泰山区“肃托”错案》)但这并没有遏制极左派们的恣意妄为,致使泰山区“肃托”错案继续发酵,连续发生了逮捕上百人的“学山案”和“泰莱边案”。

所谓的“学山案”(亦称西峪案),由一起争风吃醋的情杀案引起。1941年冬,莱芜公安局上游镇特派员、学山村的李友恩因色情纠葛杀害了抗日村长李友芝。李友恩作案后,担心东窗事发,凶案败露,遂勾结与被害人因家产纠纷积怨已久的李忠年(李友芝叔父),恶毒地伪造了一份“托匪材料”,把认为对此案有可能构成威胁的人,均列入了“托派组织名单”,同时还伪造了其他“材料”,用布包好,秘藏于村外路边的田中。1942年1月下旬,在学山村养病的莱芜县公安局侦察股长痊愈回局上班。这时的李友恩刚调入县公安局做侦察工作,闻讯后专程赶回,心怀鬼胎地陪伴侦察股长同行。二人出村不远,李友恩佯装到田里小解,顺手捡起了那个布包,当着侦察股长的面打开,里面除“托派名单”外,还有“托派行动计划”及“与日伪军联络点”等。侦察股长见事体重大,带回公安局后立即上交。莱芜公安局在没有进一步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匆忙报告了泰山区公安局。迅即,区、县公安局组成联合“破案组”,按名单逮捕了雪野区高等小学校长朱勤民、区参议员朱寿卿、小学教员韩子安、区民政助理员毕杰三、区采购员梁效文、油坊经理朱先觉、油坊伙计朱玉琳、小学教员韩子建等近20人。经反复刑讯逼供,他们都“招认”了“托匪”的身份,泰山地委也做出了处死朱勤民等3人的决

定。千钧一发之际,被奉命前来复查泰山区“肃托”案的山东分局社会部审讯科长高明宇果断制止。

所谓“泰莱边案”,发生于1942年1月,一夜之间逮捕100多人。1941年12月,害怕参军参战的香山区店子村后青年农民陈殿文,被香山区公安特派员张九田动员出来在本村做公安工作,许诺只要干出成绩,即可免除参军义务。陈殿文欣然应允,遂就职店子村的公安员,并入了党,成为村党支部委员。为表现积极、免除兵役,陈殿文不断向张九田汇报捏造的“敌情”,蓄意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将本村党支部开展的抗日工作颠倒为“托匪活动”,把民兵的早操诬陷为“托匪准备暴动”,还谎称民兵统一着装的背心是“暴动信号”,等等,张九田不会轻信这些空口无凭的“汇报”,要求陈殿文设法搞到“托匪”文件。于是,陈殿文就煞费苦心地秘密炮制了一册“托匪登记表”,并绘制了香山区地图,用布包好藏于麦田。1942年1月的一天,陈殿文在陪同张九田途经那块包藏祸心的麦田时,以小便为由取回了布包,假说是偶然发现捡到的。泰山区、莱芜县两级公安局对这些弥天大谎竟深信不疑,在未经详察的情况下,就于1942年1月的一个夜晚突击抓人,迅即处死了香山区长郭子彬、农救会长王子周、上港区长魏光涵3人,还杀了村里的数名党员干部。正要大开杀戒时,被火速赶到的高明宇紧急叫停,挽救了幸存者的生命。

三、真相大白

发生在泰山区的几个“肃托大案”,终于引起了中共山东分局的警觉。同时,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肃托”案件也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注,急令各地立即停止“肃托”,纠正错误。

1942年初,中共山东分局社会部审讯科长高明宇奉命专程到泰山区调查“肃托案”。在这之前,高明宇已经发现了泰山区“肃托”的错误倾向。“1942年新年前,山东分局调审翟翕武案,地委社会部审讯科长夏新生同志押送翟翕武等8名同志到山东分局。当时山东分局驻沂南县东西四堡村,社会部驻刘家城子村,社会部长刘居英同志到湖西区去了,由分局社会部审讯科长高

明宇、审讯股长王斌和小韩(已牺牲)等三同志听取夏科长的汇报。此前高明宇同志通过地委社会部上报的书面材料已看出可能是假案。夏科长汇报中谈,侦查到的翟翕武的‘托匪’罪证有九条:一是不爱护根据地,例如睡觉铺草过厚;二是仇视保卫干部;三是吸用从敌占区流入的纸烟;四是搞三角恋爱(指翟跟另一男同志的爱人谈过话)……汇报到这里,高明宇同志不耐烦地说:不要汇报这些问题,这些材料就能说明他们是托匪吗?要汇报与托匪有关的侦查材料。夏便无言可答,汗流满面,没有再汇报下去。”(同上文)高明宇感到问题严重,立即报告了山东分局,引起了领导层的高度重视,责成他代表山东分局社会部,急赴泰山区纠正错案。

高明宇在泰山区听取了几个案情汇报后,当即提出了诸多疑点,特别是通过对“学山案”和“泰莱边案”提供线索的李友恩、陈殿文的笔迹调查,初步认定两案的所谓“托派名单”系李、陈二人伪造。经过传讯李、陈二人,案情很快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对其他“肃托案”也一一作了否定。不久,高明宇擢任鲁中区公安局长一职,遵照山东分局的指示,指导泰山地委在莱芜雪野区小酉坡村召开群众大会,为被捕和被杀人员公开平反。高明宇在会上宣布,所有受害人员一律恢复名誉、恢复工作;罪犯李友恩、李忠年判处死刑,当场处决。不久,泰山地委、专署在泰莱边的焉家庄召开群众大会,对“泰莱边案”公开平反,同时对泰山区在两年内搞的“肃托案”全部平反。会上,专员赵笃生代表地委、专署向群众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当众宣布全区因“肃托案”被错杀的人员,除极少数人待查定性外,其余一律追认为烈士,被捕人员一律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名誉,同时判处陈殿文死刑,立即执行。还宣布撤销直接责任人吕剑光的职务,调离泰山区。在党内,中共山东分局决定给予吕剑光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鲁中区党委和泰山地委严重警告集体处分。同年5月,中共山东分局调整了泰山地委领导班子,由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政委汪洋兼任泰山地委书记,刘莱夫降职副书记。■

(作者为泰安日报社原副总编辑、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新疆霍城“11·27”事件

○ 高 栋

1967年11月27日,新疆霍城县发生了一起血案:在一场事先预谋的大屠杀中,一群手无寸铁的游行示威者纷纷倒在血泊里,其中11名青年学生,1名解放军干部和3名群众死于非命,14名学生和1名解放军战士身负重伤与轻伤。

作为这起惨案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再不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将有愧于众多死难者,我也会终生不宁,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闸门。

背景

1967年,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我们这些单纯幼稚的青年学生只知怀着“关心国家大事”的良好愿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投身其中,却全然不知这场“革命”的内幕和背景,前途和命运。我们只知盲目地崇拜领袖,狂热地呼喊革命口号,被裹挟到难以自拔的激流狂潮之中。

这一年,依据对原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态度的不同,新疆群众组织形成壁垒分明的两大派:主张打倒王恩茂的以“红二司”学生组织为首,被称为“三新”;主张保王恩茂的以“红三司”、“红革联”学生组织为首,被称为“三促”,有军区支持。各地州县也以此形成两大派。当时,霍城县的情况比较特殊:以对待校文革的态度为分水岭,形成“红革会”、“红联会”两大学生组织,但在新疆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又一致,都属于“三新”派。

文化大革命并没有按照毛泽东设计的“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路线图运行,而是出现了全国范围的社会动乱。狂热的人们热衷于打“内战”,个个自封“左派”,将对方组织视为仇敌。尽管“十六条”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形同虚

设:这一年群众组织间的争斗早已由“口水仗”发展为动手动脚,“自卫”武器也由棍棒长矛发展为真枪实弹。1967年9月5日,江青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中提出了“文攻武卫”,自此以后,全国范围的抢枪事件频频发生,两派对立情绪陡然升级。

围绕着寻求所谓“自卫”武器的枪,霍城县发生了一系列抢枪事件。当时,县里“三新”一派人数组虽多,却无军方支持;而“三促”一派力量薄弱,却有军方和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驻县单位——面粉厂的支持。那时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单位几乎一边倒——持保王恩茂观点的占压倒多数,加之他们手中有值班部队,公开以武力相威胁,没有多久,就与县上的“三新”组织形成严重对立,这就是“11·27”惨案发生前两派对峙的态势。

起因

任何一个大的流血事件的发生,事先总会有一根导火索。“11·27”流血惨案的导火索就是11月24日发生在县银行门前的抢车抢枪事件。

这天上午,农四师东风农场银行人员驾车前来霍城县银行提款,有武装人员押车。消息很快地传开了,银行门前聚拢了闻讯赶来的“红革会”学生们。学生的目的很清楚:试图推走汽车,伺机抢枪。这时,押车的武装人员端起五零式冲锋枪进行威吓,被学生当场夺下,并把卡车推出银行,推往学校。学生们并没意识到,他们这一举动正是一场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前奏。

11月25日一早,“四野”(农四师以复转军人为主的群众组织,数量上占压倒多数,并掌握值班部队)武装人员分乘几辆卡车前来“红革会”学生居住的县红卫中学,把学校团团围住。他们开枪打坏了高音喇叭,冲进学校,抓走了东风农场籍的初中

学生华××、张××。当天下午，“红革会”组织了抗议游行活动，要求释放被抓学生。路经县委门前，“红联会”学生也加入游行队伍，并走在最前面。当游行队伍走到农四师面粉厂大门口时，一名“四野”武装人员朝天放枪进行威胁，“红联会”学生冲上前去夺过他的枪，游行队伍有序地走进面粉厂，在厂区游行抗议一圈返回。当晚，“四野”武装人员四处搜捕学生，在县医院又抓到高中学生苗××、高××。

11月27日清晨，“四野”武装人员再次包围红卫中学，抓走了刚刚返校的东风农场籍初中学生彭××、周××和王××（为躲避“四野”抓人，学生不敢在学校过夜，常常是夜出晨归）。连日来，“四野”组织接二连三抓走“红革会”学生，“三新”一派群情激愤，对立情绪迅速白热化。

屠 杀

11月27日，异常的冷，空中飘着点点雪花。当大部分学生返校后，“红革会”立即组织了大规模游行抗议要学生活动。学生们抬着毛主席像，个个手持《毛主席语录》走上大街。游行队伍先来到县武装部，“红革会”一号勤务员王闯同学向驻军7974部队派到县里支左的张广印排长反映了情况，并要求他们参与游行。随后，张排长和战士高思德抬着毛主席像加入游行队伍。游行队伍途经县委，“红联会”学生以及其他“三新”派的群众组织也纷纷加入，形成一支四五百人的队伍。在县城十字路口，王闯还站在凳子上向围观群众做了宣传。

当游行队伍来到农四师面粉厂时，和25号的情况相反，大门敞开着，队伍自然地停了下来。这时，围绕进与不进面粉厂游行，产生意见分歧。此前，已经有人出来通风报信，说农四师“四野”总部已从附近团场调集值班部队到面粉厂，游行队伍若进去恐怕要吃亏，一部分人持反对态度。但另一种意见认为，我们是赤手空拳的和平游行，又有解放军参加，他们不敢开枪。这种意见最后占了上风，队伍开始鱼贯进入面粉厂。

四周出奇的静，这一异常现象并没有引起学生们的注意。当队伍的前身刚刚走过距离大门

五六十米远的一座小桥，突然间枪声大作：架在面粉大楼上的机关枪疯狂地叫了起来，子弹飞蝗般射向正处于厂区马路上的人群。马路两侧的办公室、暗堡内也射出一颗颗子弹，走在前面的“红革会”学生纷纷中弹倒地。我当时就在这群人中，倒地时已身中两枪：一枪是面粉楼的机枪子弹紧贴着头皮而过，将帽子打飞，顿时鲜血淋漓。事后才知，这颗子弹若再往下几毫米，天灵盖就会被打飞。另一枪是爆炸的弹片从左臂麻筋处穿入，打坏了尺神经。

这时，趴地上的解放军排长张广印猛地站起，振臂高呼：“不要开枪了！他们都是学生！”话音未绝，“砰”的一枪，他被子弹击中。部分学生刚刚从地上爬起，密集的枪声又响了起来，一阵劈头盖脑的子弹又把他们压在地上。经过两次打击，学生死伤已达数十人，一时血流成河，哀叫声不绝于耳。在新疆11月底的寒冷中，卧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的受伤学生多么需要及时救治，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他们得不到任何救援。后来才知，就在枪声停止后，县医院的救护车曾急如星火赶来救援，却被面粉大楼上无情的机枪子弹挡在大门外。

大约在地上趴了不到一个小时，负伤的左臂又酸又沉，我刚想稍稍挪动一下，突然，左臂就像着了一重磅榔头似的，我疼得大叫一声，回头看时，左臂炸开了碗口大的血窟窿，里面红的、白的都翻了出来。我只看了一眼，便不敢再看。事后我才知道，残忍的面粉厂“四野”武装人员竟然使用了国际禁用的达姆弹（俗称炸子），这种炸子见血就会爆炸，其出口比一般子弹出口要大好几倍。一位同学是脑后中弹，整个天灵盖都被揭开，死得非常惨，使用的就是达姆弹。所幸这颗子弹是从我小臂的两根骨头中间穿过，否则，整个左臂将会不保。

我们在冰冷的地上趴了一个多小时后，耳畔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随即听到一声声严厉的嚎叫：“不许动，不许抬头！谁抬头打死谁！”我们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谁也不敢抬头。大约十来分钟后，四周归于平静。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才被准许从地上爬起。我是扶着受重伤的左臂自己走进路边的办公室的，其他腿部、腹部负伤，无法行动的同学都是被没有受伤的同学抬进来的。

我曾注意地看了看,没有发现王闯同学的遗体。

在面粉厂办公室里,我目睹了两位同学的惨景:一位是能写一手漂亮文章的高中67级学生冯建丰,一位是年仅16岁的初中68级学生王志新。他们两人都伤在腹部,肠子已经流出,用一只瓷碗扣着。这种情况若及时送医院救治断不会致命的。我们苦苦哀求尽快抢救他俩,但对方毫不理睬,任他俩在地下抽搐、挣扎,冯建丰同学就是这样死的。而王志新同学在我们被押走之前还没断气,据说我们走后不久也死了。

在“11·27”惨案中,有15人致死,他们是:解放军排长张广印和王闯(高66级)、冯建丰(高67级)、毛肃民(高67级)、尹炼钢(高68级)、杨生梅(初66级)、李金秀(初67级)、芦忠云(初68级)、王志新(初68级)、吴家新(初68级)刘凤芝(初68级)、李连海(初68级),县银行干部董少林、回族少年赛文军以及维吾尔族儿童阿不来提在大门外被流弹击中身亡。有15人受伤,其中“红革会”学生14名,解放军战士1名。伤者最重的当数初中68级回族女学生马××。她因不幸感染气性坏疽细菌而双腿被截肢,导致终身残废。

当晚7时左右,在苍茫的暮色中,身负重伤的八名学生被扔上一辆敞篷卡车,由武装人员押送伊犁农四师医院,而这时距离受伤已过去八九个小时。一路上,失血过多的马××、吕××同学曾多次昏迷……

阴 谋

“11·27”流血惨案发生之后,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纷至沓来,什么“红革会学生武装冲击面粉厂”、“面粉厂四野开枪是自卫还击”等等。街面上充斥着对方组织大量翻印的小报,上面赫然登着一个个死者身边摆放有枪支弹药的图片以及作为证人证言的所谓“高思德录音”。

如果事实果真如他们所说,是“武斗”,是“冲击”,那么请问,怎么会一方死伤多人而另一方毫发未损!

“11·27”惨案的制造者比谁都清楚:进入面粉厂的学生个个赤手空拳,有的只是一本《毛主席语录》,他们游行只不过是为了抗议和要学生。但造成死伤几十人的流血惨案是要承担责任的,而这个责任只有推给学生,对上对下才好交代。于是,“假现场”的一组图片便出笼了;光有“物证”不行,还得有“人证”,于是,所谓的“高思德录音”也出笼了。倒是那个穿了一身解放军军装,操关中口音的高思德(后从部队复员到西安体院),为了治伤,编造谎言,不惜把屎盆子扣在无辜的青年学生头上。

结 局

“11·27”惨案发生将近半个世纪了。据了

王缵绪创办巴蜀学校

○ 王复加

重庆巴蜀学校创办于1933年,创建人乃是抗战时期的四川省主席、抗日英雄王缵绪,他购买了富豪私产——嘉陵江畔的张家花园,又筹资从上海购置了大量教学用具,实施他的办学计划。

王缵绪创办巴蜀学校,以实现他改变西南落后教育面貌,“创造新的教学制度,实行新的教育理想”。经黄炎培介绍聘用教育家周勐成担任校长,以及孙伯才、康心如、卫楚材、卢作孚、何鲁等教育专家及社会名流主持教务,王缵绪任董事长。共同制定“公正诚朴”的校训,在重启发和实践的教育理念下,采用“手脑并用,身心互通”的方针,以“儿童本位”教育原则及“教养兼施”的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能力。几年后学校由幼稚园和小学扩展办起了初中和高中,当时在全省乃至全国就已被公认为著名的学校。

解,文革期间,新疆死于武斗的群众为数不少,但像“11·27”事件这样,对赤手空拳的游行群众开枪镇压导致大量死伤的现象却极为罕见。由于当时新疆一边倒的支“左”局面和派性作怪,这场流血事件一直得不到公正处理。1971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面粉厂内部揭发出事件的部分真相,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农四师政法科拘留了以陈景泰为首的三个杀人凶手。但后来新疆批判龙书金的“扩大化”错误,有人说这也是龙书金搞的“扩大化”,陈景泰等三人被放了出来。直到粉碎“四人帮”,上世纪70年代末“揭批查打”和查“三种人”的斗争开展后,“11·27”流血事件的指挥者——农四师面粉厂陈景泰和一帮有人命的嫌犯才又被依法拘留,而且逐步揭发出冰山一角——幕后操纵的农四师和军区的一些“大人物”,“11·27”惨案的真相有望重见天日。谁知好景不长,由于掌权者更换,形势急转直下,关在监狱里的“11·27”嫌犯受其保护全都被“一风吹”,

1936年,巴蜀学生的生活照片和学业成绩代表中国参加英国伦敦国际教育博览会,获得嘉奖。著名教育家、作家叶圣陶曾任学校国文教员,为巴蜀学校作词,普写了经典的校歌,仿佛还在巴蜀校园依然荡漾。

1937年4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肯定王缵绪创办巴蜀学校成功之举,特为学校题赠了“成绩斐然”四个金色大字匾额,赞扬巴蜀学校办学的成绩。

“七七事变”爆发后,学校礼堂曾挂起了大幅中国地图,书写着“国破山河在”,让全校师生警醒。

1939年5月,重庆遭到日本飞机的大轰炸,社会局命令市区所有学校于6月底以前迁出市区。重庆巴蜀校园连续三次被日机轰炸,毁坏了礼堂、教室、宿舍以及校园,曾有六名校警被炸

释放出狱,而“11·27”血案则冤沉海底。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死难学生王闯的父亲王开云(时为霍城县城镇公社党委副书记,一位解放新疆的老兵)一直在不断向上反映,要求上级领导秉公处理“11·27”流血事件,为死难学生讨还公道,但不知何故却得不到任何回应,如今他已是83岁的老人,在世时日不多了。

平心而论,发生在文革中的任何一个流血事件都不是孤立的,都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11·27”事件的起因,作为红革会一派的学生,固然要为抢车抢枪负责任,但他们罪不至死,凡有良知的,都不能以此为借口对学生痛下杀手,更不能栽赃陷害,嫁祸于人。作为这场动乱的当事者和见证人,在事过近半个世纪之后,无论哪一派,都理应消除派性,站在历史的高度,公正的立场,实事求是地反思过去。■

(作者为新疆伊犁电视台原副总编、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死。但是,巴蜀学校从没有停止抗日救国活动;对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教育;组织军事训练;早操跑步时高唱《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学校将各班级全部以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省区命名,提示不忘收复失地之志;第一班为辽宁级、第二班为吉林级、第三班为黑龙江级等;对毕业生,校董事长王缵绪题赠“毋忘国耻”铭刻在巴蜀学校毕业纪念品(墨盒)上,发挥了深刻的教育意义。

抗战期间,巴蜀校园曾是陪都重要的文化宣传教育中心,王缵绪在校内接纳和安置

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还有黄炎培先生主办的“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那段时期,周恩来曾到巴蜀学校作了《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专题演讲,吸引了众多听众;黄炎培先生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巴蜀校园组织了数十场演讲;众多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宗白华、马寅初、章乃器、老舍、郭沫若、邵力子、邹韬奋、沈钧儒、陈立夫、罗隆基、潘公展、齐燕铭、田汉、翁文灏、潘序伦、胡风等都曾先后在巴蜀学校作过演讲。

当时王缵绪(上将)任四川省主席兼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他明确指示“为保师生安全,避免无谓牺牲,迁校应当从速进行。”经他决定将重庆巴蜀学校迁往四川省西充县——王缵绪家乡。

据统计:学校转移物资有500多套校具(桌、椅、床)、2万余册图书、2000多件教学用具(钢琴、显微器、动植物标本、实验仪器)等,满满装了16艘大木船,从重庆嘉陵江运达南充,耗费巨资动员了上千余人,靠人力一件一件搬运到西充。

1939年9月,巴蜀学校(西充)完成了搬迁和重建,校址定在西充东门外大佛寺原西充县立中学所在地,9月正式开课。

西充土地贫瘠,资源短缺,巴蜀学校在此创建不仅给西充教育带来了良好的教学设备,而且带来了当时中国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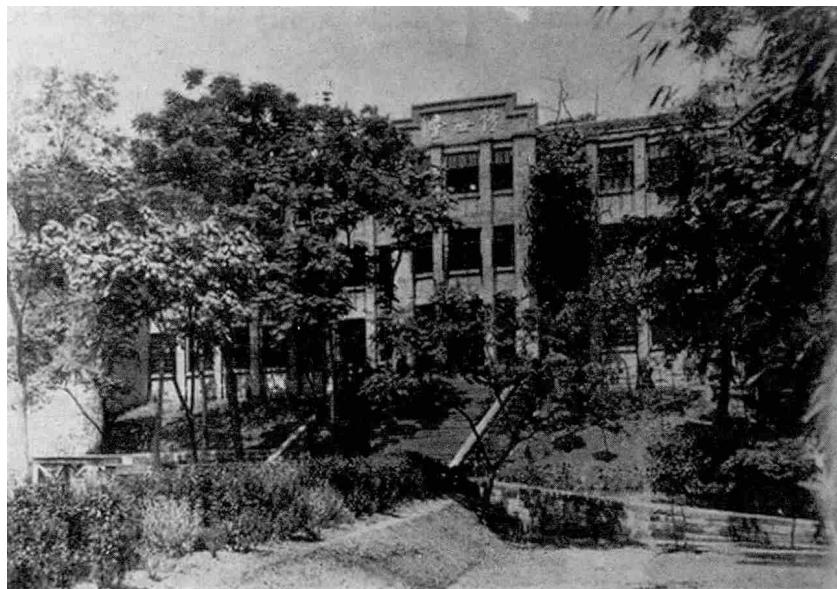
王缵绪(1886—1960)

使西充的教育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1942年,抗日战争局势变化。校长周勛成与正在抗日前线指挥作战的校董事长王缵绪通电商定,将巴蜀学校迁回重庆张家花园,西充巴蜀学校作为分校继续开办。于是周勛成辞去西充学校校长职务携部分教师返回重庆。王缵绪将全部教学设备留在西充,继续促进西充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他电令侄女王君素(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接任西充巴蜀学校校长职务。自王君素任职期间,王缵绪不遗余力地支持她继续筹资扩建学校,

将学校设有助学基金,资助孤贫学生。同时为学校充实了图书、仪器和其他设施;并且又聘请了众多的著名教师,集众多智慧共同谋划出严格的管理制度,确立了严格的招生制度和升降级制度。学校十分重视体育锻炼和课外活动,设有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经常组织各类竞赛,扩大知识境界;组织成立学生“自治会”,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树立劳动观念和卫生习惯;还建立了“校友会”,交流学习经验,促进互励共进学习模式;学校特别提倡爱国教育,教唱抗日救亡爱国歌曲;并结合物理课学习的知识成立了无线电小组,由楚衡老师指导学生组装了一部矿石收音机,每天师生轮流值班,把夜里12点以后收听电台的消息,由师生记录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在校内校外的墙上,使全校师生和当地民众能够及时了解到抗日前线的战况;并且将班级和重庆巴蜀学校统一,以当时沦陷的国土省区命名,有绥远班级、宁夏班级、热河班级、哈尔滨班级等,以激励学生发奋读书,报效祖国。经过几年的努力,王缵绪将此校申报并通过了四川省教育厅批准,增办了高中。到1945年,巴蜀学校西充分校已发展成了(小、中、高)完整的教学体系(即:四川省西充中学)。

自1942年,周勛成校长及教师员工由西充返回重庆之后,很快在张家花园恢复了巴蜀学校正



王缵绪为教学大楼——诱诲堂题词(1932年底建成)

常开课。在此期间,巴蜀校园仍保留了抗日救亡活动中心的地位,各界知名人士曾到校演讲。演讲者大胆的言论使当局不满,学校承受了很大压力,但他经常以果敢态度与当局抗衡,而国民党当局就因学校董事长是王缵绪的特殊背景而不敢干预,确保了巴蜀学校正常的开展与各项抗战宣传活动。

1949年底,重庆巴蜀学校经校方共同努力已发展成为集幼、小、中、高的完整教育体系,在当时已进入领先的地位。新中国建立后,王缵绪将重庆巴蜀学校和西充分校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邓小平指示:“只许办好,不许办坏”。

1950年由西南军政委员会接办由王缵绪创办的重庆巴蜀学校幼稚园;改为西南干部子弟学校(分中小幼三个部),由刘西林任校长。1954年幼儿园更名为重庆市巴蜀幼儿园;幼儿园建筑面积6000余平方米;是寄宿制和全日制并存的省级示范园、市一级园。

今天,巴蜀小学、中学和高中依然在重庆渝中区张家花园,位居美丽的嘉陵江南畔。巴蜀小学已成为教育部的基础教育定点联系校和重庆市首批示范小学。巴蜀中学已是重庆市教委直属重点中学,是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全国德育先进学校、国家考试基地、重庆市教育科研实验基地;全校现有200个教学班,招收学生万名以上,是全国中学办学规模最大的中学之

一。据市教委统计,巴蜀中学升入专科、本科、重点各段上线率均居全市第一,每年都有20多名学生考入北大清华,包揽重庆市文理科双状元。巴蜀学校从建立至今培养出众多人才,有的已成为享誉中外的知名人士,遍布在海内外。

2003年,重庆巴蜀学校举办六十周年校庆,邀请原创建人兼董事长的孙辈和首任校长周勛成的女儿参加庆典。在庆典大会上傅唯泉校长对王缵绪先生的兴学义举给予了充分肯定。巴蜀中学还制作了邮资明信片一套(王缵绪

肖像)交邮局发行。西充中学也邀请了创始人王缵绪的后代到校参观,举行了欢迎会。校长冯福志在欢迎会上致辞说:“现在,私立巴蜀中学的名字已成了历史,然而巴蜀中学的办学传统和精神却融入了西充中学,成为西充中学续写辉煌的重要力量。”

2012年12月15日,重庆巴蜀中学在四川西充县王缵绪故居举行隆重的“巴蜀中学祭祖暨八十周年校庆启动仪式”。叶圣陶先生撰写的“巴蜀学校校歌”的旋律环绕故居山林。

重庆巴蜀中学校长王国华“祭王缵绪先生文”,其中写道:

“昨日之巴蜀,镌刻先生之伟绩;今日之巴蜀,书写杏坛之丰功。公正诚朴,秉承先贤之教诲;以人为本,开创后学之坦途。手脑并用,彰显生活教育之理念;挖掘潜能,紧贴素质教育之精神;三本理念,把握现代教育之灵性;制度立校,切中学校管理之脉根。以善为根,养善于心;以雅为骨,修雅于情;以志为魂,志立于行。引领教师终身学习,树立教育事业雄心;以全球化之眼光,育善雅志之英才。

历史变迁,巴蜀无愧先贤厚望,成为中华基础教育之领航者;时代发展,巴蜀定当仰望星空,成为明日教育之逐梦人。巴蜀八十华诞在即,教育事业再登征程!”■

(作者为王缵绪长孙)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一个时代的扫描与国民性实录

——《路漫漫》读后杂感

○ 郭道晖

一、“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

白祖诚学长的巨著《路漫漫》，由“火”到“泪”而“思”，共三大卷，四百多万字，历时约十五载，铸成这三部曲巨著，写尽了他从儿提到耄耋的漫漫人生。其间浮沉跌宕，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可泣可歌。读其书如见其人，如历其境。

我和他是同时代人，又近乎同龄人（他比我长一岁）。我们的经历也大体上类似：解放前我们同在清华大学参加地下党干革命（他属于北方局系统的党组织，我属于南方局系统）。解放初他在北京市委，我在清华党委工作，同有“年轻人火热的心”，对新社会寄以无限美妙的愿景。可是新中国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晴空万里，而是时有黑云压城。没几年我们就先后被打成“右派”，亲尝了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苦果。但我们并未沉沦，而是在追求真理的路途中继续“上下求索”。正如我们在学生运动中常唱的：“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

欣逢改革开放，我们都幸蒙“改正”，得以从“牛鬼蛇神”的行列中脱颖而出，开始新的人生奋斗历程。老白欣然填词一首：

“金剑早沉埋，破土重出鞘，问问锋芒未损伤，直指群妖啸！”

他书中记述的人和事，反映了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共同的遭遇和命运，从中我们不难体味到许多足以引起共鸣的人世沧桑。读之或令人击节赞叹，或使人扼腕痛惜，或肃然起敬，或有所反思。我作为作者的同龄人、校友、战友以及“难友”，与一般读者不同，更“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

二、一部山寨体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痛史

重要的还在于，我们一生中不仅跨过了新旧两个社会，跨越了新旧两个世纪，而且经历了改革前后两个时期，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波澜壮阔、又最折腾吊诡的岁月。作者给本书取名“路漫漫”，不只是形容其“修远”，而在于其“路弯弯”，“路艰险”。作者先后担任过北京市纪委中上层干部和市级旅游公司与旅游学会等单位的负责人，还参与过审查四人帮罪犯等工作。作为亲身经历的知情人，对在朝和在野的形形色色人物在各种政治运动以及日常工作中的种种表现，有过近距离的体察，并能秉笔直书，因而这本书不只是个人的传记，而是扫描了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与干部群体，堪称一部山寨体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痛史，及建国以来有关执政党的史话。而其真实性和理性思考，则是当朝人所写的“正史”所不及的。

祖诚在本书中谈到他写本书的旨趣是“给祖国历史文献的长河中献上一滴清水”，诚哉斯言！从一滴水中可见太阳。而他这一滴水是“清水”，可以照见一个时代及其众生相。

鲁迅说，稗官野史比官方的史书往往更真实，官书“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是看野史和杂记，可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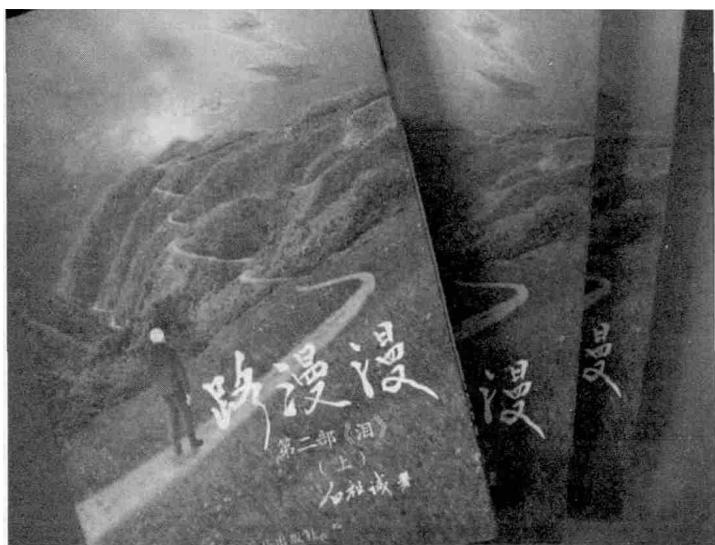
这些年来，这类非官方的山寨体传记文学如雨后春笋，不少冒尖作品深受读者欢迎。如韦君宜的《思痛录》，巴金的《随想录》，季羨林的《牛棚杂忆》，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法学家江平的

《浮沉与枯荣：八十自述》……等等，都脍炙人口。它们的一个共同特色是揭示真相，臧否人物，有微言大义，有理性反思。我认为，白祖诚这部巨著，也属此列。

正如刘少奇说的：“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这句话，不仅说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每天以自己的行动“写”出可歌可泣的历史；而且在当今互联网盛行的信息社会，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天天在微博上发新闻，评政局，揭丑闻，反腐败。他们是“公民记者”、“草野史家”。

我国古代封建朝廷设置了专门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官职，其任务是有关皇帝的事无巨细、善行劣迹都记录在案，以备后人修史，而当朝皇帝不得过问，以约束君主的言行。历代皇帝们都害怕自己的丑闻恶行被记录下来。唐太宗就曾想查阅，却被起居郎褚遂良严词拒绝，说：“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检戒，庶乎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当今的互联网、微博也可以说是当代党政官员的“起居注”，但不只是朝廷里仅有的一个“起居郎”在记录，而是更大规模地被置于人民大众的监视和互联网记录之下，昭告天下，以致迫使领导人不得不“微博问政”。

古代中国从皇帝到士大夫大都看重“身后名”，敬畏史书。刘少奇说出“大饥荒”真相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且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这大犯领袖所忌，终于决定要打倒睡在身边的这个



白祖诚著名《路漫漫》第二部封面

“赫鲁晓夫”。

大人物如此，身边小人物何尝不然。本文上面所列几本民间“史书”，包括本书，也都涉及一些不大不小的党政干部和知识界名人，其善行或劣迹也被一一记录在传，且逃过了官方筛选、过滤、屏蔽。也许这正是这类私人传记胜于正史的一个特点。

鲁迅最赞赏《儒林外史》，指出它的出发点是“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认为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以“公心讽世”者，无出其右。我想，本文上列的一些传记、包括祖诚此书也可以说是当代“儒林新传”。不过这类传记不是具有艺术真实的虚构小说，而是具有历史真实的报告文学。它们所揭示的真相，基于各人的经历和视角的不同，是“多相”的，因而更丰富生动。它们给党内外历次运动中“以扬鞭为唯一业绩”的人，留下了黑脚印；给凌驾于人民之上坐天下“一人说了算”的人，以反省鉴戒；给被愚弄成“驯服工具”的人，引起应有的警醒；也通过记录某些正直的好心人在万难中保持赤子之心和济困扶危的德政，昭示出“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我觉得这类从一个人看世界，记录大小人物和世事的传记，是值得广为提倡，给以高度评价的。也需要史学界加以关注和研讨，使这类民间史书能精益求精，传之久远，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

三、当代国民性的实录

祖诚在本书谈到，在粉碎了四人帮，他的错划“右派”历史问题也得到“改正”，重新回到北京市委时，感到心情舒畅，前途无量，希冀“重建那个美好的党园、国园和家园”，他欣然赋诗，欢呼“共步桃源深处”。

不想，世事变迁，人心不古。他遇到的仍然不乏勾心斗角，权力碰撞，沉渣泛起，尔虞我诈的局面。他开始自省其“桃源情结”，憬悟到“世上从无也永无桃源”！

就拿他着重扫描的前市旅游局长而言，这位只有初中学历的“红二代”，年纪轻轻，却神通广大，无学有术，精于权谋。他对内强横霸道，对外深谙“社会主义关系学”，公开扬言：“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玩人’，要学会玩人，把人玩好了，就立于不败之地。”还

自鸣得意宣扬他的“猫上树”的留一手狡计,以及要会玩“马列以外的东西”,等等。果然,他据此处世哲学,也确把这个新建的旅游局颇为豪气地运转起来。这类人之所以能“玩”得转,多少反映了当代的官场世情,是与长期未改的政治与社会体制相依互动的,其“玩主”的秉性与权术也多少是这种体制陶冶成的。

书中还记述了反右时借运动搞打击报复的人阴暗的“聪明”;上世纪80年初的中组部一位领导人的官霸作风;以及建国饭店的前女副经理的世故等等众生相。

当然,洪洞县里也有好人。书中记载了不少好人的往事,如感念原北京市委有的老领导和老同事在他身处逆境时以及后来进行申诉时,能援之以手。一些没有泯灭良知和人性的党员干部以及老同事老邻居,不怕担风险,或冒死“包庇”无辜受害者,或在可能条件下宽容、善待一些受难者,其事迹和心性令人感动。

的确,在风云变幻无常,在人为的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漩涡里,人性的善恶也不由自主地被甩出来示众。祖诚表示要在这本书中“粗探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性奥秘”,在本书第三集专有一章,其题目就是“识政治、官场中的努力和体验”。应当说他在本著中大体上做到了这一点。他的体验可以给读者不少启迪。

我想,由于本书写作的历史背景和场境,除了彰显了人性的共性外,还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因而更多的是“国民性”。对此鲁迅早有入木三分的评断:诸如当权者喜欢“窝里斗”,“对内特别凶”,“除恶务尽”,动辄株连祖孙八代;奴才们则常号称是“奉旨申斥”,但“暴君下的臣民往往比暴君更暴”;而奴隶们则只要“做稳了奴隶”就心安理得……这些国民性在新中国也仍然或多或少承袭下来,有时更有过之。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人性的丑恶面暴露得淋漓尽致。迄今在我国政治生活、党内斗争和社会生活中不断上演的悲剧、恶剧、闹剧、荒诞剧,或诡异离奇,或悲情万种,或恶行连台,往往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令人叹为观止。这恐怕也是某些迄今未改的国民性和中国特色体制养成的。当然,我国几十年来对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病态传统,也有一部分是感染了斯大林的恶政所致。

四、中国梦

祖诚在第三集前言中说,希望在他九十岁的前后的某年某一天,是中国终于实现了真正的宪政民主,成为富强的、人民幸福的国家的梦想的一天。

历史在不断前进,中国人的寿命也在增长,但愿我们能见到这一天。不过,要彻底实现这个梦想,“路漫漫其修远”,还得几代人的努力。也需要随着政治改革的推进,国民性也能有所改进,则中国幸甚,人民幸甚! ■

(作者为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博士生导师组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编读窗

我是《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这次看到2014年第1期的《“毛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一文,觉得作者写得很棒!看文风,我原以为是西方记者所写,客观、理智、公正,结果是我们自己的记者所写,佩服!不过有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是第61页出现的“根红苗正”这个词,我过去也常常这么写,甚至在自己出版的一本书《我的同龄人》中也这么写。之后我收到读者来信,说“根红苗正”应该是“根正苗红”,后来我阅读其他网文,及电视剧的台词,还是使用“根正苗红”一词为多,但只供您参考!此外,毛时代的工人阶级并不像现在年轻人所想象的那样自豪,也不是愚不可及。我年轻时在国营大工厂工作了10余年,基层的工人一连十几年都没涨过工资,无论在搞什么运动中都爱自我嘲讽:“说俺们是领导阶级,其实俺们就是秃尾巴驴,除了干活,啥事也没有你的!”此外工人的劳动热情远不是现在所想象的那样热情高涨!一旦遇到设备检修,工人们没活干了,就比过年还高兴,彼此相互祝贺:“享受了!享受了!”此外,那时的干群关系,也不及想象的“公平正义”,工人最爱发的牢骚是:“共产党的干部喝酒连酒瓶子都不扔!”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干部的酒是白来的,(指部下求其办事送的)喝完酒后,每个酒瓶子还能卖8分钱!(那时都穷)。所以倒退绝不会有出路!

裴国成

孙大光处理中国油气发现史纷争

○ 奚 青

一、电影《李四光》拍摄波折

文革前,孙大光任交通部部长。1975年复出,任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地质部部长。孙大光向以刚正不阿闻名。1979年2月5日,他向中央提出为刘少奇平反;1988年7月20日,他写信给中顾委,直陈党风严重不正,提出总书记要管党,领导人应管好子女。

孙大光主持地质工作期间,遇到一个反映强烈的问题,即石油地质工作者发现大庆油田的重大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地质系统和石油系统的科技人员对大庆油田发现并无分歧,但领导层有不同说法。余秋里担任石油部部长之初,曾登门向地质学家李四光请教;时过境迁,他态度变了,说:“什么李四光,什么地质力学,找到油田就是学。”石油部搞川中会战时,总地质师李德生反对资料没收集齐就蛮干,余秋里说:“等你资料收齐了,人家钢铁大王都已经把英国美国都赶超了,我们还干个鸟!你这叫动摇军心!”结果,这次会战以失败而告终。(据景才瑞:《大庆油田等发现真的与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无关吗?》)

原石油部情报所副所长毛华鹤著文指出:“‘大庆经验’说一千道一万,说到底就两条:一条是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的艰苦奋斗,这一条在‘大庆经验’中已有充分表述。另一条或许更为重要,那就是中国几代地质工作者的科学探索。若按行政单位区分,这当中有地质部、石油部、中国科学院、煤炭部以及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还有很久以前的日本、美国的一些同行们。尤其是1955—1959年地质部的专家们,在松辽盆地的艰苦细致工作。而这一条在‘大庆经验’中表达的很不够。”“1966年初,在北京举办的‘大庆展览’(我参加筹备,是主编之一),红极一

时。在几百米长的展板中,只在序言部分有一幅地质部的照片,说明‘发现大庆油田,地质部也做了许多前期工作’。在上百本参观者的‘留言簿’里,有知情者批评这个展览少提地质部实在不公道。”“这件事康世恩应负主要责任。因为这个展览的提纲是他反复斟酌审查过的。”“从主观上讲,余秋里、康世恩确有头脑过热的问题。人们常说,所谓权力,既包括行政权力,也包括‘话语权’,即掌握舆论与宣传的‘权力’。自觉而有节制地使用‘话语权’,不仅需要意志力,更是一种美德。”

上述情况,地质部领导人李四光与何长工多有感知,但都采取了避让态度。李四光曾要求下属:以后,不要谈地质部还是石油部发现大庆油田的问题。1978年,北影筹拍电影故事片《李四光》,剧本送审时,余秋里和康世恩副总理把肯定地质部发现大庆油田的核心内容给圈掉了。这就没法拍摄了,北影准备下马。孙大光要求地质部政策研究室写一份发现大庆油田的详细材料,他亲自找到北影领导,拍板恢复原剧本,一切由他负责。他还同主演孙道临等见面。导演凌子风感慨:“孙部长不坚持,这个片子就拍不成了。”

二、黄汲清上书邓小平

1978年1月4日,原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黄汲清上书邓小平,提出:“我国东部几个大油田普查工作是1955年初在当时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的直接主持下开始进行的,当时我作为‘普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提出了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即陕甘宁盆地)、四川盆地作为‘普委会’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普委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很快进行了部署,开展了工作。我的建议是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这一理论

是我国地质学家潘钟祥和我在四十年代初期分别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和我的大地构造观点并结合我国多年来的地质工作实践而提出的……我查阅了1955年至1960年期间所有有关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工作报告和资料,确知它们都采用了我的地质构造理论和学派术语,而并无地质力学的理论和术语。”“‘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有讹传,说什么我国东部油田是根据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而发现的。”“我国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和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无关,这是事实。”“殷切地希望党中央派人对我反映的上述问题进行全面的和客观的调查,做出公正的结论。”

邓小平一周后批示:“如有可能,最好把问题了解和澄清一下。”孙大光选调6名资深地质专业人员,进行几个月深入调查,全面梳理了自1920年代以来李四光和黄汲清关于石油地质的著述、理论、工作实践以及各自的作用,写出一份《关于黄汲清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所反映问题的调查报告》,于1978年5月27日上呈中央。其结论是:“李四光对我国东部油田的发现确有很大贡献,并非如黄汲清同志所称‘讹传’和‘谎言’。”“绝不能说,‘我国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和发现与地质力学无关。’”调查报告肯定黄汲清在参与石油普查具体组织、领导工作中“较有影响,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对其堆功自许不予认可。调查报告关于李四光这样阐述:

建国初期,李四光同志分析了石油形成的基本地质条件,深信我国具有丰富的天然油气资源。他多次提出对中国石油地质的见解,供毛主席、党中央参考。1953年,他充满信心地回答了毛主席对于我国石油工业究竟靠开发天然石油还是走人造石油道路的垂询。1955年,国务院决定地质部承担石油普查任务。1956年3月,周总理说:“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石油)地下贮藏量很大,很有希望,我们很拥护他的意见,现在需要去工作。”

李四光同志……亲自指导了石油普查的战略选区和部署。1954年3月,他在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的座谈会上所做《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的报告中指出:新华夏系构造带的主要凹陷带,对储存石油具有比较好的条件,并首次明确提出“在东北平原、通过渤海湾、华北平原,往两湖地区,可做(石油普查)工作”的意

见。……经过三年(1955—1957)的侦察,取得了大量的资料,证实了松辽、华北等盆地有很好的含油远景。

1958年2月,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共同发出了“三年攻下松辽”的战斗号召……4月17日,首次在吉林省前郭旗钻得油砂,接着在其他地区的三十多口井中发现油气显示。当年秋季,用物探方法发现了大同镇长垣(出油后改为大庆长垣),11月,向石油工业部提交了该长垣的高台子地震构造图,并提出深钻井位的建议。1959年……9月24日,石油工业部在高台子构造松基3井首次获得自喷工业油流。紧接着,9月26日,地质部普查队伍在扶余构造上扶27井也获得工业油流。从此,迎来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松辽石油大会战。

大庆等油田发现后,李四光同志更加强调构造体系控油和新华夏构造体系控制我国东部的几个大油区。……通过这种在理论指导下的有目的的实践,石油普查队伍沿着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接连取得重大成果,华北、下辽河、江汉、陕甘宁等地区相继被突破了,发现了一系列油田,肯定了在我国具有重大价值的几个大油区。

这份调查报告客观、公正。但黄汲清不服,同年11月14日,他在中国科协大会上再次声称:“大庆、大港、胜利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完全无关!”。1981年,黄汲清又对钱三强说:“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毫无关系。”

黄汲清言之凿凿,在科技界引起巨大震动。1982年10月,“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奖者为地矿部的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韩景行、朱大绶、吕华、王懋基、朱夏、关士聪;石油部的张文昭、杨继良、钟其汉、翁文波、余伯良、邱中键、田在艺、胡朝元、赵声振、李德生;中科院的张文佑、侯德封、顾功叙、顾知微。这一隆重表彰,使黄汲清颜面生辉,上述纷争暂时搁置。

三、大庆油田发现概要

笔者1960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石油物探专业,1959年8—10月曾参加大庆南缘的地震勘探。

大庆油田是地质部和石油部联手勘查发现的。石油部松辽勘探局主任地质师张文昭说明:

“地质部是以盆地普查为主,主要负责物探和地质浅钻;石油部是以勘探为主,并负责基准井钻探;中国科学院配合盆地普查勘探,开展地层、构造等方面的研究。”“地质部搞普查和部分详查,准备构造的工作;石油部做部分详查、细测以及钻探工作;中国科学院承担综合科学理论研究工作。”

1955年,李四光选定华北平原为重点石油普查地区,接受苏联专家建议,在华北和松辽平原开展大

面积物探。地质部长春物探大队主任工程师朱大绶回顾:“1955年在下辽河地区工作的物探队伍使用了重力、磁力和电测方法进行区域性调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取得了有关沉积厚度和构造轮廓的资料……从地面物探和航空物探的初步成果中可看出凹陷范围很大,主体在北部。因此决定物探工作向北推进,明确以找油为主的任务。这在松辽平原勘探进程中又是关键性的一步,对于加速松辽石油普查工作和远景评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地质部物探局局长何善远回忆:“到1957年年底地质部已经完成全松辽平原1:100万的重力测量、近40万平方千米的航空磁测,以及横贯平原的5条电测深区域大剖面。了解了盆地的基底起伏和沉积厚度,第一次用物探资料圈出了区域构造轮廓。肯定沉积厚度达4—6km的中央凹陷带是一个十分有希望的含油远景区。”“到1958年底,物探(包括地震和电法)共圈出45个有意义的异常、隆起或构造……长春物探大队提供的最新物探成果,确定将第三口参数井,即松基3井的井位,布置在高台子的构造上。1959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前夕,从这口井的深部喷出了大家热切盼望的黑色原油……”

李四光认为:“找油区是找油的战略问题,找油田是找油的战术问题。”找石油有七个步骤:1.指出油区;2.选定油区;3.开展地球物理勘探工作;4.进行地质钻探;5.探测油田;6.圈定油田;7.评价油田。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用在战略指导和部署上,即选择位于新华夏系沉降带中的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为油区。继之开展大面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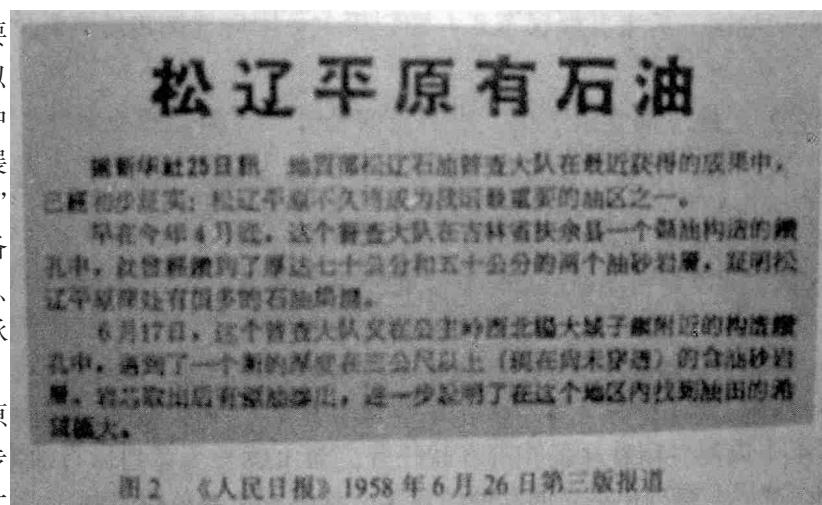


图2 《人民日报》1958年6月26日第三版报道

物探,探明了凹陷轮廓和储油构造。据此选定了最佳钻井井位,1958年地质部在前郭旗、扶余,1959年石油部在高台子先后打出石油。接着,石油部从西北调来大批钻井队,进行了数年的“大庆会战”。可以说,大庆油田是地质部与石油部共同发现的,以地质部为主;而全面探测、圈定、评价大庆油田,是石油部完成的。

四、不良竞争

孙大光主政地质部10年,大力开展南海、东海和塔里木油气勘查,皆有重大突破。

1976年,孙大光主持成立了南海石油会战指挥部,在珠江口盆地进行海上物探和钻探,三年后连续打出石油。康世恩副总理视察后,要求地质部将南海油气勘查和开发交给石油部的队伍接手。孙大光按照李先念的指示,调动南海油气勘查队伍向东海转移。从1980年到1989年,在大面积海洋物探之后,于西湖凹陷施钻14口井,11口井发现油气,8口井获高产油气流,发现了平湖、宝云亭油气田和苏堤油气富集带。从此,油气源源不断输入华东等大城市,使上海结束了“十万个煤饼炉”的历史。如今,日本觊觎并试图与我争锋的东海油气区,就包括这一带及周边海域。

70年代末,石油和地质系统的钻井队在塔里木盆地北缘一带打了相当多干孔(无油苗显示),石油部的队伍放弃、撤出了。专家学者各抒己见,最后要求部长拍板。孙大光一向谨慎,他专门派一个调研组到南疆深入调查,5个月后听

取汇报,下决心成立新疆石油勘查指挥部,调集队伍上塔里木。1984年9月22日,沙参2井钻出工业油气流,相继发现了雅克拉、阿克库勒、达里亚等油田。

塔北出油后,石油部大批钻探人马又杀回来,向地质部的勘探区围拢。这时,两部已经不是友好合作关系,而是互相戒备,封锁资料,重复勘探。因为谁打到石油国家就给谁拨款,这种体制弊端,导致巨大浪费。

上述不良竞争,在冶金、煤炭、核工、建材、化工等勘探部门之间同样存在。为此,孙大光建议制定《矿产资源法》,国家统一管理矿产勘查和相关资料。中央采纳了孙大光的意见,于1982年将地质部改为地质矿产部,增加了管理全国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职能。1986年3月,全国人大颁布了《矿产资源法》。不正常的是,唯有石油部的油气勘查资料,不向地矿部管理的国家信息库归档。1988年9月,石油部翻牌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既有国家管理职能,又有全部企业特色。地矿部和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之间的纠结,仍在延续。1996年12月,中央决定:将地矿部的陆地和海洋油气勘查队伍,组建为中国新星石油公司,两年后与地矿部脱钩。1998年,有领导人提议,将新星石油公司拆散重组或与其他石油公司合并(实为肢解)。离位未敢忘忧国,孙大光致信中央,坦陈异见:

中国新星石油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国家油气勘查任务……两轮油气普查中实现的大庆、南海及东海、塔里木这三次战略性重大突破,被国内外同行誉为中国石油勘探史上的三座里程碑。

……把新星石油公司拆散重组……会使我国石油工业回到一家垄断的局面。实践证明两家搞是对国家有利的,新星石油公司过去在渤海、南海取得的油气成果都无偿交给了海洋石油总公司。进入东海以后,按照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精神,划出七万多平方公里交给海洋石油总公司对外合作,留下二万多平方公里由新星石油公司自营勘探开发。实施的结果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海洋石油总公司在大于新星石油公司七倍的海域先后与十几家外国公司合作,打了15口井,只有一口获少量天然气。新星石油

公司在留下的东海西湖凹陷(实际排他性区块仅1.1万平方公里),打了25口井,其中16口获高产油气流,至今已发现10个油气田,拿到1800亿立方米天然地质储量,可望形成6000亿立方米规模的油气群。因此,新星石油公司不能与海洋石油总公司合并,两家用两种思路、两种模式来搞,有比较,就有鉴别,对国家加强石油工业管理是有利的。

孙大光的意见得到中央首肯,使新星石油公司得以整体保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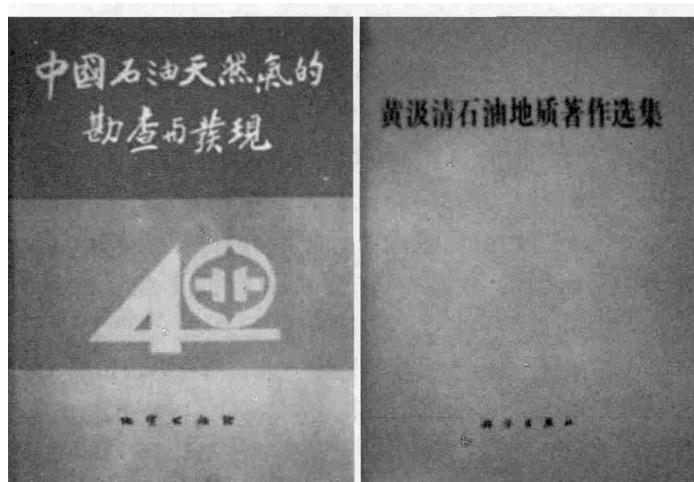
五、编纂信史

孙大光晚年常常忧怀:大庆等东部油田的发现史没有权威文存,黄汲清同李四光之争会有后遗症。鉴此,提议编纂一部《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在他指导下,该书由黄汲清、孙殿卿院士等4人为顾问,吕华为主编,苏云山、韩景行等5人为副主编,12位资深石油地质专家学者执笔,一百多名专业技术干部参与收集、鉴别史料,集体写成,1992年出版。孙大光在序言中说:“这本书是由许多当年身历目睹的老同志,翻阅历史档案资料,座谈讨论,历时四载,数易其稿,才得以完成。可以说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本来面目的一部油气勘查与发现史。”

此书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在发现大庆等东部油田过程中的战略指导作用;列举了谢家荣和其他石油地质专家解放前后的油气勘查实践及重要著述;认定了黄汲清等解放前在四川盆地和天山南北“进行了石油地质调查”,“也提出了陆相生油和多期生油的观点”,但没有认定黄汲清有“陆相生油理论”以及据此指导勘探大庆油田的实践。黄汲清上书邓小平中的其他内容(即最早提出以松辽平原为石油普查重点并实施,相关地质报告中都采用了黄的地质构造理论和学派术语等),同样没有得到认同。

一年后,《黄汲清石油地质著作选集》发表,其中写道:

1954年3月1日,地质部李四光部长应石油总局苏联专家小组组长特拉菲姆克教授的请求,在该局“作了以‘从大地构造观点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远景’为题的学术报告,详细介绍了他的



地质力学理论和观点,最后指出:……‘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先从新华夏系旁边摸起,同时在覆盖区着手摸底,物探钻探都可以上,看来是有重要意义的。’”

总起来说,上述专家们的见解,不论是载在已出版的文章中,还是在打印文件中,在1955年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这是自己工作太忙,没有认真查阅有关文件和资料,这是我自己的过失。

这两段文字,明确承认:大庆等东部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有关;自己当年没有认真了解和对待,“是我自己的过失”。黄先生以此方式下了台阶,其坦诚磊落,值得称许。

六、何建明的炒作

至此,信史延世,权威确立。但谁也没想到,地矿部文学季刊《新生界》主编何建明,却在该刊1995年第三期上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科学大师的名利场》,重新炒作黄汲清上书一事,称他要贯彻落实邓小平17年前的批示,匡正大庆油田发现的历史。何建明宣称:黄汲清是“中国石油之父”,“第一个在世界上提出‘陆相生油和多期生油论’”,“黄汲清的陆相生油理论是实现大庆油田发现的重大突破的最基本和唯一可信的理论依据”,“所谓大地构造学用通俗的话说,就像今天我们使用‘X光’把人体的各个部位、脉络弄得一清二楚似的……黄汲清将自己的‘X光’武器运用到石油勘探中去,取得了神话般的奇效。”进而编造:“黄汲清有一对‘火眼金睛’,能看穿几

千米地下的情况,能辨别几十亿年的地层变化。”结论为:“大庆油田是他发现的。”

在把黄汲清捧上神坛同时,何建明从学术、品德和政治上全面否定了李四光。说李四光“在地学界名声并不好”,“对找矿确实并不在行”,他的地质力学“极受排斥和孤立”,“可悲的是毛泽东到死都不清楚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无关”“毛泽东非常敏锐地发现了李四光是可以作为知识界的‘革命势力’,去担当起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那种理想人选,而李四光也无愧毛泽东的赏识,积极地充当了这种角色。”说李四光是个“政治小人”,内心肮脏,如果不骂人不整人,“我这个地质部长能呆得住吗?”进而编造:是李四光把谢家荣打成了右派,因为两人早年曾是“情敌”,谢家荣“反党(其实是反李四光)”……何建明写道:“妈的,这是什么政治!李四光怎么也跟着玩起政治了!”

《名利场》发表后,引起轰动,同时也遭到广大读者的批评和谴责。中国地质科学院在给地矿部的报告中指出:该文“不仅存在很多不实之处,还有不少歪曲事实,无中生有,人身攻击,诋毁中伤,拨弄是非,制造混乱的地方,在社会上和地质界造成很坏的影响。我院科技人员,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除进行公开答辩外,并请组织调查澄清。”1996年1月31日,在第四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颁奖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严厉批评了《名利场》及其作者:“前一段时期有人发表文章,不尊重事实,混淆是非,企图否定李四光教授的历史功绩,那些言论都是非常错误的,在李四光同志这面旗帜面前显得渺小和毫无意义,无损于李四光为中国地质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中国矿业报》1996年2月3日)与此同时,李林院士起诉何建明并《新生界》杂志社侵害李四光名誉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李林胜诉。

笔者将《名利场》相关内容及其负面影响向孙大光作了汇报。老部长对此深表嫌鄙,但对黄、李矛盾持论公正。他说:“李四光的历史功绩是举世公认的,任何人也否定不了。不过,‘文革’期间李四光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使用‘唯心论’‘形而上学’等语言,批判其他传统地质学派的学术观点,有失大科学家的气度和风范。”

我向李林转达了孙大光的看法,李林也认为父亲当年这样做不妥,不对。

七、“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是个伪命题

由于《新生界》是地矿部主办的文学刊物,何建明系主编,加上何又杜撰李四光与谢家荣是情敌,因之李把谢打成右派等等离奇的情节,故而《名利场》更具新异性和煽动性。广大读者看不到中国油气勘查的真实史料(也不知黄汲清已经改变观点、承认自己过失的事实),只能从天津《今晚报》等报刊与《秘密档案》等书籍中接受何建明的编造,以致有人称道:“何建明敢于标新立异,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试图挖掘科学事实,挑战权威、冲破传统的行为值得赞赏。”

何季民(华北电力设计院退休高工)于2004年发表了长文《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笔名何民),再次炒作黄汲清上书邓小平和在科协大会上放“原子弹”之事,支持何建明若干荒诞不经的观点:

1. 何民称:“如果不是黄汲清圈定了松辽平原,不是他坚持并挽救了这个项目,大庆油田的发现可能就不只是推迟几年或十几年了!”

这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说法。

2. 何民称:“1956年1月初,陈云副总理又在中南海约见黄汲清,主要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以煤炼油的问题,二是中国石油的远景问题。黄汲清在回答中,一方面坚定地表示了中国有油的充分信心,一方面……”

历史的真实是,1953年12月,李四光回答中央的询问(走开发天然石油还是煤炼油的道路),非常明确:我国石油蕴藏丰富,应抓紧普查与勘探。两年后,面对陈云提出的同样问题,黄汲清却不明回答。黄的记述是:“我虽然说过石油可以自给的话,这只是一个估计,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猜测。今天,当国家领导人把这样的国家大事向我征求意见,我若是随心所欲地、完全不考虑后果地作出答复,那将是一种犯罪。因此,我没有直接采用‘是’或‘不是’的方式回答问题,而是委婉地、可以说是绕圈子的办法把问题摆出来,让陈副总理自己考虑。”(《黄汲清石油地质著作选集》

第182页)

3. 何民称:“最完善并且经受了最多的实践检验的,还要算黄汲清的‘新疆石油地质报告’及由此发展起来的‘多期多层生储油’理论。”

黄汲清的所谓“陆相生油理论”,只是一句话,没有任何一篇文章或一段文字予以阐释。何建明与何季民再三宣扬黄汲清的“陆相生油理论”指导了大庆油田勘探,而历史事实恰恰相反——

1957年3月8日,黄汲清在地质部第三次石油普查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强调:“陆相生油在我国是很重要的,但就整个世界来说,海相生油无疑还是站着绝对的重要地位。今后我们要继续注意陆相生油,但对海相生油更要注意。”“松辽平原可能存在海相第三纪地层。”“配合浅钻研究中、新生代地层,特别注意松花江统海相第三纪。”“海侵似不可能从苏联方面入侵,而是从渤海北来,因此应在彰武一带用深、浅钻证实海相第三系的存在。”苏联专家组组长特拉菲姆克50年代的谈话记录也证实:“黄当时强调在阜新一带靠海近,可能有海相第三纪地层,强调要找海相油田;他与谢家荣具体部署松辽盆地的石油地质踏勘工作路线选的就是:从阜新—沈阳—沿第二松花江向南—吉林的哈达湾,而不是向北到松花江以北地区,显然,这一踏勘路线基本上是过去日本人的工作路线。事实证明,松辽盆地并不是第三纪海相地层,而是巨厚的陆相白垩纪地层。”综上,可见黄汲清的指导思想是找海相油田。

何民的《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受到赵文津院士(50年代地质部物探局工程师)全面驳斥。2005年5月,何民致信赵文津,表示不再参与这一争论。不知为什么,何季民又在2013年第12期《炎黄春秋》上发表了《邓小平批示与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一文,重复何建明的若干错误观点。他归纳:如果说何建明“引发1995年前后的‘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是第一轮,那么时隔8年《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引发的就是第二轮,这次是‘何民’与赵文津充当了双方的代表人物。”第三轮,则是地质学者张立生及其推出的最新研究成果。结论是: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和黄汲清的“陆相生油理论”,均与大庆油田的发现无关,“真正的最大的贡献者是谢家荣”。到目前

为止,对张立生持论断李派、黄派均无人理睬。

窃以为,“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是个伪命题。因为任何油田的发现,都是领导者运筹帷幄、千军万马奋战野外的集体劳动成果,不同于著作权或发明权,可以归属个人。几十年来,只有黄汲清先生一度为自己争功,最终还是回归理性,诚恳认错。此后硝烟散尽,既不存在李派、黄派,也没有其他人横生枝节。

张立生(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退休研究员)的著名论点是:“地质力学根本不是导致发现大庆等油田的石油普查工作部署的理论基础。谢家荣的《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才真正指导了那时中国石油普查工作的部署。”

1954年12月,谢家荣在《石油地质》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一文。其主要内容,《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第15页)有所引列:“1954年谢家荣将中国含油气区分为三大类:(1)油气苗很多,构造合适,有些并已生产的确定油气区,包括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河西走廊盆地、伊克昭盟—陕北盆地、四川盆地等;(2)从大地构造推断,希望很大,但油苗不广或尚未证实的可能含油区,包括桂滇黔地台区、华北平原、松辽平原、华东平原等;(3)构造尚为合适,油气苗零星分布的比较次要的可能含油区,如两湖盆地、长江下游区等。”显然,这只是一种粗线条的油区分类,不可能“真正指导了那时中国石油普查工作的部署”。而此前,即当年3月1日李四光同苏联专家座谈时,已经对华北和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查达成共识。特拉菲穆克院士说:“我们一时提不出深刻的见解,赞成李部长的见解。”“华北、东北是覆盖区,听了报告我们没有明确的问题也明确了,我们也同意李部长的意见,进行区域物探与钻探。”“报告给了我们信心。”石油管理总局苏联专家组组长莫谢也夫表示:赞成李部长在华北、东北找石油的意见。

《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第22页)记载:“1956年李四光曾经指出:新华夏系是我国东部控制油气区的主导性构造体系,它的沉降带是很有远景的含油气带。”黄汲清后来也明确承认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指导有关。对此,张立生始终不认同,他断言:“在大庆

油田发现之前,李四光从来没有说过到新华夏系的凹陷带找油之类的话。”这样,就没有底线了。

谢家荣1957年不幸被打成“右派”,黄汲清同年底辞去石油局总工之职(任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先后离开石油普查岗位。李四光身为地质部部长、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主任,以地质力学理论为战略指导,统领大庆等东部油田勘查多年(关键在1958—1959两年),成果累累,上下公认。愣说黄汲清或谢家荣的贡献超过李四光,实在是罔顾历史,违背常识。

李四光、谢家荣、黄汲清都是著名地质学家,对大庆等油田的发现均有贡献,只是程度不同。不论出于什么动机,以黄汲清否定李四光,再以谢家荣否定李四光和黄汲清,都不是正常的历史探讨。只要认真阅读孙大光领导编写的史书《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一切真相与是非都会大白于天下。■

(作者为地质部物探工程师、中国地质作协主席)

(责任编辑 丁杨)

全国免费咨询热线: 400-005-0480

我是华源书阁,我来了,你在哪?
——为了“您”和书的邂逅!

北京华源书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要代理个人出书、老人出书、学生出书、职称出书、公司出书。我们和国内多家出版社有密切的业务合作,帮助老师申请国内正规书号,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可在中国新闻出版信息网查询,也可进入新华书店、当当网和卓越亚马逊等网站进行发行销售!

► 出版模式

A类: 丛书号出版优惠套餐最低11500元起;
B类: 无书号出用于交流赠送2000元起印刷;

► 出版流程

无书号出版流程:作者来电咨询(如需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根据详情报价→签订协议支付定金→交付稿件(手写稿需先电脑录入)→设计排版校对→确认版式和封面→寄送样书→作者终审样书签字确认→回邮样书→付清余款→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国内出版流程:作者来电咨询→公司发送选题表报审选题→回复选题→根据详情报价→签订协议支付定金→交付稿件(手写稿需先电脑录入)→设计排版校对→送审出版社审核→寄样书→作者终审样书签字确认→回邮样书→付清余款→印刷发行

► 联系方式

服务热线: 010—56423912 56423911
投稿邮箱: huayuanshuge@163.com
公司网址: (华源出版网) www.hychuban.com
公司名称: 北京华源书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汤立路218号明天生活馆A座206室

文化台湾拾零

○ 熊景明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所与文化台湾基金会举办了内地企业家台、港双周游学团。今年3月下旬,我有幸随团到台湾游学了一段时间。

文化作为政绩

故事要从2007年说起。那年,沾了一位著名作家的光,应严长寿先生邀请,访问台中。从此,我心目中的台中地标,是一条当中草地比车道还宽的“绿道”,也称为美术园道。初夏和暖的阳光下,台中市交响乐团儿童团坐在草地上排练,一张张聪慧纯真的面孔,比悠扬的琴声更令人驻足。大道两旁的小店橱窗布置精致而有创意,颇具欧洲小店风格。据说这个地区原来是空置的银行宿舍,一位年轻女子买下三间,花心思改建,立即引人注目,政府因势利导列入城建项目。就这般,一朵小花带来了春天。

台中市长胡志强是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他每年的施政报告以文化政策开篇。说起六年前市民平均每年参与四次文化活动,而现在为每年二十次,全台湾第一,难掩得意之情。政府预算中,4%用来推广文化活动。当晚参加了在台中圆形露天剧场举办的民歌演唱会。剧场内可容纳一万人,设计者聪明地让另外两万人,可以通过大屏幕在外围草地观看。当晚座无虚席,歌手包括罗大佑,台下坐者马英九。那位作家朋友后来在文章中抱怨坐头排的马英九太高,挡住她的视线。我禁不住频频留意座中一对夫妇。妻子一条衣袖空垂,丈夫随音乐在她腿上轻拍。一曲毕,二人默契地各举起一只手掌对击。他们看得开怀尽兴,旁观者为之心戚戚。那是胡市长和他车祸余生的太太邵晓玲。

当晚的演唱会免费。次日,有位女士告诉我,她听过一次蒙古马头琴表演,很受感动,打算邀请演奏者到台中来,市文化局已经答应资助

20万台币,她需要另外向企业家筹集60万。受不受政府资助,是个难题。因为由政府出面组织的活动,必须免费向市民开放。这位女士和他先生,还有此行遇见的许多台湾各阶层的人,自称是推动台湾文化建设的志工。他们是为台湾文化击掌的其中一只手。当中娇娇者,非严长寿先生莫属。

民间的文化建设者

网上介绍严长寿。出生在上海,1岁时,跟随家人到台湾。23岁,进入美国运通担任传达小弟,28岁因让公司转亏为盈,内升为美国运通台湾区总经理。32岁成为亚都丽致饭店总裁。严长寿曾任世界杰出旅馆系统(The 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亚洲主席、观光协会会长等职。被社会誉为“观光教父”。他也参与多次国家的重要规划、国际观光事务。

一位企业家,民间人士,怎么能够去参与政府不少重要规划?他的文章讲述了其间的艰难和“技巧”,他的参与并非都是应邀作为顾问,更多是他和他的同道争取来的机会。成功说服政府放弃破坏环境而得不偿失的苏花高速公路,便是一例。严长寿曾经作为总统府例行专题演讲的嘉宾,以“我所看到的未来”为题发表演说。

这位总裁和名作家漫步台中,不断有粉丝涌上来索签名,找他签名者更多。一对年轻夫妇走过来自我介绍,讲述他们初创的茶叶种植及售卖的计划,邀请他去公司看看。当天的节目已经排到午夜。“那就晚上12点来吧,附近便是台中夜市”。他爽快地答应了,并问我们是否一道去,之后去逛夜市。“好呵!”,一贯拒绝熬夜的我欣然同意道。

他有一本书叫做《做自己与别人生命中的天使》,告诉你做不了成功人士,也可以做“天使”。

志工现象,在台湾已成气候,不知道是否由于这部书,志工常被唤作“天使”。他对志工天使说:“我们是去倾听,整合,启发,伴护,而不是去帮助或施舍”。有位年轻人写信给严先生,说自己的妈妈是他的粉丝。随信寄上他的书,请他签名,作为给母亲的生日礼物。意外地,母子收到亚都饭店的请帖,邀请他们在母亲生日当天到饭店享受免费晚餐。二人坐下,发现多摆了一个位子。此时,严先生走了进来……

40多年前,台湾岛东岸一座小渔村海边,有名20来岁的小兵常常在下岗后,躺在沙滩上听贝多芬、巴哈,发白日梦。假期则到山谷行走,“我尽情享受自己与自己静默相处,沿途不断赞叹着令人屏息的景色”,离开台东后,四海闯荡,少年兵时的驻地,朴实醇厚的民风,激荡灵性的山水,从未忘记。他一直觉得,总有一天我要‘回去’”。不知是命运还是夙愿,终于在2009年8月,这块心目中的圣地遭受灾难以后,严长寿回到了花东。

是年11月,莫拉克飓风侵袭此地三个月之后,我又作为客人的客人,跟随严长寿邀约的花东重建参访团来到这里。早已在香港电视上看到飓风排山倒海的破坏力,走近灾区才真正地触目惊心。站在嘉兰村旧址,你可以想象到村民从小看到的对面青山,顷刻之间崩裂,留下满目疮痍;村外河流变成乱石滩;世世代代经营的美好家园,毁于一旦。那不只是伤痛,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悲切与绝望。风灾令严长寿“心如刀割”。他不仅止去“救灾”,而倡导可持续发展(台湾称为“永续”),从反对政府错误急功近利,追求眼前经济效益的决策做起。在他看来,花东的文化建设,因地制宜的教育,才是长远之计。这次呼朋唤友而来,不是哀悼台东的损失,而且向大家展示这块宝地的生机。静夜,阿美族歌手坐在乡亲中,高昂而朴质歌声发自肺腑。篝火边,主人与宾客携手共舞,进入返璞归真的境界。面向大海的民宿景致美不胜收,早餐堪比星级酒店。后来知道店主的确到严总裁的酒店里接受过免费培训。严长寿看得十分清楚,原居民因为在汉族学校念书念不过汉族孩子,才能被低估。他们中许多人天分洋溢,看看张惠妹,胡德夫及许许多多这里走出去的艺术家就知道了。

严长寿并不是唯一的,无数人选择了同样的

生活方式。他的好朋友普讯创投董事长柯文昌先生创办的《台湾好基金会》,由首位访问大陆的媒体人徐璐女士任执行长。在台东,我们还遇到一位退休高管。他到乡间落脚,开启人生另一程。特有的企业家精神,表现在严先生常说的一句话中:“骂是没有用的,卷起袖子来干活。”当然,任何一个国家与地区,有社会与文化关怀的生意人毕竟少数。听说有位某师傅,在内地赚得满钵满罐,回到台湾投资地产,永远赚不够。看来,只要给有关怀的人一个空间,让他们可以身体力行,就会推动社会向前;要是给他们一个舞台,让他们可以振臂一呼,必有应者。这就是今天在台湾看到的严长寿现象。

分手时,严先生叮咛:“再来台东呵,带朋友来。”“一定”,我回答道,幻想有一天能够找到严先生在大陆或者香港的同道来此地,沿他的脚印走花东。终于在四年多后的2014年春天,和一群内地企业家与专业人士组成游学团,来到台东。此时,严长寿先生已从酒店退休,全副身心投入他在2009年创建的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并担任台东县私立均一国民中小学董事长。我们所到之处,都看到这位总裁的痕迹,他伴护的一株株幼苗长大了。扎根于原住民社区的旅游业,遍地开花。特点是体现当地文化,保护自然环境,他们称之为“永续与扎根”。

根植于本地文化,与环境协调共生的事业,才可能持续,才会引起本地人认同,让他们愿意留下,愿意回来。和大陆多数农家乐完全不同,民宿舍多趋于专业水平。当然,价格也不低。

培育民间手工业的创意作坊,音乐人和艺术工作者的集市,几年前不过是纸上谈兵,今天摆在眼前。我从棉麻屋买的手工麻织手袋,香港朋友看到大为赞叹,于是每天挎着,替他们做活动招牌。有人问起,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听,就唠叨起相关的故事。

政府与民间联手

国立台湾史前博物馆会客室里,挂着胡适父亲胡铁花知州的“劝民四字谕”,鼓励民众开垦养殖,种植竹木,勿吸鸦片,“无论民番,共敦和睦”。胡适两岁时也住在台东。这位提倡全盘西

化的新文化运动旗手,不会料到他父亲曾为父母官的这片土地上,长出一株典型的中西文化杂交之奇葩。

观光者看到的成绩后面,是官方与民间共同的默默耕耘。基金会一方面与政府合作,推动公共事务,另方面以专业标准组织培训,并协助原住民艺术家找到自己的舞台,让当地青少年发挥潜能与创造力。严长寿从来坚信文化在这里有深厚的基础,需要的是灌溉与培育。他一直以来强调人才储备是一切发展的基石。他接手了几年前星云大师在台东创建的均一中小学。

“建立一个跨宗教及多元化的学习校园,期待搭建一个教育平台,连结花东在地优势的「艺术人文」及「自然生态」为学习主轴,以培育花东未来的种子人才”,美好的长远目标下,总裁有近忧。每年需要为贫困生筹集3000万台币的赞助,也是一个满烫手的山芋。另方面,远水不解近渴,当下之急,是为华东年轻人打造回乡之路。

听到不少到台湾去过的人评论说,台湾民间生气勃勃,政治一派乱象,政府问题多多。实际上,如果缺少政府的支持,民间能够独立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让年轻人回乡创业,同样是政府努力的方向。台湾的社区营造计划,提出扎根,永续。这个计划由文化部主管,因为文化的根基,故乡的认同,才可以令人有回家的长久和根本的冲动。大陆也有类似的乡村建设计划,称之为新农村运动。但文化在其中,连个配角也算不上。

我们访问过的NGO,当然都是主人家精心挑选,十分成功的例子。同行的企业家,三句话不离本行,都会问及经费来源,投入产出的问题。看来一般政府的资助都占30%-70%。项目都靠向政府投标竞争而获得资助。当然,这些组织中精明能干的员工,热情的志工,是最为宝贵的财富。这些能干,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选择投身社会服务,也是台湾的一道独特风景。同行的企业家中,不乏人有像严先生那样“卷起袖子做事”的冲动。以促使老者焕发青春,保持人生乐趣为目标的老者服务;家长与学校和社区合作的“故事妈妈”活动,都让大家受启发,有人立刻有回去尝试一番的冲动。

台湾的文化扎根运动,据说与80年代的本土化运动并生。文化政策渐自贯穿并融合在政

府施政理念之中。龙应台在2008年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时,对文化及文化政策都写过文章。最简单的定义是:“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能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日子怎么过,就是文化”。延伸而言,对人的关怀,即文化关怀,反之亦然。严长寿的花东关怀,是他的台湾文化关怀。严长寿他一再提醒政府,要吸取香港的教训,不要追求游客的数量。他认为,文化是台湾观光最大的价值,最重要的工程是落实文化政策,这才是台湾最值得骄傲的软实力。

一位同行的金融投资人士写下他的感受:“禅者林谷芳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美学的台湾。台湾是多层次的,有显性的台湾,那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有政治的喧嚣,有商人的活跃,但还有一个隐性的台湾,那更是生活的台湾、真实的台湾。在寻常巷陌里是干净的街道,是典雅的小店,是精致的生活,平实无奇的房子里是有品位的布置,是知足常乐的恬淡,是安顿的灵魂,我们这次独特的行程确实体会到了隐性台湾的美”。

上网查查久违了的胡市长相关的条目,大为吃惊。2012年2月远见杂志首度进行“全台最佳退休友善县市大调查”,以多项硬指标评比,台中市各项表现均佳,夺下桂冠。首任直辖市长任内已完成整体市政建设包括25亿元开辟公园44座:预计于2013年底完成招商,配合栈道及联外道路开辟,除做为生态环境教育教学场所外,也将结合当地人文与生态资源,打造成中台湾“国际级环境教育园区”。

西区台中文学馆2014年开馆。大安滨海乐园市府进行投资五千万元,2013年7月开放戏水。雾峰区干溪环境工程,雾峰第一条自行车道诞生,建构一个兼具生态、文化、休闲、景观功能之都市线性空间系统,并提供适意的休闲空间,提升市民生活环境质量:采用世界首创的曲墙结构工法的台中大都会歌剧院,营运后可望成为台湾表演艺术中心三大中心之一。为有效提升本学童阅读竞争力,在台市29区成立爱的书库,每区都至少有一座书库。

2013年台中市获得智慧社群论坛(ICF)颁发全球智慧城市第一名,2013国际宜居城市大赛第一名,如此种种,包括司法执法,食品安全,

都名列前茅。交出如此出色的成绩单,胡志强应当受到人们拥戴,甚至出来竞选总统了吧。且慢:2011年9月7日,天下杂志评比县市长满意度排名第21名,倒数第2名。

文化二字在台湾,使用频率甚高。白色恐怖时代的监狱,供人参观,叫做“景美人权文化园区”。文化部的工作包括去查出档案中相关资料,由部长亲自递到受难者家人手中。文化部也整理出版了相关的回忆文章。其中一个展馆叫“迟来的爱”展出受难者遗书。参观者少有人不是含着眼泪离开。

原住民地区的弯山森林公园,也被称为“森林文化博物馆”。之后才明白了,导游阿龙的谈吐气质就是当地文化的展现。与大陆不同,所到之处,见到的导览,均为有资历的“文化使者”,而非口齿伶俐的美女俊男。看到日程上有一项参观“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心生疑虑,“难道台湾还有恐龙?”。原来台湾有记载的历史,仅400年,故之前的考古发现,都称为史前文物。馆长张善男博士,是名符其实的文化人。馆长介绍完毕,提到博物馆的一项资助计划,一行人中有不少慷慨解囊。这一项目并非与文物发掘保护有关。而是捐款支付贫困地区小朋友到博物馆来参观的交通和午餐。

大约两年前,台湾整合原来各政府部门的相关业务,成立了文化部,龙应台为首位部长。看它提出的7835文化发展计划,便可以了解台湾这个文化部的独特之处。7835这个数字是全台湾村落的数目。“培育在地文化人才,盘活村落文化资源,发展村落微型文化产业,改善村落文化据点,发展具在地美学之生活空间”,“泥土化”是文化部施政方向之一。文化是国民素养与气质的整体呈现,也是“国力”之所在。台湾在华文世界具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条件,民主经验的积累也培养了较深厚的公民社会。

传承与断裂

台湾的文化和中华文化结缘,源远流长。不尽如此,50年代后的台湾文学与艺术传承了在另一块大地上被抛却的衣钵。读一读余光中的诗文,王鼎钧的《流亡四部曲》,齐邦媛的《巨流

河》,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便明白了。多亏80年代的本土运动,令多姿多彩的原住民文化受到重视;台湾文化与国际不同文化的交融互补,70年代后已经蔚然成风。这就是严长寿先生常说的台湾独特的软实力。台湾朝野的文化守护者,台湾民众,显然为华人地区树立了榜样。

我们的台湾周游学原来定在3月1号,后来因旅行证件来不及办理,推迟到3月22号。如果按原定的时间出发,大家就带着上述对台湾美好的印象归来,以为我们对台湾文化已经有蛮深入的了解。行程改变,巧遇太阳花学运,原定的参观立法院节目就取消了。一行人则自行增添了许多活动,包括去现场观热闹,学生冲进行政院的一晚,有人电视看到半夜三更(都比较奇怪警察怎么那么容忍)。我们一路的听讲及交流,免不了涉及此议题。听到到学运产生原因的各种高深见解,例如对马政府长期不满的表现,对大陆潜在威胁的反应,身份认同带来的深层危机,民主不成熟阶段的必然等等。但都无法解释许多奇奇怪怪的现象,例如资讯的发达不能阻止谣言满天飞,意见不同的人之间无法对话。听说一家人之间如果看法不一样,也就“莫谈国是”。我自己接到台湾学者的文章,内容完全不能接受,一贯宣称对人坦诚的我,也不敢去和他辩论,因为我根本不可能改变他的看法,也不能冒犯他说:你作出判断的根据是不成立的。

如果看看视频上立法院的对官员的咨询会,有些场面,除了没有让他们坐“喷气式”,和文革批斗会所差无几。在我这样头脑简单的人看来,如果文化是国民的素养和气质,民选的立法局议员不是应当作出表率吗?无论有多么复杂的渊源与政治考虑,都无法为如此的粗鲁的言行辩解。礼仪之邦的传统,民主制度的议事规则,是否应当成为最起码的要求?无论政治舞台的表演者多么出格,无论学运多么轰轰烈烈。只要老百姓的日子一样过,只要令我们感动的文化台湾还在那里,就谢天谢地了。■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顾问)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从普京怒斥“布尔什维克卖国”说起

○ 李 凌

普京称布尔什维克在一战中卖国

俄罗斯《消息报》2012年6月28日报道，普京总统27日在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回答提问时说，布尔什维克政府与德国单独媾和，俄国因其卖国行径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普京说：“我国输给了这场战争的失败方。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我们输给了战败的德国，事实上是向它投降，后来它又向协约国投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持续到1918年。沙皇俄国属协约国集团，与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一道攻打德国及其同盟国盟友。

但由于受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内战的牵制，俄国的战力大打折扣。无视协约国盟友，布尔什维克与事实上战败的德国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签署和约。部分历史学家认为，通过订立布列斯特和约和退出战争，布尔什维克兑现了先前为换取德国对其夺取政权的支持而作出的承诺。普京说：“这是当时政府卖国的结果。很显然，他们害怕这一点，不希望谈论这一点，因而避而不提……”

他说：“之所以避而不提还有其他原因。我国实质上输给了战败一方……这是卖国行径，为了党派利益，它不敢承认这一点。”普京认为，一战的失败代价是大片国土丧失和巨大的人员伤亡。

长期以来，蒙着神圣光环的列宁和他缔造的布尔什维克竟然被普京说成卖国。这是怎么一回事？

下面根据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937年出版，我国三联书店翻译，1975年出中文版的由凯尔任采夫著的《列宁传》，以及我国何方、金雁等编著的《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忆与

思考》、陆南泉等编著的《苏联真相》以及其他有关书籍，简单介绍列宁其人和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主要活动：

1898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曾在明斯克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但会后不久，全体中央委员和部分代表都被捕。1903年7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列宁提出，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应是党的首要任务。他还提出，要成为党员，只承认党纲还不够，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并参加党组织活动。马尔托夫反对列宁的主张，认为党员只要承认党纲就够了。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最后在表决时，赞成列宁主张的占多数，成为多数派，按俄语译音，多数派称为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派为少数派，按俄语译音，少数派称为孟什维克。1905年，俄国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于同年回国领导革命，12月莫斯科工人武装斗争失败，革命处于低潮，列宁于1907年底再次出国。

在1912年在布拉格召开的第6次党代表会议上，孟什维克被清除出党。布什尔维克成为独立的政党，改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以后，在很长时期内，在世界范围内，“布尔什维克”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俄、美、日等为一方(协约国)，德、奥、土耳其、保加利亚为另一方(同盟国)，双方激烈交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殖民地的肮脏战争，交战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应反对本国政府参战。列宁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都应努力使本国败北”的口号。但当时第二国际，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考茨基在内的各参战国的社民党都支持本国政府参战，被列宁斥为社会沙文主义，



列宁在工作

是叛徒。后来他还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在一战期间德国在东西两面同时作战,负担沉重,牺牲惨重,所以德皇威廉二世和德军总参谋部很想和东线的俄国谈判和平停战,以便把东线的兵力调到西线和英、法决战。但俄皇尼古拉二世予以拒绝。1917年俄国2月革命,尼古拉二世退位,俄国成立临时政府,仍然据绝和德方和谈停战。德国环顾在西欧的多个俄国革命党派,只有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和自己的目标最吻合,因此给予列宁大力支援和资助,使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国内外的影响和势力大增,于1917年4月,德国政府把居住在瑞士的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接到德国,并用密封火车和火车轮渡把他们送到瑞典,他们由瑞典转到芬兰,后进入俄首都。列宁发表了《四月提纲》,指出要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夺取了政权。

关于这段历史有一些问题,长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心的热门研究课题。

第一,列宁和他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大量活动经费从何而来?

列宁两次出国,出国时间,共十多年,他曾在瑞士、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瑞典、芬兰、丹麦、捷克、波兰、奥地利等国家的20多个城市居住和工作过,足迹遍及整个欧洲,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袖们也类似。他们都是职业革命家,以革

命为职业,是没有工资收入的。据《列宁传》资料,他们在明斯克、日内瓦、伦敦等地召开过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他们还在巴黎近郊办过布尔什维克党校,接纳从俄罗斯出来的布尔什维克信徒。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在欧洲各地生活,开会,办党校,办刊物等经费从何而来呢?

为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2007年出版的何方、金雁等编著的《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思考》文集中,对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可供研究和参考的珍贵的第一手史料,简单介绍如下:

美国政府于1918年10月公布了一批档案资料,即在现代史上极受重视的《西逊文献》(Sisson Documents)全面证明,列宁是奉德国的命令行事的。这文献公布以后,欧美政界和史学界曾讨论一项根本问题:列宁秘密回国后极力鼓吹片面缔结和约的政策,是否足以证明他是个德国的间谍?他在瑞士期间以及回国后,是否仍不断接受德国的津贴?

齐曼编的资料。英国学者齐曼(Z.A.B.Zerman)编的《俄国革命与德国——1915至1918年的档案资料》(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齐曼文件集)。这本书的资料中列出了德国政府为支持俄国的革命运动所花的款项和德皇政府与布尔什维克及其他俄国革命政团之间的关系。

这批文件提到的德皇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付出极大的款项,给各种各样的俄国革命分子在俄国境内进行颠覆沙皇政府的宣传活动,但这些文件没有说明这笔巨大的款项中究竟有多少用在俄境内,接受此种津贴究竟是谁?他们如何用法?

一般人认为,德皇政府和俄国的接受者都不会保留详细的账目和收据,但还是有许多蛛丝马迹,使研究者们可以看到一些事实真相。

从这批文件中可以看出,早在1915年3月,德皇政府已拨出200万马克供俄国革命分子作宣传经费。这笔钱的绝大部分是由一个名叫海尔芬博士(Dr,Alexander Helphand)的德皇政府特务交给俄国革命分子的(这位海尔芬博士是托洛斯

基的好朋友),他曾化名巴伏斯(Parvus)。在1915年底,德国政府又拨给他100万马克。他在1915年3月写给德皇政府的报告中说,在俄国组织大罢工,社会民主党的极端激进派(按:指布尔什维克)已经投入行动……他接着还提到列宁以及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名字。他主张应通过邀请这批人参加拟议在德国召开的俄国各革命党派联合大会,以便立即发动反对沙皇政府的行动。

巴伏斯(海尔芬博士)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为其活动中心,经常与流亡在该地的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如拉迪克等接触,但由于大家都知道巴伏斯是德国特务,因此列宁在1917年4月返俄的秘密旅程途经斯德哥尔摩时,拒绝和他当面晤谈。列宁是一个细心谨慎的人,他知道国内的政敌,将会利用他借道德国返俄一事对他大肆攻击。但当时在斯德哥尔摩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如拉迪克·汉尼基等仍然肆无忌惮地与巴伏斯会晤,而汉尼基在事实上是受巴伏斯雇用的。

列宁默许接受德津贴

这些布尔什维克要员与巴伏斯之间的联系,列宁不可能不知道,但为了他的党的利益,他允许这些勾搭继续下去,巴伏斯津贴布尔什维克毫无疑问,连德皇政府的外交官也都知道此事。1917年11月22日(按:此时布尔什维克已夺得俄国政权),德国驻瑞典公使致柏林外交部的报告证明了这一点。这位公使表示反对任命巴伏斯为德国驻苏俄首都彼得格勒公使。他在报告中说:“这项任命将会使布尔什维克的政敌们获得攻击这个新政权的大好借口。任命一个曾以大量金钱供应布尔什维克的人为德国驻苏俄公使,将会使俄国人士认为这个新政权是根据我们的命令行事的”。(见齐曼文件集第87页)

津贴总共花了四千万马克

1917年2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继续坚持和英、法等协约国的盟约,拒绝与德国谈判和平,使德皇政府更加增加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津贴”。1917年4月间拨了500万马克,11月间又拨了1500万马克(见齐曼文件集第24页、第75页),直到1918年3月德苏片面和约(即所谓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签订之后,德国仍继续津贴苏维埃政府。据1918年6月德国驻苏公使(当时

首都已迁至莫斯科)米巴哈伯爵发回柏林的密电中说:“由于协约国极力拉拢这个新政权,我认为每月的津贴增加到300万马克是必须的……”柏林接受了这个意见。德国撤回公使团时,总共给了苏联政府4000万马克(见齐曼文件集第130、133及137页)。

虽然,这种私相授受的款项没有收据和账册,但是从德皇政府的档案中,可以找出一些证据来证明这些款项的用途。德国副外长冯·柯尔曼于1917年5月19日从斯德哥尔摩发给德国总参谋部的报告中,指出德国的大量款项使布尔什维克得以在俄国的政治斗争中迅速接近胜利。他在电报中说:“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已获得巨大的成就,布尔什维克运动如果没有我们的不断支援永远不可能获得今天这样的规模……”(见齐曼文件集第70页)。布尔什维克已在俄国执政后,冯·柯尔曼于12月3日致外交部转德皇威廉二世的电报中说:“我们通过各种关系和使用各种方式把大批经费供应布尔什维克,使他们的基础大为发展。现在,布尔什维克执掌了政权已建立自己的《真理报》,从而进行有力的宣传,将他们的政党在原来很狭窄的基础上大为发展。”(见齐曼文件集第94页)。

冯·柯尔曼于1918年5月18日致莫斯科米巴哈伯爵的电报中说:“为我国利益计,我们务必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得以生存下去……白卫军是反德的,保皇派如果执政也会反对和约(按:指苏俄政权与德国签订的卖国条约布列斯特和约),保皇派重起会使俄国团结,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必须支持最左的党派”(见齐曼文件集第128、129页)。

德国为了促使俄国停火,因此大力支持俄国赞成停火的政党,并在缔结和约后仍全力支持此党继续执政。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了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他们最缺乏的是经费,因此下决心不择手段,接受被称为最封建、最专制的德皇政府的“津贴”。这就是全部问题的答案。

在《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思考》文集中,金雁的《十月革命的前因后果》一文指出:布尔什维克早期活动经费很大部分来源于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东正教分裂派教徒,当时在俄国共有约1000万人。著名的莫罗佐夫就是分裂派教徒。

1915年莫罗佐夫家族的工厂有6万人,资产在1亿卢布以上,这个家族堪称大资本家。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普梯洛夫工厂就是他们家族所有(这个家族允许在他们的工厂内建立工人组织和赤卫队),所以布尔什维克才能把那么多的工人组织起来,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1917年十月革命后,1918年6月莫罗佐夫的整个家族的企业都被苏维埃政府没收了。

第二,列宁是怎样离开他长久居住的瑞士回到俄国的?

列宁长期住在瑞士,瑞士的社会民主党领袖格林就是德国的间谍,由于得到格林的庇护,列宁才能在瑞士长久居住和工作。

列宁是怎样离开瑞士回到俄国的呢?据《列宁传》第165页说:“获悉1917年2月革命后,列宁急于回到俄国领导革命。他决定取道德国,在瑞士的社会主义者协助下,开始进行允许他经过德国回俄国的谈判。经过长期的磋商,有消息传来说,请求已经被批准了,列宁决定乘坐两小时以后的最近一班火车,列宁和他的同志坐上了去德国的火车……途经瑞典……经过芬兰……走过边境进入俄罗斯”,云云。

事情真的这样简单吗?在这里,《列宁传》隐瞒了下列事实,正是由于得到德皇政府的特别批准,列宁等才能经德境回国。为什么德国政府这样做?道理很简单,希望列宁等早日回国,推翻临时政府,以实现和德国谈和。且看对列宁十分崇敬的美国著名传记作家路易斯·费希尔写的《列宁的一生》(中国社科出版社翻译出中文版时改名为《神奇的伟人—列宁》)。在这部中文版第175页和以后许多页中,有如下的叙述:“俄国参加世界大战这一行动,迫使德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有一个时期,东方战线上的德军,超过了西线),使德国有遭到失败的危险。凯撒(按:即德皇威廉二世)企图同沙皇缔结单独和约,但没有成功。”1917年2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也拒绝和德国和谈,于是德国政府便转向列宁。早在1914年9月间,一个叫亚历山大·克斯库埃拉的爱沙尼亚人把住在瑞士的俄国革命侨民的情况大致告诉了德国驻瑞士伯尔尼的全权代表贝格·冯·罗姆贝格男爵,克斯库埃拉又在1915年3月25日写给罗姆贝格的一份文件,叙述了列宁的政治纲领,就是“变帝国

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罗姆贝格把这份文件交给德国首相。德国当局还通过其他渠道,也了解到列宁的主张,于是决定准许列宁等经过德国回俄首都。

在罗姆贝格帮助下,瑞士的社会主义者很快就办好了一切与列宁等回俄的细节。回俄的人在伯尔尼集中,他们包括列宁夫妇、季诺维也夫夫妇等共31人,离开瑞士到德国后,改乘“用铅封上的车厢,”只有俄国人才有权坐这个直达车,出入德境的护照和行李都免予检查,还配备一位高级厨师,他们享受外交特权。为保证他们能到达俄国,德皇想得很周到,他下了一道命令:“如果瑞典当局不许布尔什维克过境的话,我们可以让他们从东线的德军驻地通过。”瑞典当局没有阻止列宁等过境,但由于有这道命令,以后许多布尔什维克也可以通过东线德军驻地回俄了。在哈雷(地名),为了能让列宁等坐的火车通过,德皇太子坐的火车被阻留了两个小时。

通过以上史料,我们可看到,德国当局是多么迫切,多么急不可待地要把列宁等送回俄国。

由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由历史学家祖波夫等撰写的《二十世纪的俄国史(1894—2007)》一书,简要地介绍了列宁、季诺维也夫等人是得到德皇政府的特别批准才能经过德国回到俄国的。该书还介绍了列宁、布尔什维克接受德皇政府大量资助的事实,指出:“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者。”德国总参谋部向威廉皇帝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的的确如我们所愿。”

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

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当天(1917年俄历10月25日)在晚上10时45分,在武装司令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召开了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代表共有670人,(其中布尔什维克300名)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并选出了人民委员会即苏维埃政府来管理国家,列宁当选为主席,十月革命领导人之一托洛斯基当选为外交人民委员。

当时,苏维埃政府紧急的任务是停战,因为俄军在对德前线已接近崩溃,士兵普遍厌战。《和



布列斯特和约签字现场

平法令》呼吁协约国和同盟国各个参战国家进行谈判,实现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平。这些呼吁被协约国置之不理。

俄历1917年11月14日(公历11月27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对苏维埃政权的呼吁作出了回应,表示同意和谈。同盟国之所以同意和谈是因为经过三年多的残酷战争,这些国家也牺牲惨重,物资奇缺,广大人民包括部分高级官员在内也有反战情绪,而且德国统治阶层也希望早日能在东线停火以使把东线兵力调往西线和英法决战。

俄历1917年11月20日(公历12月3日)布尔什维克派出越飞等谈判,提出以《和平法令》原则作为谈判的基础,被德方代表团长霍夫曼拒绝,德方提出苛刻的条件:不仅要求苏俄放弃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白俄罗斯一部分地区,而且觊觎乌克兰。

1918年1月苏俄重新开始和德国谈判,地点仍然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苏俄方面以托洛斯基为代表团长,团员有越飞等人。托洛斯基主张“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其理论根据认为这种“不战不和”的方针一定能导致德国革命危机的尖锐化,使德国无产阶级反对自己的政府,而在这种条件下,使德军的进攻成为不可能,或者很困难。托洛斯基也知道,此时俄军打不过德军,因此“不战不和”的方针是“拖延”策略,他曾向列宁表示:“必须尽可能拖延时间,”他

认为“必须给欧洲工人阶级以最多的时间,让他们看清苏维埃革命的真相以及和平政策。”列宁也曾赞成拖延政策,但他认为只能在一段时间,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一直拖延下去,等他们下最后通牒,我们就最后让步。

德国当局也意识到拖延下去对自己不利,1918年2月9日,德国在强力进攻的同时,德方代表向苏俄提出最后通牒,提出更为苛刻条件:让德国人占领整个波罗的海沿岸,俄军和赤卫队必须退出芬兰和立窝尼亚,(按即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苏俄必须马上从芬兰和乌克兰撤军,同乌克兰拉达(政权)签订和约,要苏俄立即开始全面复员军队,并向德国赔偿60亿马克。

这个苛刻条件被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大力反对。为是否签订和约,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高层也引起严重的分歧。列宁主张立刻签订和约。他说:“如果不签约那你们等过三星期就执行对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这些条件并未触犯苏维埃政权,我丝毫不动摇。”列宁和布尔维克党为了保持苏维埃政权,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原主编)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本刊启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规定,结合我刊的实际情况,凡向本刊投稿,即视为作者将作品的数字化处理权、网络传播权、电子发行权、无线增值业务权授予本刊,同意本刊将以上权利转授予与本刊合作的第三方使用,稿件采用后即自动获得上述授权。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稿酬。如作者对上述处理有不同意见,请在来稿中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

炎黄春秋杂志社

读者来信摘登

编辑部同志：

转来汪大波同志的信，我仔细看过了。内容与我所说的几乎全同，但有两点小异：一是我听来的是潘梓年与这位投稿者谈的，潘当时是新华日报的头号人物，也是著名的社会名流。二是大漠同志不是去参加新四军，而是在参加新四军的筹组工作。因当时新四军尚未成立。大漠同志是参加一个工作组，到南方各红军留下的游击队同志处，去传达中央的新精神，并作好下山集中准备。这些工作小组的具体名字叫什么，我不知道，但实际上就是中央工作小组。不然，当然游击队不会听他们的话的。因当时干部奇缺，像汪大漠这样的条件，到延安经审查无误后就会立刻当成重要干部使用了。

胡风先生又已证明，发表时署名是“大漠”，自然肯定是汪大漠了。可能当晚对我讲述此事的人，太熟悉此事了，十分详细，因年代久远，我就误以为是他本人的事了。

这属于我的疏漏。谨此向大漠、大波兄弟致歉。

曾彦修

2013年6月10日

宽容是金

——读《以宽容消解文革恩仇——罗征启访谈录》的感想

《炎黄春秋》编辑部：

我是一位84岁的老人，也是《炎黄春秋》的一位老订户。每期的文章我都仔细阅读，包括“读者来信”。读了《炎黄春秋》2004年第4期杨继绳同志的《以宽容消解文革恩仇——罗征启访谈录》，触发我很多感想。

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一辈子干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一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不仅是亲历者，而且是受害者。《百年潮》2002年第6期我写的《36年前

的一段坎坷经历》，《人民政协报》“参考周刊”2003年8月21日我写的《当年我为吴晗同志辩护》及《时代风》2006年第10期发表我写的《历史怎能忘记往事不堪回首——“文化大革命”四十年祭》，把我受难的来龙去脉都讲清楚了，对文化大革命既不能忘记，也要学会宽容。这两件事我都做到了。

因为我与吴晗同志的文章发表在《北京日报》1965年12月16日及1966年1月30日，我是“五一六通知”发表的第二天就被批斗、接着被抄家三次，实行监管劳动。就是到了后期，出入研究所还要填写“牛鬼蛇神登记表”，每月16元生活费，受尽了屈辱与煎熬。受一些皮肉之苦在所难免。

改革开放以后，有一天，过去当过我上级的领导到单位找我，他说明研究所准备提名俞××及姜××为中层干部。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有的直接对我进行抄家、体罚、侮辱，有的还动手打过我，对我做了常人不应该做的事，并伤害我的家属及子女。因此，组织上考虑到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应听取受害者的意见。

我考虑后，认为当时他们是年轻的红卫兵小将，响应毛泽东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保卫毛主席，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开火。尽管当时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些过分，但责任不在他们头上。我还写了文字材料，只要他们现在表现好就可以提拔。

前些年研究院离休中心举办支部书记学习班，姜××是支部书记，我是支部委员及离休支部副书记。在会议休息时与我交流，他十分感谢我不计前嫌，让他得以提拔。

以宽容消解文革恩仇，促进社会和谐，对于我们这些在文革中受苦受难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政治考验，我做到了。

宽容是金。

张汝范

贵刊2013年8期《关于毛泽东遗体保存的回忆》中“突来低温保护任务”一节,提及“1976年9月11日,举行瞻仰毛主席遗容的吊唁行动时因遗体直接暴露于室内,温度过高对遗体保护很不利,而有机玻璃棺罩因内外温差导致表面结霜,会影响第二天清晨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活动。”当时的情况确实令人十分焦急。实际情况是第二天清晨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活动仍然按照公布的计划顺利进行。

毛主席逝世的当天傍晚,三机部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现改称“中航工业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所长魏祖治令我和其他两位搭档火速进城,完成一个紧急任务。赶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大会议厅时,看到靠大厅壁画墙那边坐着纪登奎、谷牧副总理,还有化工部陶涛部长等一些首长。三机部部军管会张主任在大厅这边等候我们,看到我们后说:“首长有重要事情和你们商量。”很快,谷牧副总理走过来和我们握手后说:“我们现在很焦急,罩在主席遗体上面的有机玻璃罩上结了厚厚的一层雾,看不清了遗容,早晨群众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活动将会受到影响,群众会很有意见的。希望你们想办法解决结雾问题。”当时,时间已近午夜,明日清晨八点半活动将开始,看得出来首长们十分焦急。瞬间,我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竭尽全力完成除雾任务。我对副总理说:“我是做飞机有机玻璃座舱盖研究工作的,飞机有机玻璃的座舱盖也会结雾,情况大致相似,我们有一套防雾的方法。航材所有成熟的技术和现在的材料,清晨八点以前可以清除棺罩上的结雾。”副总理焦急的样子显得放松了,再次和我握手后说:“那太好了,请你们抓紧时间快办,我去告诉他们,好让他们放心。”他立即转身走到大厅那边向首长们道述。我把整个过程考虑周全,严格计算好时间,在几个小时之内,必须保证棺罩成为透明状态。当天夜里,我所有关人员紧张地忙碌了一夜。派了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带着足够的各类材料赶到现场,精心细致地开展除雾作业。天亮前妥善地完成了这项特殊的紧急任务。有机玻璃棺罩透明了……

三机部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还负责和参与了毛主席纪念堂中“灵堂”的建设。全所不少研究人员和技术工人都投入了这项1号任务,我负

责技术指导“灵堂”中防弹及耐燃夹层有机玻璃墙的制造,事后获得了中央有关领导单位颁发的奖状。

左逢兴

我是一个农村青年,我是在打工的地方买到贵刊的,已经看了好长时间了。没有看到贵刊之前,我听别人说,《炎黄春秋》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喜欢看,因为它刊登的文章基本上是以解放前和解放后特别是什么大跃进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等等为主要内容,都是真人真事,这些文章对上年纪的人有吸引力,因为他(她)们经历过,读了有一种“亲切感”,可以看到自己“走过的路”,而对年轻人来说,没有吸引力,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对那些岁月是陌生的,他们关注的是现在,喜欢看的是以“谈情说爱”为主的刊物……

我是怀着一种读读看的心情买贵刊看的。读过之后,我惊喜地发现,这是一份了解真相的好杂志,它让我大开了眼界,增长了历史知识。我小时候喜欢听故事,村里的大人们就常常给我讲大跃进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故事,但都和“死亡”有关,说大跃进年代饿死多少多少人,文革时期斗(整)死多少多少人,我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呢?读了贵刊发表的一些文章后,我终于相信了,村里的大人们不是乱说乱讲。想想今天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好,我希望我们的国家今后永远都不要发生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情了。

我会一直关注《炎黄春秋》的,多了解一些历史真相没有什么坏处,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这份杂志。

云南读者 普爱盈

贵刊越来越得到读者的喜爱,影响越来越大。不过贵刊的校对还得注意加强。第4期上毕克官那篇里出现的“徐钦文”应是“许钦文”之误,“温温而雅”,分明是“温文尔雅”之误,怎么都没发现?还有编辑上的问题,如魏宏运那篇(第20页):“我于当年冬天,被……强拉魏到第一宿舍毒打”,这前面的“我”和后面的“魏”两种用法应统一。

何 蜀

书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	解玺璋	38.00	7.00
独裁者手册 [美]布尔诺·德·梅斯奎塔 阿拉斯泰尔·史密斯著		42.00	7.00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			
[德]齐格弗里德·洛卡斯特	英格里德·宗塔格 著	59.00	9.00
大元帅斯大林	[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	198.00	17.00
王明年谱		98.00	11.00
我这九十年	任均口述 王克明撰写	38.00	7.00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茅海建	68.00
儿子,你要活下去	[法]品雅特海	36.00	6.00
古拉格群岛第一岛	伍宇星编译	39.80	7.00
苏联的最后一年	罗伊·麦德维杰夫	39.00	7.00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吴庆彤	36.00	6.00
民国人物过眼录	杨奎松	58.00	9.00
改革都有红利吗	雪 珍	38.00	7.00
历史:何以至此	雷 颀	28.00	6.00
定西孤儿院纪事	杨显惠	25.00	7.00
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	杨银禄	46.00	7.00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杨 翰	35.00	6.00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陈徒手	32.00	6.00
勤列日涅夫时代	[俄]列·姆列钦	56.00	9.00
蹉跎坡旧事	沈博爱	48.00	8.00
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	冯筱才	38.00	7.00
叛逆者——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	[美]撒迪厄斯·拉塞尔	39.00	7.00
张发奎口述自传	张发奎口述 夏莲瑛访谈及记录	56.00	9.00
南非的启示	秦 喆	78.00	9.00
思痛录	韦君宜	35.00	7.00
陈独秀全传	唐宝林	128.00	11.00
斯大林的战争	杰弗里·罗伯茨	69.00	10.00
国史札记(人物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晖	38.00	7.00
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	42.00	7.00
我的朝鲜战争 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	张泽石	23.50	6.00
1949 我不在清华园	张泽石	23.00	6.00
回忆与研究(上下)	李维汉	75.00	12.00
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	刘维开	48.00	8.00
蒋介石与国共合战:1945-1949	蒋永敬	48.00	8.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49.00	8.00
难忘的非常岁月	陈瑞生	26.00	7.00
雾霭 俄罗斯百年忧思录(内部发行)	[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280.00	12.00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中、下)	陶菊隐	148.00	18.00
共同的底线	秦 喆	48.00	8.00
古拉格:一部历史	[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78.00	9.00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88.00	12.00
我眼中的改革	[德]汉斯·莫德罗	45.00	8.00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沈志华	58.00	9.00
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	雷 颀	32.00	7.00
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	金冲及	32.00	7.00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	陈铁健	48.00	8.00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萧功秦	48.00	8.00
金正日与朝鲜	高秋福	36.00	6.00
陈布雷与陈伯达——历史转折点上的两个“秀才”	张希贤	56.00	8.0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沈志华	148.00	18.00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译	58.00	8.00
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	俞可平	45.00	7.00
苏北利亚	于 疆	22.00	6.00
天下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等	42.00	6.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19.00	12.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50.00	12.00
国家记忆(一)	章东磐	98.00	10.00
国家记忆(二)	章东磐 晏 欢 戈叔亚	88.00	9.00
可操作的民主	寇延丁 袁天鹏	28.00	7.00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杨奎松	48.00	8.00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88.00	10.00
读史求实	杨奎松	38.00	7.00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张 喆	26.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九册)	北京电视台卫视频道节目《档案》栏目组编	286.00	36.00
母亲杨沫	老 鬼	45.00	6.00
血色黄昏	老 鬼	39.00	6.00
血与铁	老 鬼	39.00	6.00
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老 鬼	38.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李冬君	60.00	8.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颀	29.80	7.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I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图书介绍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一支特殊的军事政治力量,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由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所决定。从战争、政变、暗杀、政争、学潮、工潮,什么事情都发生过。共和制、总统制、联邦制、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样样都试过,17年统治,13位总统,46届内阁,军阀混战,武夫治国,千年帝制难于转型。本书刻画出军阀与政客的群体形象,揭露隐闻秘史,军头武夫里穿插着舞文弄墨的冷幽默,阴谋算计里隐藏着颠扑不破的人性冷暖,处处是活生生的历史和发人深思的话题。它并不是教科书上定义好的历史。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1956年,中共八大刚过去一个月,东欧爆发了令人震惊的“波匈事件”,紧接着的1957年,中国迎来了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反右派”运动……

当1957年5月中旬发现民主党派的言论有“危险企图”和“错误倾向”后,毛泽东继续鼓励鸣放,甚至“引蛇出洞”。他就是要看一看,经过八年的宣传、教育和改造,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面对小小的风浪,究竟是继续跟着共产党走,还是会被几个社会名流引入歧途;就是要向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怀疑者证明,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英明正确。然而,“引蛇出洞”后二十多天的风云变幻令他十分失望,由失望转而愤怒,毛泽东决心结束党内整风,而以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右运动。

为什么中共八大在1956年确定的扩大民主、加强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到了1957年却反其道而行之?

用最新解密的苏联档案,深度解读中国现当代重大历史事件。《雾霭 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前苏联“公开性运动”的指挥者和急先锋,被喻为戈尔巴乔夫的影子。配合戈尔巴乔夫将苏联带入解体,亦被称为“苏联改革的设计师”,曾提出“民主性、公开化、多党制、总统制等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建议。

他曾是正统的共产党人,也曾是党内的自由派,既是马列主义者,也是反苏共分子和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曾是社会主义理想的宣传者,最后却做了社会主义的掘墓人。

“反斯大林主义”是他思想的主线。对于雅科夫列夫的评论褒贬不一。反对者斥其为“苏共的掘墓人”“苏共政治局中的反共主义者”,而自由派却对他赞赏有加。

在他去世后,戈尔巴乔夫评论说“这是所有为了自由和民主斗争的人们的损失”。

《雾霭》值得阅读的一本好书。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炎黄春秋QQ在线:2368298257



全国免长途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代理出版：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传记、学术著作等。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 1、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3千元，300页印刷100本4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2、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5千元，300页印刷100本6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A类型代理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校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出版热线：010-57223540 58426176 58608409

传 真：010-58608407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自费出版网）www.51isbn.com

（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A类出版套餐优惠
(新华书店发行销售)

32开1000册23800元起
16开1000册27800元起

A类出版作品展示



B类出版作品展示



珍重历史 保存记忆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订制出书

订制出书：三千元五十本起编辑出版个人回忆录、自传，家族家史、家谱、纪念册。

文秘服务：资料清理、修改润色、残稿完篇；口述录音、采编整理、专题创作等。

沙龙聚会：“老人出书沙龙”提供场地，举办“新书发布会”与“亲友分享会”。

作品推广：书名、作者、简介入录《百度》“百科词条”；《家谱传记报》作品选登；《民间记忆网》与相关报刊连载。



民间记忆

名人讲座：民间写史、口述历史的领军学者、作家讲解民间记忆的价值意义与整理方法。

记忆分享：分“年代记忆、身份记忆、人物记忆、事件记忆、地方记忆”等类举办“民间记忆分享会”。

经验介绍：倡议编写百年家史，协助南方报业集团所属的《凯迪网》等机构合作举办“百姓家史写作大赛”。



编写培训

教材邮购：《怎样写自传》、《怎样编家史》、《怎样修家谱》教材套装或单本，款到寄书。

函授培训：分“自传班、家史班、家谱班三种”，指导学习，半年一期。

赠送资料：光临书店、邮购教材、报名函授均赠送“家谱传记编写流程图”与《家谱传记报》。



010-68920114、62525116



会馆：中关村海淀图书城25号“家谱传记楼”

单位：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文化网》www.jzwhw.net
《百姓家谱网》www.bxjpw.com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以史资治



邮发代号
82-507

全国邮局网点均可订阅
本刊发行部方便读者直接订阅邮购

炎黄春秋

以独立性和权威性著称

邮购热线
10-68532048

传真：010-68522852 电子信箱：yhcqfb01@126.com 炎黄春秋QQ在线2368298257

邮局汇款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收款地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银行汇款 开户名：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账号：01090324900120109064325 开户行：北京银行复兴支行

对中国改革历史的思考

1960年的强拆

关于红卫兵的一桩历史公案

亳县“特殊案件”的记述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教训

一个时代的扫描与国民性实录

ISSN 1003-1170

07>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10.00 元